一（他们）

他们三个人站在春天的土地上。

春雪已经融化。空旷的田野上，弥漫着拖拉机刚翻耕过的土地散发出来的泥土气息。那一排排犁痕，象是鱼鳞一般，在阳光下闪着光。远方，阴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和刚刚返青的农田防风林带之间，绵亘着一片金色的沙海。一排排起伏不平的沙垅，仿佛奔腾的波涛向天边涌去。但此刻，由于日照和云影的作用，这广阔无垠的大漠，竟幻化成一片碧蓝明净的大海！

他们三人面对这伊赫沙漠的瑰丽景色，都没有惊呼起来。他们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魁梧壮实的国营农场场长魏大雄，修长精瘦的农场技术员辛启明，和仍然显得娇小玲珑的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珍。三个人都已经不会象小青年那样热情勃发，手舞足蹈或者慷慨激昂了。经过这些年难忘的、惊心动魄的岁月，大家都懂得对任何事不轻易表态的重要性，都学会了控制自己和故作镇静，把真实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所以从外表看，这三个人互相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谁也看不出这是一次思绪万千，狂飚骤起的意外重逢。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些难忘的往事、那些复杂的感情纠葛，那么不同的命运和那么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如今，象三条远远分开的道路，忽然间又交汇在一起，迎面碰上了。感情

的激荡，思绪的翻腾，使他们彼此避开了对方的目光，久久地尴尬地沉默着。

往日以谈笑风生称雄于全场的魏大雄，今天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几次张了张嘴，都没说出话来；辛启明全神贯注地搓着手中的土块，象是要把它攥出水来，脸色显得格外冷漠和僵硬；远道来的女客人，清秀的脸上一直挂着一缕悲酸的、僵化的笑影。他们三个人象电影中一个突然停住的镜头一样，呆在那里。

从奥伦布拉格山口吹来的阵阵春风，越过一条条林带和水渠，变得温和、湿润，轻轻抚摸着他们的面颊和衣衫。一队南来的大雁，从他们头顶缓缓飞过。宁静的天空中，长久地回荡着它们回到故园的欢叫声。

“真没想到,黎珍,今年这第一只飞来报春的候鸟,竟会是你!”魏大雄带着几分感伤的抒情意味,开始打破沉默。“真象我们这里芒赫图人的谚语里说的，山和山碰不到一起，人和人总能见面。老同学，你的到来象征着我们今年的好运气，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呢？”

“但愿如此吧。”女客人喃喃地回答,说完,赶快偏过脸去,把一绺滑到前额来的卷发拢进纱巾里。她这是为了不让两个男人察觉到，她是怎样咬着嘴唇，拚命忍住不听话的眼泪。

“启明,你大概还不知道,黎珍这次来,是代表部里进一步落实我们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的一些情况。想不到吧，她现在是钦差大臣!”场长说着,放出一阵豪爽鲁直的阔笑。

他已经恢复了常态，显得自信、快活，那种不习惯于低声说话的大大咧咧的劲头，配合着那副跟他职位十分相称的外

表：粗壮的脖颈，结实的胸脯，有力的大手和筋肉鼓起的双腿。谁见了他，都觉得这是个精力充沛、办事雷厉风行的实干家。

“怎么样，黎珍，”魏大雄大声问道，“是先看地还是先看人？”

“已经来到地里，先走走也好。”

魏大雄朝前走了两步，忽然又转过来，对跟在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技术员解释说：

“我还忘了说，刚才黎珍在车上告诉我，她儿子也在我们农场，这次她来顺便还给他办调转手续。你猜是谁？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祖宗，小老头刘军！”

辛启明一听这话，忽然抬起头，眼里放射出一缕惊讶的目光。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啰！”魏大雄又转对女客人说，“他现在是我们机耕队的骨干，成了农场最出色的小伙子啦！要不是你的公子，我真不想放他走呢！不过话说回来，黎珍，这件事，责任在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何必御驾亲征？一个电话就行了嘛。我们场里不少北京人都这么干，你应当早告诉我。”

“早告诉好走后门，对吗？”黎珍微微一笑，但过了一会儿，忽然又换成一副沉思的神情，茫然若失地说，“要是样样事都能未卜先知就好了。走吧，老魏、启明，咱们先在地里转转吧。”

好，最初的酝酿着狂风暴雨的一刹那过去了，魏大雄又一次感到了自己能够控制住局面的信心，这种信心总是给他带来最后的成功。他兴致勃勃，精神抖擞，兴奋地朝等在路旁的大功率越野车摆摆手，让它先开到前边去等，自己迈开大步，

带头走起来。

于是，小巧的女客人夹在一个舞动手臂、高谈阔论的男人，和一个沉默寡言、仿佛专心致志地用脚步丈量着土地的男人中间，朝伊赫沙漠里新开垦出来的那一片空旷的、辽阔无边的大田走去。在他们跟前，坎坷不平的大道，伸向蜃气波动的远方，望不到尽头，就象二十年前他们刚开始走向生活的那条道路……

二（魏大雄）

为什么我心里这样不安？为什么我一看见蹲在地上察看地温计的这个人，就不由自主地叫司机停下车来，搞了这么一次不期而遇？她在这里顶多呆几天，然后带着文字资料、图表数据和一些必要的土壤样品，带着儿子上路了。我也走我的路，各走各的路。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不必要的回忆、感慨，也不会扰乱各自早已习惯的生活。……说实话，我何必自作多情，也毋需内疚抱歉。生活里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我不是第一个，也决不是最后一个。已经过了二十年！又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大家的心肠都变硬了。他也变硬了，从来不提往事，象块石头似的，不动声色，不动感情。刚才他蹲在地里，和周围的土块一样，只不过大一些罢了。现在，我是全省先进农场的场长，党委书记，他是我属下的一名科技人员。她呢，农场的客人，科研工作者，只不过这次负有特殊使命，业务方面的钦差大臣。如此而已！我们三个人的位子早就摆好了，固定了，不应该也不需要有任何改变。

可是早上，当我去火车站迎接客人，朝我走过来的竟是她时,我真是乐 懵了！她的样子还那么年轻，笑容还那么妩媚动人，我简直以为是做梦，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四周。周围阳光耀眼，慌慌张张的上下车旅客，他们你推我撞，也不时碰在我身上。不，这不是梦，我的天！这真是她。哎，这些首都妇女，鬼

知道她们有些什么妙法，能够这样长久地保持自己青春的体态和容颜。而我的那一位，我的那一位……年纪比我们轻得多，却早就发胖了，象一块发面团一样，不可收拾地“发”了。不过现在还有什么“那一位”,一切都过去了。

“老同学,难道不认识了？”

她大概是看见我那呆头呆脑的样子，咯咯地笑得直颤。我呢，大梦初醒，竟然伸开双臂朝她奔过去。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她那只小手,忘情地摇晃。在这一刹那,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和那一股难以忍耐的热情，又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没办法,和二十年前一样,一看见她我就发懵。“你呀,你呀,”我放开粗嗓门朝她嚷嚷。我知道，我的大学同学们就喜欢我这么个马大哈似的高声大嗓的样儿：“你怎么一点也没变，简直把我带回二十年前去啦！”

就在我和她坐在吉普车里，兴奋地东拉西扯，感动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了路旁田里蹲着的这个人，于是……

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年来，她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不知道他也在这里。看见他们两个象遭了雷打电轰似的面面相觑，长久地尴尬着的局面，我的心忽然也狂跳起来，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有什么可说的？这是历史的过失。而我呢，我问心无愧！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上也都会这样干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们从河北农村的一个人民公社劳动归来，回到学校，开始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紧张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快乐，最值得

怀念的时代了。那个时候，人人富于展望，生气勃勃，心地多么单纯，除了学习，没有别的要操心的事。一切都非常之好。同学们面孔黧黑,身心愉快,从早到晚奔波于寝室、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平常忙得连吃饭都是边走边吃，不过周末有电影晚会、舞会，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尽情地玩一晚上。而星期天呢，却不休息，跑到农业展览馆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标本和资料，拟写文字说明。

我比别的同学操心的事多一些，跟他们相比，我就象个大人,因为我是班长、支委,社会工作多,年龄也比一般同学大两岁，考虑起问题来自然也比较实际一些。比如说，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从上学期起，我就留心上了。我知道，大多数同学想留在北京，但名额有限，同学之间竞争肯定是十分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得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及早地准备起来，创造留北京的条件。再比如恋爱问题，因为家在农村，普遍都是早婚，对我这么大岁数还没有对象这一点，老人们当成了心病,每封信都提这件事,而且说,我自己再不操心,他们就要在家里给我定下来了。可是娘老子哪里知道儿子的心事，大学生的恋爱，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艺术！当时我正在为这个问题苦恼着。因为不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喜欢上同班女同学黎珍了。一段时期来，不管走到哪儿，眼前总晃动着她那笑微微的样子，心里总想去找她，和她在一块儿。我很清楚，只要对这样的城市姑娘倾心过以后，再把我和任何一个农村女孩子拴在一起，我不会幸福。但黎珍对我却很冷淡，瞧不起我。在我看来，她准是在嫌我功课不好，在业务上缺乏聪明才智和潜心钻研的学习精神。

说什么我也得把学习撵上去！尽管我不是那种才气横溢的人。但我不笨，加上我生来就有的那种牛一般的吃苦精神，自信能撵过别人去。要命的就是时间太紧，所以好几次都想辞去社会工作不干，但是系总支邱副书记坚决不同意。他批评我说：

“红专大辩论刚过去不久，象你这样一个党员学生身上，业务第一、先专后红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有所抬头，这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我得提醒你：红专的摆法，那是已经确定不移的了。今后考察学生、教师，挑选留校毕业生等等，都要把红放在第一位,首先要看政治条件。”说到这儿,邱副书记朝我意味深长地望了一阵,又加添道“:现在党要求你安心工作,你却三心二意。你说说,这好吗 ?”

还能说什么呢？我当然立即收回自己原先的要求。接着,邱副书记又问：

“你们的劳动总结搞完了吗 ?”

邱副书记对我们这个夏天去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开展教育改革的这份总结，非常关心。这倒并非因为这次劳动是他带的队。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们这是在参加战斗。现在教育战线上的摇头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都在等着看我们笑话，我们一定要搞出一份富有成果的、有说服力的总结来，给这些家伙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他们的气焰统统揍下去！那时，在我们心目中，邱副书记是一位极其严肃、恪守原则的职业革命家，他每布置一件工作，都仿佛是领着我们披荆斩棘，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尽管他身体很坏，但工作起来拚命抽烟，从不知道休息。他对我们几个学生干部要求也

很严，我们都有些怕他。我赶紧回答说：

“修改稿已经出来了。”

“那就抓紧时间通过,赶快报上来!”

我用了两个晚自习时间，把总结又修饰了一遍。第二天是周末，当大家心急火燎地吃过晚饭，准备去参加音乐晚会的时候，我也顾不得“怨声载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喂,同学们，同学们！耽误大家十分钟时间。班级劳动总结，上回大家提了意见，我们作了修改，现在念一遍，如果同意,就这样交上去了。”

“既然按照大伙意见改了，就不用念了，由你们几个班干部全权处理。”

“同意这意见!”

“同意!”

同学们都想去占好位子，对这种纯粹走形式的举手表决谁都不感兴趣。大家一哄而散，党团支委和班委会成员留下了。记得当时，就是这批学生干部也很不耐烦，而使得大家安下心来的是我的好朋友辛启明。当时班上就他和我两名党员。他笑着招呼大家：“对付一个绳扣最好的办法，就是坐下来解开它；对付难以下咽食物的最好办法，就是坐下来吃掉它。对付我们的老魏呢？”

大家立刻七嘴八舌。有的说：

“坐下来干掉他!”

有的说：

“坐下来不理他!”

还有的说：

“坐下来诅咒他！”

“灌醉他！……”

在哄堂大笑中，辛启明说：

“不，坐下来挑剔他！这么一来，不要十分钟，他准保放我们走。哈哈……”

大家总算落座了。我挥动稿纸，朝这群快活的家伙嚷道：

“十分钟！我保证，只要十分钟！好，抓紧时间，请诸位洗耳恭听。”

说实话，这份总结我写得很卖力气，列举了我们去劳动的那个公社多方面的成绩，以及同学们下乡受到的教育和收获等等，数目字很确凿，都在我笔记本上查有实据；论述很周到，我参考了一些报章上的提法，再加上几个突出的、动人的事例，照我们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水平，算是够好的文章了。我自己盘算着，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文章念完了，大家都表示理解和满意。我顺便问了辛启明一句：

“启明，你也没有什么意见吧？”

遇事一向认真的启明犹豫了一下，提出一点更正：

“关于小麦亩产八千斤，是他们公社干部的估产，不是实际已经达到的数字。我看，在总结里就别提了。”

“那怎么行？”我感到为难，因为邱副书记特别指出过，对公社的成绩要充分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最有力地说明我们的工作成绩。我对辛启明说：“这个数字可不能取消，我们干了一气，最后这个公社亩产还不如别的地方，说得过去吗？再说，这个数字是他们公社干部说的，又不是我们凭空捏造。”

“可这是虚夸的啊！咱们这篇总结又不登报，尽量少吹一点,最好别吹。”

“什么 你不相信党报,你说报社吹牛 ?”

“这跟相信不相信党报扯不上，根本是两回事儿！我只是说那些高产卫星田。但凡有点农业知识的谁信呀。亩产八千、一万，不要说是种在地里长在植株上，就光是一粒粒麦子堆在地里，也得堆它厚厚一层，违犯起码的常识！我们是学农业科学的,科学就得老老实实,为什么也跟着瞎起哄 ?”

“启明，你怎么啦？怎么能这样说话？要照你这个说法，我们党报岂不真象右派分子污蔑的那样，报喜不报忧了？”我觉得问题有点严重，口气不由得严肃起来，“就算你真有道理吧,说话也要分场合,要注意政治影响,要维护党报威信。别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正因为是共产党员,就要说真话,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辛启明越来越激动“大雄,你我都在农村长大，你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一辈子是农村小学教员，农民过日子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吗？估产冒尖儿，虚夸假报，这会给农民带来什么严重后果，难道我们不清楚？我们这回下乡在村里呆了那么长时间，你没听老乡说嘛？赶到秋后看吧：干部们乐得东吴招亲，一个个远走高飞；可老百姓口粮得往下减，饿起肚皮急得你滚油浇心！我实在见不得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他们这样做，说是思想解放，我看是私心膨胀。估产越高，说明他们私心越大！”

“好了好了,现在是通过总结,我们不扯这些。”

可我越息事宁人，辛启明倒越不肯善罢甘休了。由于激

动，他的脸涨得通红，亮得刺人的眼睛直看进人的心里，在灯光下闪烁。

“至于说到总结,大雄,恕我直说,我不明白作为党员,你为什么要说假话？比如总结上还提到深翻地。深翻三尺、五尺，在田里挖壕，浪费了大量人力且不说，主要是把土地破坏了，熟土倒到下面，生土翻了上来，三几年都长不好庄稼。本来老乡就不愿意这么折腾，只不过因为县里、公社规定这么做。而我们，这些农业战线上未来的科学家，则完全扔开科学，也跟着干了，不但干，还宣传，现在还要把这称作我们实习的成绩，笑话！我认为这次没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科学办事，提出不同意见，是一大缺点，应该在总结里写上。我要把这意见在组织生活会上对邱副书记提出来！”

十分钟过去了，十个十分钟也都过去了，大家早都忘了晚会的事，我和他一直辩论到深夜，轰动了整个男生宿舍。这样一来，我不能不向组织汇报了。我要不汇报，事情传到邱副书记耳朵里，他会对我作何感想？再说，总结没通过，交不了差，邱副书记问起来，我也得照实回答。

不过我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严重！过了没多久，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邱副书记来我们支部蹲点，几天工夫，就抓出了一个典型，一个“攻击三面红旗”、“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向党进攻”的“凶恶敌人”：辛启明！又从他档案中发现，他叔祖父是天津的一个不法资本家，再加上他本人拒不认错，态度强硬，因此对他十分严厉。

同学们对事态的发展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不少人都懵了，我也大为震惊。说辛启明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这

根本扯不上！起码我知道，他当时对中央在庐山的那场斗争一无所知，他只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对我执笔的“总结”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些话，尽管当时使我脸红，叫人难堪，但过后平心静气想想，不是没有道理；当然，他也说了一些我认为是错误的话。但仅仅根据这些话，就把一个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视之为不共戴天的凶恶仇敌，这我想不通，也说服不了人！

既然大多数同学思想准备不足，心里有疙瘩，批判会热度自然上不去。邱副书记着急了，要我在会上带头加温。我有些为难，只得如实向他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邱副书记听完我的话，立刻沉下脸来：

“想不到你也右倾温情起来！”

我连忙结结巴巴地解释说：

“我不是右倾温情，我只是觉得辛启明还够不上敌我……”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嘛！”邱良才打断我，“辛启明言论可能真的不多，但质量很高，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同出一辙！他跟他们之间，也可能真的象你所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象一个从未见过资产阶级的人，不能说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一种反动思潮，他们之间完全起到了彼此呼应、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辛启明为什么要那么干，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这个答案，就要到他那个不法资本家的社会关系中去找罗。”

“可是邱书记，我听辛启明讲过，”我望了邱良才那张愤怒

的面孔一眼，犹豫了半天，鼓起勇气说：“那个不法资本家还坑害过他父亲，和他家毫无来往。他只是出于对组织的忠诚，在入党志愿书上填上了这个社会关系。”

“说你右倾温情还不承认，你看看，现在又跑出超阶级的朋友义气来了不是！”邱副书记气呼呼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说，一边拿笔记本在手掌上拍打着，“给好朋友说说话，你们关系不错，这我理解。但是有一条：不能违反原则。目前，正确的态度是划清界限，坚决斗争，指出辛启明问题的严重性，向他大喝一声……”

“可是邱副书记，”我嘴上虽还辩解着，可声音却虚弱得都有点打颤了，“问题在于我觉得他还不是，要真是坏蛋，别说是辛启明,就是娘老子,我也不含糊!”

背后什么地方，突然响起“嘭”的一声。我转身一看，是邱副书记的笔记本摔在了桌上。

“你不要说了，够啦！”他朝我怒吼着，我从未见邱副书记发过这么大脾气，因为愤怒，病容满面的脸上，肌肉在阵阵抽搐。那双因为长期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咄咄逼人地闪烁着：“原来你就是这样来对待当前这场运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只承认别处存在阶级敌人，看不到自己身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全国各地都这样搞起来，这场反右倾运动岂不成了无的放矢，岂不完全多余的了！魏大雄同学，我要警告你，既然上面发动这场运动，那就说明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键是自己患了右倾盲症！你要不悬崖勒马，就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好好想想，我真替你担心呀!”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体会到权威的力量：我明明觉得自己手里还掌握一点真理，可一想到邱副书记最后通牒式的严厉警告，想到自己要为此成为运动的绊脚石，想到日后留北京的愿望也将化为泡影，我就有些后悔、害怕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放弃，只得屈从，心里充满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压抑和屈辱的感觉。我忽然想起辛启明来，他在对那份总结提意见时，大概也曾有过个人得失的考虑吧，但他却坚持下来了，结果，他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看来，他注定要倒霉了，邱副书记饶不过他，说得最明白不过了：既然发动起这场运动来，那就说明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存在。照此说来，岂不就是运动需要一个人成为敌人，他就得是，逃也逃不过！不然，他不是，我也不是，大家都不是，运动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又何在呢？我从辛启明这件事情上，清楚到不能再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如果去冒犯现在人们常说的潮流，会落到个什么下场！

现在回想起来，启明是有理由怨恨我的，因为批判会上最初的一把火，是我点起来的。但是他不知道，那些天，我心里也不好受。我给他上“敌我”的纲，说他是“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是按照邱副书记那天定的调子说的；而同学们的批判发言，又照着我的调子。批判辛启明的热度，就这样一步步地达到邱副书记希望的那种程度。

叫人奇怪的是，根据我对启明的了解，他不是个能轻易改变自己看法的人。如果他象开始时那样，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说不定结局会跟现在不同。但出人意料，顶牛顶了几天以后，忽然有一天他痛痛快快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

了。这中间，起作用的可能就是黎珍，那个当时正热恋着启明的姑娘！

啊，生活真是复杂！惩罚一个人，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自己人；有的使用憎和恨，有的却使用关心和爱护，友情和爱情……

三（黎珍）

这塞外边疆辽阔的土地，从沙漠中穿流而过的条条清渠，无边无际的阳光，人字形的雁阵和阴山山脉紫色的峰峦，在这样的土地上挥汗如雨地劳动,种树种草,改造土壤;“让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覆满沃土”，……这一切熟悉得让人心疼，明朗得象孩提时代的梦境。怎么不是梦呢？它曾千百次地出现在我青年时代的梦想里。可是万万没想到，在二十年后我才目睹了自己响往的这一切，在二十年后，我才又重新见到了他！

他是多么冷淡，多么克制！啊，在所有的老同学里，他是变化最大的一个了！不是因为额顶上的毛发变得稀疏；也不是因为面颊上从前青年人的酒涡，变成了两条深深的沟纹。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二十年岁月留下的痕迹。看看这个老魏，我们过去的班长，他是大大发胖了，毛哗叽上装和国防绿军裤，紧紧地裹着他那往横里发展的身躯，那是个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人啊！而这一个，一张饱经忧患的脸，宽阔的双肩显得是那样瘦削，高大的身躯显得那样单薄，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配合着脚上那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完全象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基层干部。然而主要的变化并不是这些，主要的变化在他的那双眼睛里，眼睛！从我第一眼看见时起，它就老是眯缝着，好象要把目光，把感情，把思想都深藏在低垂着的眼睑后边。只有一次，当老魏说到我儿子时，它抬起来看

过我，出现过闪电似的一瞬，但随即瞳仁又变得朦胧，变得冷漠和呆滞。而从前，这双眼睛曾经闪射出多么激动热烈的光彩,它是多么明亮,多么深邃,有时多么快乐,有时又多么忧伤啊！

也许我这个样子不大好吧，可以说，不成体统。我简直丧魂失魄，走路一脚高一脚低，眼里老是象蒙着一层雾气。老魏打着很大手势在讲述什么，那支大幅度挥舞着的胳臂，每一划动，都象能把这块土地搂进怀里。然而我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我是来了解这里土地情况的：生产水平、土地潜力、水热资源和各种限制因素……可是现在好象什么也记不住，思想完全集中在身后那个没有动作、没有语言、埋头走路的人身上。还有小军，一会儿就能看到的我的儿子小军！他哪能料想到母亲感情上惨痛的裂口，并没有愈合。啊，我真不该来这里。但是不！总算又见到了他，我该高兴才对！他多半也成立了家庭，有了妻子、儿女。生活的重担把他累坏了吧，加上那个背了二十年的置他于死地的包袱，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我都不敢张口打听，但我又多么想知道啊！我的头都晕起来了！我原本以为,一切早已过去,早已忘却,没想到,痛苦还是那么新鲜、那么强烈,还是有那么多的感情,在我心中汹涌,翻腾！

我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时候联系在一起的？是谁说出那关键的一句？都记不清了。大概我们是同时，肯定是同时向对方伸出手去，眼睛注视着眼睛，心里都明白了：我们再也不能分离！

在班级的男同学中，辛启明不是一个热情横溢或者锋芒毕露的人。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认真和诚恳。记得在大学二年

级时，在全校学生科学报告会上，他的一篇论文被选中了。在我们那个学生时代，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二年级大学生在全校宣读科研论文，是很罕见、很引人注目的，是一种难得的荣誉。同时，报告的审阅者是系主任本人，他是全国土壤生化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对这篇论文有很高评价。然而科学报告会前夕，辛启明却撤回自己论文，引起很大的轰动。他的理由是，有一个数据没有测准，需要重新做实验。同学们都为他惋惜，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这个差误。那天，我们一些同学聚在教室里，大家都给他出主意：数据的准确程度，报告之后还可以进一步订正，学报公开发表以前改过来就行了。可是辛启明本人不同意。他认为，由于这个数据把握性不大，论文中有一个问题立论的根据就不足。他说：

“科学要求严格性，这次波折是对我严格性不够的惩罚，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魏大雄当时也在场，他摇了摇头，提醒辛启明说：

“你考虑过没有，你的论文是经过系主任审查的，你撤回论文，系主任脸上也不好看，影响了关系，今后你再想搞科研，他能象这次一样热情扶持吗？你把自己的可靠性大大削弱了。”

辛启明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找系主任谈谈，向他道歉,这一切全怪我！”

系主任后来并没有责怪他，相反，在全系大会上还表扬了辛启明严格的科学态度。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女同学们开始对辛启明感兴趣；有的赞成他的态度；也有的不以为然，说

他傻，说他傲，说他做作。我却不知为什么，对这件事的全部过程和处理结果感到高兴，虽然我自己也许做不到，但我佩服他，觉得他心里想着一些我没怎么想过的事。不过他是党员，那时我以为他一本正经，很严肃，不敢和他多说什么。

不久，我们开始学遗传学这门最有趣的学科了。关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以及苏联围绕李森科的试验所展开的激烈斗争，搞得我们大为兴奋。植物的有性杂交试验，新品种遗传因子的鉴定，对染色体的了解与观测，把我们牢牢拴在了实验室里。有些实验要连续搞几天，同学们除了吃饭，从早到晚站在试管和仪器旁、显微镜前。失败的懊丧，成功的喜悦，成为我们每天的佐餐之物。大家都开玩笑说，一涉及遗传科学，我们班级情绪测试板上红灯便全部亮起来，要末爆发争论，要末一起畅想：未来祖国大地上要种出些什么奇果异木。女同学们设计了这样一种果品：速生、耐旱、皮薄、肉嫩、汁多、无核；既有菠萝的清香，又有橘子的酸甜、苹果的甘美，而吃起来则象香蕉那么简便。男同学编了首诗来讽刺我们：

不需要种植，
不需要耕作，
不需要浇水，
只需要收获。
苹果的外观，
西红柿般皮薄；
软滑得象香蕉，
气味又象菠萝；

带点橘子的酸味，
又象葡萄般繁多。
欢迎啊！
如果花生和红枣，
也能来遗传点什么，
世界上只要一种果木，
“万物皆备于我”！

这首滑稽的打油诗，使全班笑得前仰后合，也结束了我们那帮懒姑娘的胡思乱想。而令我惊讶的是：诗的作者竟是辛启明！

那一段时间，辛启明呆在实验室的时间比谁都长，往往大家都吃完饭了，才见他匆匆奔往食堂。为什么他的实验做得那么慢呢？难道是他的结果比别人都难以测定吗？我有些纳闷。有一天晚上，快熄灯了，我想起自来水笔扔在实验室，怕第二天人多，乱哄哄地找不着，便跑回去拿。实验室里人已经走光了，还亮着灯，一看，只有辛启明在那里。他不是在做实验，他正帮着管理实验室的大婶扫地，收拾那些精疲力竭的同学们胡乱扔下的仪器、试管、卡片和各种叶片、根茎。我忽然感到难为情，我从来没想到这一点。在我用过的仪器旁边，东西一向扔得特别乱。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教辅人员，每天要等大家全部离开，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来收拾，他们是多么劳累啊！我每天早上走进洁净整齐的实验室，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我立刻动手跟他们一起清洗起试管和各种量具来。辛启

明显然很高兴，他把刚配制好的洗濯剂端到我面前，让我使用，自己再重新配制新的。说实在，我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子，从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洗洗涮涮一类活计很不在行，还常常失手打碎东西。然而那天晚上，不知怎的，我竟觉得异常得心应手，利索极了，一堆堆弯弯曲曲的试管、各种各样的玻璃瓶和陶瓷器皿，不知不觉便洗涮完了。等我们收拾整理完毕，已经十二点多，辛启明提出要送我回宿舍去。

春夜的校园里，夜深人静，空气中浮动着丁香花的阵阵暗香。幽静的小路上，橐橐地响着我和辛启明的脚步声，一个重浊稳实，一个清亮柔和。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独自跟一个小伙子散步，这双双起落的脚步声，在静夜里听起来，竟比我平时独自一人的还要整齐，它是那样和谐，那样美妙、悦耳……刹时间，一阵慌乱羞赧的激动攫住了我的心，我不好意思极了。为了分散注意力，不再听到它，我赶快没话找话地问他：

“你这样迷恋于实验室，怕是将来想蹲科学院搞研究吧？”

谁想他站住了，满有兴趣地看着我：

“那你呢？”

“我……没想好，我爱大自然，爱种植，我想过拓荒者的生活，亲手在祖国大地上种庄稼、种果木、种各种树。让山河布满浓荫，大地开遍鲜花……

我惊惶地停住了，以为他要笑我，可他却接了下去：

“让沙漠中开出良田，让祖国每一寸土地都覆满沃土！我也是这么想的，黎珍，我觉得，没有比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然面貌更美好的职业了。不知你想过了没有？我们国家

只有十六亿亩耕地，人口却有六亿，平均每人只有2.66亩。过去总说我国地大物博，其实地不但不大，而且远远不够！所以我将来一定到荒漠地区去，改良土壤，为扩大祖国农田面积作努力。……”

已经走到女生宿舍门口了。我真有说不出的遗憾，多么想再听他说下去，但没有办法。我稀里糊涂地伸出手，准备告别，而他呢，拉住我的手，却再也没有放开。我们彼此注视着，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在月光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再走一会儿，好吗？”他轻声问我。

于是我们又在校园里走起来了，手拉着手，忘了时间，忘了困倦，忘了一切！就在这个晚上，我们都明白了，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将来一定要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我爱上了辛启明什么呢？如果一个现代的姑娘问我，我将很难回答。爱他的仪表和风度吗？老实说，他并不那么特别引人注目；爱他的财富？不，他很贫困，母亲早亡，父亲新故，自小过着清贫的生活；那么是爱他内在的热情，他的才能，他的真诚？细心的习惯？克己的精神？他的理想、抱负、事业心？都是，也都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姑娘们都还没有理智到冷酷的程度，对自己爱人身上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事先都仔细地逐条加以算计、比较和权衡。我爱的是他整个的人，他的优点和缺点。总之，构成这个独特的“他”的一切。如果只有热情、才华、真诚，而没有那一点孤僻、忧郁和矜持，也就不成其为辛启明了。我只知道我爱他，哪怕他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哪怕他屡遭挫折、困顿终身，我都会爱他的。是的，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不考虑爱情中的“取”和“予”。或者说，我们在爱

情中,愿意多多地‘予’而无所‘取”,为了爱情可以自我牺牲，这是我们理解的爱情。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认真想过将来会遭到不幸,对‘共患难’想得少而对‘同欢乐’想得多。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有党的关怀和培育，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前途怎么会不光明，未来怎么会不美好呢？

但谁料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大祸却降落到我们头上！记得那是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年，我们两个人正在合作做一篇关于沙地改良的毕业论文，它被认为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理论价值的题目，引起老师们的普遍重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们看书,争论,做卡片,查阅参考文献,在实验室观察化验结果。一天开晚饭时，我象往常一样，端着碗，急匆匆地一边吃一边邀启明一起上图书馆，他却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

“今晚不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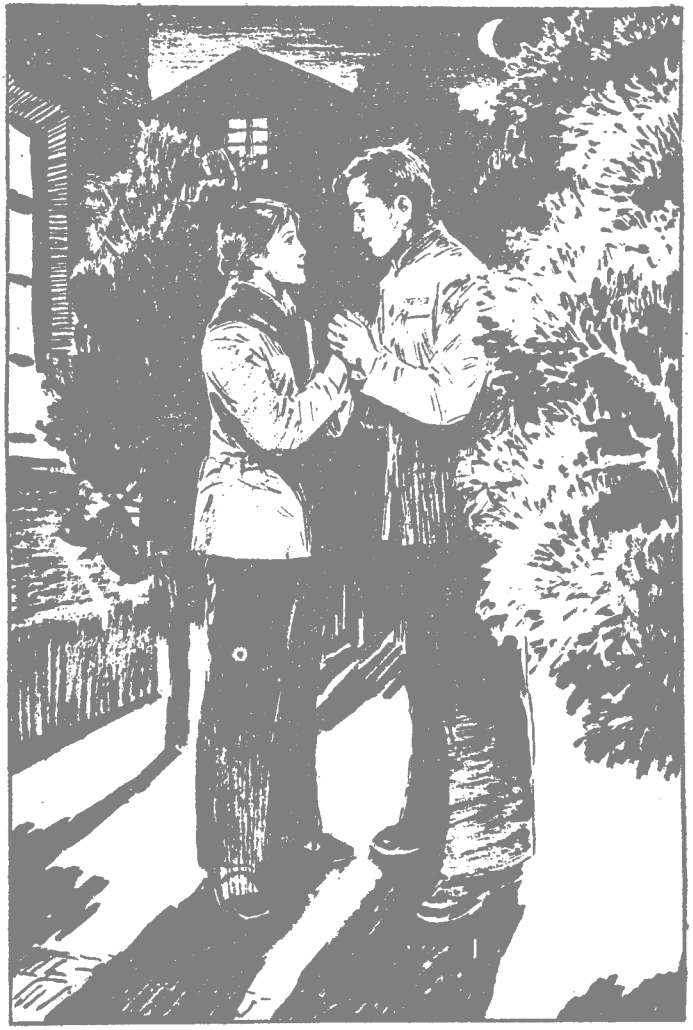
“为什么？”

“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你忘了？”

我想了想，忽然记起来了：今天是我的生日。顿时，心头涌起一股火热、甜蜜的感觉。

“正好,今晚上中央乐团来演出,”他说,“你不是最喜欢他们那个抒情女高音吗？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酥糖，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和糖果中度过你的节日,好吗？”

我点点头，对他这种男孩子们少有的细心和体贴人的习惯非常满意。可是班长老魏为了总结的事，却把大家缠住了，最后，留下支委班干部，由他们全权处理。



我回宿舍拿凳子，一边跑一边告诉启明：

“快点来,我先进去占位子。”

“别！”他照例咧开嘴笑笑，嘴边浮现出两个动人的酒涡，“我们一会儿就完,要不人那么多,进去找不着你。”

“那你一定得快!”

我回到宿舍换了件衣服。姑娘们都在梳洗打扮，李小蕙穿上了我们称之为“迎宾服”的新上衣，她硬逼着给我把小辫高高盘在头上，插上一把栗色的发梳。我又换了一件厚的白色羊毛衫，栗色长裤，打扮好了，自己也觉得清爽、精神，便和女同学们一起朝礼堂跑去。

人们都急急忙忙往里走。我站在那里，大家尽拿我开玩笑，叫我进去，弄得很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坚持等他。答应陪我一起等的李小蕙终于也忍不住跑掉了，大门外的人渐渐稀疏起来。他还不来。

我的心直往下沉：最好的位子早已没有了，后排也一定坐满了，现在，连大厅两侧也都站满了人，我可以清清楚楚想象出里面那种水泄不通的盛况。到后来，迟到的听众也一个一个跑过我身边挤了进去，门外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心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去男生宿舍找他，又怕两人在路上错过。

里面音乐会已经开始。我孤零零地站在门外，听里面节目一个接一个往下进行，观众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我的“节日”心情完全破坏了，怪怨他听不成音乐，也不来告诉我一下。里面传出了我熟悉的那个抒情女高音忧伤的歌声。

对面山上的姑娘，
你为谁放着群羊，
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
你为什么还不回村庄。……

我再也忍不住了，咬住嘴唇，泪珠在眼眶中直打转，为了不至于站在那儿哭鼻子，便急急忙忙跑回宿舍去。

姑娘们看完演出吵吵嚷嚷地回到宿舍。在优美音乐的影响下，她们哼着、唱着、笑着、打闹着。盥洗室、走廊内、楼梯上，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混在一起，形成一片喧哗。按照这群快活姑娘的习惯，宿舍音乐会将接着举行下去，直到楼上那些攻读昆虫学的“老太太”们敲起暖气管子来抗议示威为止。可是这一天我却扫了大伙的兴，李小蕙喊了我半天，我也没理她。她们都过来摸额角、试温度，看我无精打彩，只好宣告周末音乐会改期举行。

我哪里知道，就在我急不可耐地等他、埋怨他的时候，他正在和魏大雄激烈论战，为了那份微不足道、谁也不感兴趣的“破总结”，几句直言，酿成了终身大祸。

开始他在党内受批判，后来扩大到我们团员和积极分子。

在批斗他的那些日子里，启明回避着所有的人，包括我。接连几天看不见他，找不到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机会，我真是急坏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象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消瘦下去。批判会上，每当他面孔煞白，象个千夫所指的罪人似的站在大家面前，每当发言的人用各种无情的、令人战栗的字眼和态度对待他时，我就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和心跳。在这种场合里，我

唯一能做的，便是独自一人坐在最后一排位子上，紧紧咬住嘴唇，眼里滚动着泪花，死命忍住不让涌上眼眶的泪珠滚落下来。有一天，我这样坐在那里，听魏大雄批判。他没有谩骂，也没有污蔑启明，但他那听去冷静的、振振有词的分析和推理，却正在把启明的言行导向一个危险的结论。我骇怕起来，身上发出一阵阵寒颤。我忽然醒悟到：原来在这些平日同坐一张课桌、一起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学之间，不仅有友谊与学习,散步与聊天,球赛与跳舞,劳动与幻想,而且还有一些别的、隐蔽的、强烈的带着某种血腥味的东西！我再也坐不下去了。我为启明担忧，更加想见到他。

这样的机会终于给碰上了。

一天晚自习后，我照例走上了我们常常一起散步谈话的那条校园中的幽径，心里充满痛苦和希望。就是在这里，我们曾手拉手地走到天明,而现在,在患难中,他却躲着我,不愿把自己的痛苦和我分担！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他，和他谈谈。正当我毫无把握地东张西望时，启明却迎面出现在我面前。苍白、抑郁、倔强,表情十分沉静。不过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坦率，那么纯真信任地望着我。

我不顾一切地狂奔上去，扑在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我们的脸偎贴在一起。这么多天来，大概是第一次，启明哭了，流出了委屈的眼泪。他的泪水沾湿了我的面颊，吝啬的男孩子的眼泪！我的心疼得颤抖起来。我们忘了周围的一切，久久地拥抱着站在那里，象一股温暖的洪流裹住我们，托住我们,把我们带走了。

启明长久地注视我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用灼热的手掌

拭掉我忍不住滚落下来的眼泪，我不由得低声呜咽起来。

“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来，我可害怕了。我每天夜里都梦到你，被人打得满头是血……”

“别说这些傻里傻气的话,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不过启明，我总觉得这么顶牛顶下去不是办法，要不你就认个错吧，邱良才不是在会上说了，只要承认错误，问题再严重，都会得到组织谅解。我看出来，不这样，他们是放不过你的。”

“问题是我没有错，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叫我承认什么！”

“我当然不是叫你去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目前全党全国范围内发动这样一场运动，说明总是有否定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存在，对这一点，你我总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吧。”

他没有吭声。

我看他并不反对，便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和他们也毫不相干。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你这个党员，还有我这个团员，会跟他们在思想上不谋而合？你的那些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为什么会跟他们如此共鸣，简直是如出一辙？这里难道没有值得我们共同检查的地方吗？”

有好一阵子，我肩上那只灼热的手掌停止了抚摸，启明凝视着我，思考着。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

“唉，怎么对你说好呢？小珍，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当毛主席发动全党对王明路线进行全面清算的时候，他去中央党校演讲，题了一句话，你听党课时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

“我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句话就是:实事求是!”他说,“这四个字,题在中央党校的大门上,也就是题在我们党的大门上啊!我作为一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必然要取得胜利的，而且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党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工作就不要一分为二了。目前，我们明明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忌讳？为什么要否认？这不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吗？……我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认真分析研究，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工作，防止今后一些错误东西的重复出现。小珍，这一切难道不对吗？过去组织上就一直这样在教导我们呀！”

我至今仍还清楚记得，启明那种激动的神情：他的眼睛一亮一亮，那只握着我的手在剧烈颤抖着，中间有几处他实在说不下去，只好停下来重重地喘着气。我被他这片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有一阵子，我觉得启明完全是无辜的，是正确的！但一想到明天批判会上，这个正确的人又要象个罪人站在那里，人们对他大张挞伐和声讨，我又有些犹豫了。

“启明，你说的这些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但你想过吗，这次邱良才为什么对你劲头这么大？实事求是的党课就是他给我们上的，难道这些道理他不比我们清楚？关键在于我们掌握的这些事实……我们毕竟只去了一个公社，了解的情况难免片面，也许你这样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个别代替一般,否定一般,对吗?”

启明忽然怒冲冲地嚷起来，推开了我。

我也猝然停住了。自己也不明白，这是魏大雄批判发言中的词句，怎么忽然会来到唇边。我立刻意识到这里的复杂性：从去年开始，魏大雄也对自己流露出特殊的热情，可我爱上了辛启明。从那时起，两个党员从表面看彼此并不存芥蒂，可班上的同学却悄悄议论，认为魏大雄还要努力从各方面和启明竞争。现在，毕业前夕，启明正在人生大路上顺利迅跑的时候，却忽然失足跌倒了。魏大雄正在昂然地、大步地朝前走去。

这一切，我原来以为都是无需劳神的小事，人们的琐议闲谈，本可一笑置之，不料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它却会在我们心理上造成影响，使情况趋于复杂化。

莫非他怀疑我也跟着魏大雄跑了？他难道还不理解我，把我看作爱慕虚荣、只能同欢乐不能共患难的人？我失神地望着他那又恢复了冷峻表情的脸。慢慢地，启明从我身旁绕过去,然后,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朝前走了。

痛苦和委屈塞住了喉咙，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我还是追上去，跟在他身后默默地走着。昏沉沉的校园路灯，从唐械和洋槐的茂密枝叶间照下来，只有当行人走到路灯下时才能见到亮光，周围却一片黑暗。我们就这样时而在亮处、时而在暗处地走着。我时而看见前面他那身材挺拔的背影，时而又消失不见。我忽然觉得我们的爱情仿佛也是这样，一忽儿充满光明，一会儿坠入深渊。此刻，我心中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对着前面那张脊背苦苦哀求：

“启明，在现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我们之间还要互相增加痛苦吗？如果我今晚上说的不对，你象过去一样尽管批评好

了。但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所说、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尽快结束你目前的这种日子。我恨不得马上就结束，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愿意延长！你不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看见你站在那里，神经就受不了。我宁可代替你去受十倍猛烈的谴责，让那些残酷无情的批判统统冲着我来，我实在不忍心让你再去受那委屈。我怕自己已经再也经受不起那种场合了。如果再有那么几次，我会发疯的！启明，我求求你，改改你的脾气吧！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就做个检查吧！反正半年以后我们就毕业了，我跟你走得远远的，无论去哪里，无论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埋头苦干它三年五载，我们毕竟还年轻，跌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

前面那张背脊象怕冷似的哆嗦起来，抽搐着，后来终于停住不动，猝然转过身来。于是在灯光下，我第一次看见他热泪纵横的脸。启明咬着牙，仿佛使着全身的劲儿说“别说啦，小珍，我明天就去承认错误！”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了。不久，宣布了对启明的处分决定：开除党籍，但考虑到后一阶段认罪态度比前有所进步，不戴帽子，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这个决定象雷击般把我震昏了。不是说承认错误就能从宽处理吗？我得承认，不论我作了多么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我们把结果想得多坏，我也没想到会把他开除出党！这太出人意料了，班上很多同学想不通，可是在当时严峻政治气氛的压力下，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而启明，我了解他，他常说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党的感情真的就象孩子依恋着母亲；离

开了党，离开了组织，他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一想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落到了心爱的人头上，这样的污点和耻辱要载入他清白的履历，眼泪便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当然我对这个决定没有丝毫不满。象我这样一个共青团员，党的积极分子，当时怎么敢这样呢，我连这样的一闪念都不敢有啊！组织是很神圣的，每一个基层组织都是党的化身。在我那个年龄，我不会想到组织也是那么几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水平不那么高的人，在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我不会想到他们也可能作出不公正的，甚至是错误的决定。我只是为启明担心，怕他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

就这样想了一夜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没料到，魏大雄来宿舍看我了。

这些日子里，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这个魏大雄了。我慌忙擦了擦脸，坐起身来。

“我知道,这些日子来,你很难过,”他叹了口气“:可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没有办法……

是啊，这能责怪老魏吗？我看着他因为失眠而显得浮肿的脸，心里有些软了。凭心而论，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魏大雄只做了他必须做的。不过，最后在党内讨论处分决定的会议上，他也许可以为自己昔日的挚友说句好话，“保”他一下，听说他没有这样做。他当时一言不发，沉默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业在即,利害攸关,谁敢冒“温情主义”“思想右倾”“立场动摇”的风险呢？

“黎珍,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魏大雄心情沉重地说“:但我并不打算表白自己，为了启明，我在邱良才面前，该说的话

说了，该做的事做了，所差一点，就是还没惹他骂我是辛启明的同伙……”

我没有理会他，等着看他往下说些什么。

“昨天，他又把我找去了，说对辛启明的斗争虽已告一段落，但对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批判他也好，处分他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现在，我们仍然要对他做工作，引导他朝前看。过去老话说，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这话不一定对，但说明事物可以转化。 象辛启明这样的人，改造好了，一年半载又能成为条好汉！”

我吃惊地抬起头来，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不过看老魏的样子，说的是真话。

“邱副书记是这么说的吗？”

“这是他原话。他还让咱们在启明临走前做些工作，鼓励他好好劳动,吸取教训,树立改造的信心。”

我内心的痛楚立刻减缓了些，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希望。

“启明什么时候走？”

“快了,听说就这几天。”

但是第二天他们就把启明送走了。

临行的时候,大家都在上课,没人知道。只有我,因为老魏事先已经透露，特别留意他的动静。我一发现老魏上第二节课时突然不见了，也顾不得老师正讲得精彩，悄悄偷跑出来。

送人的卡车已经发动，启明双手扒着马槽，忧郁的眼睛四处张望着,一看见我,就把手举过头顶,呼喊着：

“小珍!小珍！”

我不顾一切，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朝他跑去。

正在这时，卡车排出两股废气，车上的人一齐朝后倒了一下,车子开动了。

“别了,小珍,放心吧!启明朝我喊:“老魏已经全跟我说了,我会好好劳动,尽快回来!”

“我等着你,明白吗?”我跟着卡车,一边跑一边喊:“启明，我永远等着你……”

卡车越开越快。我发疯似地狂奔，看见启明在勉强朝我笑着。他远远伸出手来朝我挥动着，挥动着。

过路的行人都拿吃惊的眼睛瞪着我，但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奔跑得心都快要跳出来，要不是抱住路边一棵杨树，我怕是一头栽倒在尘埃中了。

卡车渐渐远去，远去，在明净蔚蓝的天空下，最后终于遮没在车轮扬起的尘土中。我心头充满别离的辛酸和痛苦，但也满怀希冀和信心，总觉得这不过是短暂的别离。启明很快就会回来，我们还会再见面。当时我哪里想得到，启明这一跤跌下去，想要东山再起，怎么可能呢？二十年过去了。那次分手，几乎成为最后的诀别！

四（辛启明）

她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说话？莫非我的沉默被她误解为责备和怨恨？啊，黎珍，原谅我，我不说话是因为这几年我已习惯于沉默，我已变得不会说话，不善于表达。现在，即使你愿意听，我也无法向你表述，见到你我是多么意外，多么满足，甚至幸福。因为二十年来我苦苦盼望这一天，现在终于来了。

我是多么想告诉你这一切！这无边的耕地是怎样在起伏不平的、长满沙蒿和白刺的沙丘上，一亩一亩开出来的；这纵横交错的条条渠道，是怎样从黄河的血脉上，历尽千难万险，一时一时引进来的……那时候这里的风沙大得怕人，在飞沙走石的夜里，我们的帐篷会连同固定木桩一起，被狂风拔走，睡眼惺忪的人们不得不起身追回自己的‘家”。现在好了，盖起了一排又一排砖房，有了居民点，有了气象站，有了鸡、羊和孩子们，有了医院、学校、商店和蔬菜瓜果田，一句话，我们也有了空气清新、田野澄静的春天！

只是刚才那个消息太叫人震惊、伤心！你为什么偏偏是刘军的母亲呢？刘军一点也不象你，不过这并不重要。这些年，很多孩子都变得和自己父母毫无相似之处，仿佛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两代人！主要的是，照这么说来，你在刚刚宣布结束的这场旷古未有的剧烈搏斗中，又失去了一

个亲人。我真不明白，命运的打击为什么要一次次落到你这个文静柔弱的姑娘身上，你怎么经受得起如此巨大的痛苦！现在，你来到我们伊赫沙漠作客，尽管精神抖擞地迈过一个又一个沟坎，但我一眼便看出，你的脚步已经不那么轻捷，不是当年那个在星光下和我手拉手飞跑的姑娘了。

呵，那时的情景，至今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你在看什么,小珍？”

“看星空,繁星满天,我在找一颗星。”

“什么星？”

“心爱的星。”

“哪一颗星是你最心爱的？”

“启明星。”

“……啊,我多幸福,吻我吧。”

“不,启明星还没升起。”

“它在东方,让我们跑着去找它。”

于是，我们便手拉手地奔跑起来，穿过寂静的马路，沉睡的住宅区，喁喁低语的丛林。觉得自己象是插上了翅膀，在一片透明的五月的夜色中向前飞驰着。年轻的人们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如醉似狂的尽情的奔跑！仿佛只有这样的奔跑，才能表达出燃烧在心中的炽烈的初恋，才能表达出沸腾在胸间的眼花缭乱的美好未来，和激荡在血管里的无穷力量。因为爱情本身便是一种不平静的感情的奔驰！

我们笑着、跑着、谈着，经过了许多许多住宅、园林和厂房，来到五月之夜的田野上，离城不知多少公里，却一点也不累。启明星从东方天边慢慢升起。在启明星下，我第一次吻了

她,感到多么羞涩、甜蜜、生硬,而且惊奇,半天半天,两个人都不敢看对方,只听见两颗心,合着一个节奏,都在狂跳。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

“是的,永远永远。”

“一起种庄稼、种粮、种棉、种麻,”

“还要种果、种花。”

“对!让祖国如花似锦,一辈子,哪怕只让祖国大地鲜花多几种,”

“哪怕只让祖国大地芳草长一寸。”

“哦,多幸福啊,吻我吧!……”

……

同学们很快就看出了我俩的秘密,他们不再蜂拥在我们周围,而是有礼貌地、善意地回避开去,好让我们安静、单独地呆在一起。

只有魏大雄仿佛没有觉察到。他是全班公认的‘马大哈’,外表鲁直,说话从来高声大嗓,哗啦哗啦,大大咧咧地还象从前那样,在我俩身边转来转去,有时把黎珍叫走,和她作长时间的‘个别谈话’,了解思想情况,有时还买两张电影票,单单请她去看。

同学们因为他种种“不识相”的行动笑得前仰后合,大家觉得有趣,不跟他说破。我也觉得滑稽好玩,象是一出无伤大雅、没有什么害处的幽默喜剧。

但黎珍却受不了,她单纯率真,喜欢自己身边一切都很明

朗。是的,明朗而不是嗳昧,从不含糊其词,这是她的个性。因此她跑来找我，露出一脸窘相。

“你看老魏多迟钝，你得跟他讲一讲，我们已经好了。你看，他又约我看电影啦。”

“跟他看电影怕什么，难道我能垄断跟你一块看电影的专利权吗？”

“哎哟,你倒挺大方!”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爱情上是个百万富翁！为什么要去嫉妒老魏？再说，他这个人除了有点好扯顺风旗的毛病外，一般说来是不错的。他可能也爱上你了，但这不是他的罪过，我怎么好去叫他走开呢？”

后来黎珍只好自己去跟魏大雄说。可她哪有机会开口，话题一转到我身上，老魏就岔开了。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明白地表示过自己的感情，连个拒绝的机会都不给她，把黎珍弄得啼笑皆非。

事情发展越来越不象话了，无论是在教室、阅览室还是饭厅里，他老是紧紧地跟在她身旁。玩笑开过了火，后果将会有一定的严重性。我于是决定找他，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

“大雄，你该祝贺我，我有了女朋友啦！”

“嗬 祝贺你,那得请我们吃糖了,走走走!”

他并不问女朋友是谁，只是推着我往小卖部走，这一点真说不上是他的马虎还是精细，因为换了别人，这句话是一定要问的。我迟疑了一会儿，不得不进一步向他说明：

“老魏,我和黎珍的关系,……已经肯定了。”

不料魏大雄显出一副十分惊愕、仿佛受到意外打击的脸色。

“什么，什么？启明，我真没想到你……”

“哎哟，老魏，你怎么啦？别开玩笑！”

“你才是开玩笑呢！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你怎么了，老魏，难道你真没看出来？”

“看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她，我早就对她……”

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老魏这一下子就把我甩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中，仿佛不是他魏大雄，而是我辛启明硬挤进来，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后来插入者的角色。啊呀，这个老魏！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摇摇头走开了。

以后那些日子，魏大雄显得闷闷不乐，象是受到伤害，引起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以为真是我抢走了他的心上人。

黎珍气坏了，这太莫名其妙了，她什么时候眼魏大雄谈过这一类问题？无聊！她要去找老魏说清楚。

“算了算了。”我劝住她：“不必说清楚，也说不清楚。男孩子常常以为女孩子对自己有意思，神经过敏。有人还拿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事儿想入非非、大吹大擂呢！”

“可是，搞得这么满城风雨算什么呢，对你多不好！”

“我不在乎，事情总会过去。我现在倒有点可怜老魏。如果他真的锺情于你，就不要再去刺激他，不刺激也够他烦恼的了。小珍，你说是吗？”

“想不到你心地这么善良，啊，启明，你真好！”

后来，是魏大雄为了报复，狠狠搞了自己一家伙吗？我没

那么想，包括对邱良才，我也不认为是出于他个人的偏见。在那件事情上，只是结局太叫人意外。那时，我们真诚地相信着：承认错误会得到宽宥，虔诚改造能换来信任。现在想来，真有点讽刺意味。不过在当时，还就靠青年人的这点单纯劲儿，才给了自己一点力量。

来到伊赫军垦农场，我心里乱极了，除了离开党的队伍所感到的孤单与痛苦，最揪心的是觉得对不起黎珍，辜负了少女的一片深情。唉，在我们那个年龄，人们把爱情看得多么宝贵，多么圣洁！一旦把命运同心爱的姑娘结合在一起，就要求自己在一切方面、一切事情上都变得美好起来，绝对不能对爱情有丝毫的玷污和辱没。但万没想到，现在，因为自己，却使心爱的姑娘蒙羞受辱。有什么办法呢，事已至此，唯一能补救的，便是按黎珍临行时的叮咛：拚命劳动，好好改造，在劳动中求得谅解，尽快回到党的怀抱，回到她的身边。因此，一到农场，我根本不顾旅途上几天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便跟着战士们出工了。

曙色初露，嘹亮的集合号声，在这茫茫大漠中传得很远、很远，雄壮而又带点苍凉。人们很快站下了黑压压一片，在一阵报数、口令声之后，迅速地分成几路大军 有的去挖渠，有的去种树，有的去搬沙，有的去修路。我跟在队伍最后面，感到一种伟大进军的气势。

原来伊赫军垦农场（现在的东风农场，那会儿只是它的一个分场），当时刚刚组建，什么也没有。来自部队的大批复转军人，住在有数的几顶帐篷和临时挖就的、同上古穴居时代相差无几的‘地窨子’里。一出住所，四周便是荒寒漠野，黄澄澄

的莽原，向四面八方无限地伸延开去。我们的农场，就好比这无边无际沙海中的一粟！十年以后来到这里住上了红砖房的知识青年，曾经觉得自己被遗弃在天的尽头，面对连绵不断的沙丘，面对这大片沉睡的处女地，他们觉得与世隔绝，再也回不到亲人身边，由几个彪壮的小伙子领头，表演过一次“大合哭”。他们朝蓝天和旷野放开了喉咙，用高低不等的声调嚎啕大哭，把场部的同志吓得手足无措。而当时第一批拓荒者，部队各级指战员，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惊人的勇气和毅力。

我因为领劳动工具耽误了一会儿，等赶到现场，向沙漠夺田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十几辆开地的拖拉机，在漫天滚滚的黄尘笼罩下，时隐时现地爬动着，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远处迎风畔上，插沙障的人们挥舞铁锹，铲沙挖壕，飞快地把柴草直立着埋进沙里。压沙包的队伍，象当年攻克无名高地一样，冲上包顶，用一筐筐粘土把沙包覆盖起来。我好容易才找到自己班的人，他们正突击搬沙丘。向班长报过到后，我立即挑起两筐装得最满的沙子，一步挤进人挑肩担的长长的人流里。这时，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黄河彼岸冉冉升起，把人们劳动的身影，投射在明沙梁上。由于来回奔跑，影子飞快地在沙梁、沙坡、沙丘上弯曲、晃动，使得这改造沙漠的劳动气氛越发地热烈起来！

头一次在沙漠上担担行走，脚踩下去，象踩在雪堆里一样，松软柔和，悄无声息，觉得还挺有趣。而且我很快发现，这里土层条件不错。在表层的沙子覆盖下，是一片土层厚薄不等的红胶泥地，就是西北农民最欣赏的那种“沙盖楼”土。只要把大的沙丘搬走，把沙子摊平，用拖拉机一翻耕，沙土和红

胶泥拌合在一起，就成了很好的土壤结构。我很佩服选中了这块地方作为改造沙漠起点的那个人所具有的内行的眼力。

走了几个来回，我开始感到小腿肚有点发痠僵硬。看看身前背后一起担沙的战士，他们还是轻松自若，健步如飞。我以为是棉衣在妨碍自己，干脆一把扒下，甩开膀子，快步前进。但过了一会儿，脚下又渐渐地不济了，越是想快，后脚越是往后趿溜，体力消耗得也越是厉害。后晌，竟连迈步抬腿都有些困难了。我咬紧嘴唇，使出不顾死活的猛劲，把箩头装得满满，踩着前头的脚印，挣扎着向前。

第一天下来，我觉得自己累得都麻木了，机械地走回地窨子，饭也没吃，一头倒在铺着麦秸的地铺上，心里却感到十分宽慰。

“小珍,我记着你的话,这第一天,我是尽了最大努力来好好劳动了。我要这样干下去，一直到跟你相见的那一天！”

三天过去了，在沙地上担担走路好象开始习惯，肩膀却压坏了。第四天，移沙造田进入高潮。我们那个地段，只剩下个又高又陡的大沙包。这沙包比较难弄，因为退沙畔上长满了荆棘丛生的白茨，一蓬紧挨一蓬，胳膊粗细的根须，盘根错节，扎进地里有两丈来深。这天正好是个风天，我站在退沙畔的下风口，一边砍挖白茨，一边撮沙装筐。四周几十张铁锹扬起的黄沙,被风一吹,纷纷扬扬,直朝我眼睛、鼻子、嘴巴和衣领里灌。这么干了两小时，排长让别人把我换下来。

大概因为在尘沙中干的时间过长，我担起沙担，感到胸口憋闷，呼吸不畅，脑袋也有点昏沉沉的。快到中午时，这种感觉更加剧了。我头重脚轻地挑着一担沙子，要往风蚀坑里倒

的时候,忽然间一阵晕眩,两腿一软,眼看要栽进坑里去,一只大手猛地扶住了我。一个年纪不轻的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张锹。显然刚才我累糊涂了，没有留意到这个平沙的人一直在注意着自己。

“你该歇息啦,伙计!”那人笑眯眯地说，声音犹如洪钟一般,咋一听到,都不相信人会有这么好听的嗓音“你干起活来真有股子猛劲儿!”

“我刚来,劳动不好。”

“我已经注意你三天啦！应该说很好！”说着帮我把箩筐里的沙子扣在地上“看看,这沙堆,谁有你担的多?”

我这才看清那人，他长着一张淳朴和蔼的面孔，但那双眼睛,却很刚毅、威严,炯炯有神,看人时,从压得低低的军帽帽檐下，闪射出一种阅历很深的犀利的目光。

“看来你缺乏经验。要有长期作战的观点嘛！”他指指身边过去的那几个战士的担子，“装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象你这样干法,几天工夫就得趴下罗!”

“没什么,我能坚持,我一点也不累,真的。”

“好了好了,”那人挥挥手,撩起敞开的军服下摆搧忽着，“在部队上时,我对这种‘一点不累’可领教够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看，都中午了，战士们热得只穿件单褂子，你连棉衣都还不脱,也因为‘一点不累’是不是?”

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脸红了，下意识地紧了紧身上的棉衣。

“请吧,脱下来让我参观一下吧!”

没办法，只好脱下棉衣，露出了肩膀头子。虽然昨天我悄

悄地绑上了点绷带，但脓血仍然渗透白纱，露出了污迹。

“你大概不至于要我请求你，为了有始有终地参加战斗而保留一点自己的力气吧！”那人皱皱眉头，但声调却始终是亲切的，“看来我只好行使权力了：你现在立刻去医疗站换药！”

中午休息时，我从医疗站换好药出来，经过指挥部那顶大帐篷，忽然从虚掩着的门缝里，传出一个十分好听的洪钟般的讲话声，口气听去是在发脾气。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监督劳动又怎么样？身体垮了能劳动吗？不能劳动还谈得上什么监督？鬼吹！不要管它那一套！”

我一怔，这不是在说我吗？这嗓音怎么这么耳熟？想起来了！是上午在风蚀坑边跟自己说话的那个人。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里面声音继续在说：

“我重申一遍,从现在起,从我做起,农场各级干部,一定要关心和爱护自己下面的人，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人。本来，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过去我们靠这个，保持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战胜了敌人。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不需要这个传统了？我看，谁不要，谁就得受惩罚！”

我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慌慌张张，几乎象逃一样地从指挥部门口走开。我真没想到，先前和我说话的人，原来就是人们时常带着自豪和敬重的口气谈论的老吴场长啊！才来几天，我已经听说了不少有关这位战功赫赫的老红军的故事了。

当年，是他代表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来这里商谈“和平解

放”的事项。尔后，在剿匪平叛战斗中，跟着他工作的一个文书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如今，长眠在公路旁边那座立着块褐色墓碑的坟墓里。当时，为了给战友报仇，在最后追击围歼叛匪时，场长飞身跃到匪首骑座，两人扭打着，从马上滚落下来，场长把匪首压在身子下面，用他两只过去挖煤的大手，把那家伙紧紧卡住。那匪首胖脸紫涨，两颗眼珠子从眼窝里“噗哧”一声蹦出来。终于在场长那双铁钳似的大手中毙了命。但谁也想不到，这位笑谈渴饮顽敌血的戎马英雄，却有着一副过分善良的菩萨心肠。听老战士们讲，早先在部队上时,他家属叫场长杀鸡,他摇摇头说“:咱下不了手!人家给咱们服务好几年啦，吃了它下的蛋，如今还要吃它的肉。啊哎哎,咱们不忍心呀!”因此，他家虽养着不少鸡，但却吃不上鸡肉。每年“八·一”节，场长都把要处理的母鸡送给部队食堂，改善战士伙食。

可是就连这样一位大家敬重的领导，因为关心了一下我这个“监督劳动”分子的身体,竟也似乎受到某种“非难”。我心里一方面对吴场长十分感激，另一方面，也一下子看清了自己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多么卑下而又可怜：我仿佛变成一种政治时疫，谁挨上我谁就得倒霉！

午后上工前，班长传达完指挥部开会精神后，忽然想起似的说，最近全班卫生不好，叫我回去用两天时间搞一搞室内外环境卫生。

我当然明白这中间的来龙去脉。但尽管这样，两天后又回工地上来挑沙时,我总是躲着老吴场长,避免跟他讲话,只要一看见他站在那里平沙，我宁可绕路多走几步，把沙担倒在别处。

一天中午，食堂改善伙食吃包子。我舀了碗汤，抓起几个包子，离大家远远地，独自一人坐在沙丘旁吃着。忽然，吴场长也拿着几个包子凑过来了。

“哈哈，这回把你逮住啦！捉迷藏的把戏可以结束了吧，啊？”场长一边说，一边在我面前蹲下来，声音还是那么好听、洪亮。

我没言语，低着头，只顾自己大口大口地咬着包子。

“听说,你学的是土壤生化？”

我点点头。

“伙计,我有个要求,收我当个学生怎么样啊？”

我停住了咀嚼，抬起头来，大概脸上惊愕的表情太明显，惹得场长哈哈大笑。

“我这可是当真的！既然党把我们派来跟土地打交道，总不能长期居于外行，得向懂行的人学嘛！”

“场长,这说什么也不行!”

“好了好了，为了减轻你的压力，咱们不提学生不学生。往后,我这方面有不懂的问题,就来请教,这总可以吧？”

“你想这么做就这么做吧，反正我不配。

“那就一言为定啰!场长说着，举起手中那碗高汤，在我碗边碰了一下，“来！把这家伙干了！过两天，再正式请喝酒，补个拜师仪式。”

喝完汤，场长用手抹抹嘴角，往前凑了凑。

“最近,”他说,“我弄来了几本有关土壤改良的书,不瞒你说,很多地方简直是干瞪眼。你比如说书上讲‘团粒结构’,我就说不清它是什么玩艺儿，反正重要得不得了。没有它，庄稼

不能生长。可咱们沙地里短缺的偏偏就是这‘团粒结构’。最近我总在想，咱们眼下辛辛苦苦把地开出来，下一步，文章就得做在这‘团粒结构’上了,要不,庄稼长不好,白扔种籽,地开得再多也白搭。”

说到土壤改良，我情绪不由振奋起来，话也多了，从土壤结构和分类，到团粒结构与土壤肥力的关系，有机肥在促进团粒结构中的价值以及合理的耕作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长篇大论地对他讲起来，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场长听得那么用心，那么认真，说到开心之处，他便冲着我哈哈大笑一阵。之后，话题又慢慢扯到我们过去的学校生活，家庭情况。我觉得和这个领导同志在一起很随便，没有丝毫的不自在。他处处让人感到自己和他是同样的人，是平等的，可以信赖的。所以谈着谈着，连我自己也不觉得，竟把和黎珍的爱情，自己受批判，和临来时黎珍的嘱咐，统统向他倾诉出来。

“原来如此！”场长咬了口已经变凉的包子，用劲地咀嚼着，仿佛这时才尝出点味道来似的，“想不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着，他从蹲着的地上站了起来。

“怎么？”我也跟着站起来。“我这么想不对吗？”

场长额上堆起思索的皱纹，吟哦一声。

“怎么说好呢？”他摸摸下巴颏上的灰白胡茬,想了想,“毕竟还是缺乏经验。”

“这与经验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他扬了扬眉毛,“你要再多工作上一段时间，就会懂得更多的东西了。当然啰,毫无疑问,你努力劳动,改造自己,这是对的。我想,你会成功的。”

于是我除了拚命干活外，还时常给学校写信，汇报自己情况,争取早日返校。

时间就这样缓慢地流逝过去。有时把苦恼忘却在疲乏但却使人兴奋的劳动之中，有时又感到难耐的孤寂和沉重。

小珍不断给我来信，每星期至少一次。信里诉说着思念，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劳动，不管多苦，要坚持下来，以求组织早日谅解 告诉我,两人合作的那篇论文,她依然在继续努力,但一个人很困难。她还告诉我学校的一些情况：同学们的成功与挫折；大学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邱良才调到学校党委组织部，正在青云直上等等。没有这些充满活泼朝气和一往情深的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忍耐下去。

这样过了半年。这半年里，农场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经过一冬奋战，昔日海海漫漫的荒漠沙滩，如今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平整农田。引黄灌溉工程已经完成，新近竣工的渠道，象棋盘格子似的展现在眼前。头年栽下的第一批防风林带，已经向上舒展枝条，抽出嫩绿的叶片，象孩子们的小手，在微风中呼唤着伊赫沙漠春天的到来。

但我的“改造”却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写给学校的汇报信，每一封都石沉大海。黎珍的来信也显得焦灼不安，而且也渐渐不提返校的事了，让人有些纳闷。

农场夏田里的第一代小麦，经过分蘖、拔节、孕穗、乳熟、蜡熟，最后终于成熟了。沉睡两千多年的沙漠，按照人们的意志第一次产粮了！那些日子，全场上下，象过节一样高兴、忙碌。为了多割倒点麦子，每天人们凌晨四点便起床下地，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清手里的镰刀尖才收工。

我也很紧张。黎珍来信说，毕业分配方案已经宣布了，问我她的志愿该怎么填写？为了我的事，她几次找领导，都只说再研究一下，没有明确答复。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内心的焦急和痛苦。后来，忽然连信也中断了。我急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那几天，我真是坐卧不安：白天，人在麦地里，头顶着火焰般的烈日，脚下沙土里，涌上来一阵阵令人窒息的、夹杂着各种腐殖质气息的发烫的蒸气。就在这寻常人们难以忍受的艰苦条件下，我一边弯腰挥舞镰刀，一边却在心里苦苦惦记黎珍来信。晚上下工回来，头一件事，拖着两条铅一般沉重的腿，去场部新盖的值班室红砖房，仍然为的是看看有没有信。但每次都使我深深失望。管收发的同志抱歉似的朝我笑笑，想安慰我，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是麦收后的一个休整日，那天我正垂头丧气地从值班室出来，迎面遇见场长，他好象顺便路过：

“啊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场长亮开他那好听洪亮的嗓门“伙计,走走走!”

“去哪儿?”

“去家呀,喝上一杯!”场长象是丝毫没有觉察到我沮丧的情绪,大大咧咧,兴头十足地说：

“我家那口子刚从陕北老家探亲回来，带着两瓶延河水酿的‘兴奋剂’,趁这两天农场休整,补一补上回的拜师仪式。另外嘛,我还有些关于土壤改良的想法,要跟你谈谈。”

在去场长家的路上，我忽然想到：也许，可以通过农场党组织，向学校催问一下我的事情。哎哟，我怎么把场长给忘了。这可是个好人哪！

于是，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等待时机，提出自己要求。然而场长也若有所思地慢慢喝着，几次想开口，几次似乎又都由于下不了决心，中途改变了主意。这样，当开始几句说笑过后，我们两人竟面面相觑，默默地喝起闷酒来。最后，老吴场长拿起酒壶，十分郑重地在我和他自己杯里斟满了酒。

“来,干!”

“场长,这我不行。”

“把它干了,我有话跟你说!”

说着一仰脖，带头把酒喝干了。他见我也亮出杯底来，高兴地拍拍我肩膀：

“很好,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他朝我望了望。我一动也不动，仔细地听着。

“伊赫农场要在沙漠里站住脚，为国家多拿粮食，一定要制止风沙，为此，我们成立了治沙站；另一条便是要改良土壤，提高沙漠土壤的肥力。这件工作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农场党委决定成立试验站，想让你专门搞这项工作。”

“哎哟,场长,你是知道我的呀!”没等场长说完,我便失声叫起来,“我现在是监督劳动,身份不合适,再说,再说我在这里是临时的，这两天学校恐怕就要叫我回去，为这事，我正想跟你……”

场长抬起手来，在空中轻轻地按了一下。

“这个我知道。”他停了停,象在心里估量着什么,一边想一边说：

“不错,原来是临时的。但昨天,接到你们学校文件,正式通知你，就地安排，不回学校参加分配了……”

场长最后几句话说得很轻，但在我听来，却犹如晴天霹雳,手里的酒杯,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场长平时威严的眼睛里，在这一刹那间，闪现出十分柔和、亲切的目光。

“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没有办法。”他声音低沉地说“当然，我们可以不接收，但这个你也明白，不留这里你能去哪儿呢？留给你选择的地方不会比这里好多少！至于那个对象嘛，最好动员她来……当然，马上来有困难，以后这里条件好了,再慢慢想办法。”

两颗男人的热泪，十分吝啬地在眼眶里滚动了一阵，还是不听话地掉了下来。这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失态，在场长家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黎珍的信也来了。说分配名单宣布了，没有我的名字。为此事，她上上下下找了许多人，毫无结果；连老魏对自己一年前讲过的话都概不认账，真气死人！至于她自己，宣布她留北京她并不稀罕，只希望能同我在一起……她要我赶快回去一趟,以作最后挽救。……

然而，此时，我已经彻底明白了。我已经冷静下来，能够比较明晰地看到自己的前景：没有指望了，经过这一通“整”，无论怎样努力，要想回到原先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这一辈子，恐怕注定就在伊赫沙漠上了，没有音乐，没有花朵，没有甘泉和绿荫……前途就象这单调的漠原般莽莽苍苍，浑沌一片，直到地平线,——生命的尽头。场长说得对，对我来说，这是所能选择的最好一条道路。说实在，我也不愿意离开场长,离开农场,这里需要我,了解我。而黎珍呢，柔弱的、幸

福的、一帆风顺的姑娘啊，象只翅膀轻快的小鸟，她虽然幻想过拓荒者的艰苦生活，但那是另外的一种，是被信任、受尊重、充满创造性劳动的快乐的那一种。就算她能适应伊赫沙漠严峻的自然条件，她能忍受这“反党分子”低人一等的处境吗？还有她的家庭，那两位慈祥、温顺的老人。他们是循规蹈矩的，胆小、本份，习惯于平平安安。他们的家庭气氛始终充满一种脉脉温情。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双亲，不可能接受象我这个开除党籍、被打落水的人。看见女儿跟自己到伊赫沙漠受一辈子罪，那对老夫妇真要伤心死的。

为了黎珍，我得放弃黎珍！正因为我太爱她了，我得离开她；为了她一生的幸福，我得忍受一生的痛苦！

我给黎珍寄出了最后的一封信：

亲爱的珍,我心中的瑰宝,让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吧 现在是伊赫沙漠的凌晨,但我还是无法安睡,已是连着几个夜晚,我在沙漠上独自徘徊,抬头仰望,看启明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和我们头一次一起看见它时那样明亮,那样晶莹,一闪一闪,离我们是那样的近,好象要说话。啊,我战栗了 幸福的星辰,已经从我头上陨落,对你来说,我不再是一颗沿着正常轨迹运动的小星,我是你的灾星,我是你的痛苦 我要让自己从你眼前消失,永远留在遥远的沙漠里。因为这是我眼前唯一能做的一件替你着想的事！

也许,你会说我心肠太硬,可是,在我目前的处境下,心肠怎么能不变硬呢 珍,我就象看见面前这条曲曲折折、时断时续的泥泞小路一样,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我的路很艰苦,很漫长,要准备走这样的路,心肠只好硬一点。这对你我都有好处,而且也是必要的。

记得从前，当我们还没有说出那句心底的话，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想望你的时候，我为你写过一首小诗：你是明媚的春天，我是沉默的严冬；我俩靠得如此之近，却又离得那么的远！想不到如今我正在经历着这种情景。我们永远不能在一起了。

关于土壤的论文，只好请你独力完成了。我相信它是有用的。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土壤极其瘠薄，为了祖国大地覆满沃土，你一定要完成它。至于我，别为我耽心，我尚不会沉沦，所以，忘掉我就行了。

我很快要离开这里，深入到更遥远的沙漠腹地去，不给你地址了。

原谅我吧！

五（魏大雄）

我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大学时代却结束得很顺利。

邱副书记说到做到，按照他的选留标准，毕业分配时，虽然由于系里一些教研室主任的反对，没能把我留校，但还是把我分配到了一个众目睽睽、令人羡慕的单位——部所属管理局。

平心而论，根本轮不上我去。那个单位，对业务等各方面要求特别高，班上比我学得好的同学有的是，但谁也无法同我较量、匹敌。这件事给我印象太深啦。它所启示的经验，比那个位置本身的价值要大得多！我好象忽然间看出了一条人生道路：对于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没有知识，这并不重要。过去说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看来,这旧知识分子吃业务饭的道路真的是走不通了。眼下重要的是政治，是革命，是红！这条路，走起来既名正言顺，又能得到实惠；即使有点个人小算盘，领导上也容易体谅照顾。不是嘛，由于我的暗地请求，连黎珍也留在了北京。

但是她没有报答我的好意，很快和别人结婚了。我在北京过着令人苦恼的单身汉生活。白天上班，三顿吃在食堂；下了班,什么事也没有,没人等你盼你,没人亲你疼你,甚至也没人同你吵架、怄气。星期天更是冷清、孤独、无聊,……唉,我们到了那种需要女人、需要家庭的年龄啦！看来，不论在北

京,还是巴黎、伦敦,没有家就没有意思,还不如回老家守个热炕头好。

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各部门大量下放、精简干部。我反复地分析比较：同科室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还有几个是高级干部的亲属。我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青年学生，业务上又不出色，是无法同他们抗衡较量的。从日后发展来说，这里积压在我前头的人这么多，也很难有出头之日。再说那时，北京的生活也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了，副食品供应日见稀少，粮食供应严格控制，任何形式的多吃多占都被看作思想上的动摇，道德品质上的堕落。我一向食欲旺盛，饭量很好，简直觉得走投无路。要在家乡，说什么也要灵活得多。

出于这种种考虑，我响应号召，主动报名要求下放，带着一份组织介绍信和一个很好的鉴定，回到自己家乡来了。

刚一开始，工作并不理想，把我分配到农业专科学校教书。我对吃粉笔灰没什么兴趣，苦恼了一阵之后，开始为有更好的用武之地奔走，刚刚有点眉目，一次偶然的机缘，帮助我提前结束了清苦的舌耕生活。

那是一次外出回来，西行的列车上，我有了一次后来人们常常拿来开玩笑的“艳遇”。

和我同座的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姑娘。她长得很讨人喜欢,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水灵灵的眼睛,有一个微微翘起的小鼻子，使她显得又稚气、又逗人。她是真正的北方姑娘，那种高头大马式的女子，健壮的、发育得很好的身躯，象一个成熟的女人，而神态和性格则完全是个孩子。

我们很快就混熟了。凭着我那点阅历，她全听我的：北京的名胜古迹，新上映的电影，还有新近宣判的一起杀人案件全部破案经过……她都听迷了。在她心目中，我大概算得个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物”。

我们一起去餐车吃饭，我请她，买了好几种菜，还有酒。我的海量使她大为满意，她说她父亲酒量也不错，我问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她笑而不答。我们就这样在餐车里浅笑轻谈，象一对早已熟识的朋友，坐了很久很久。我知道了她的姓名：吴若梅；年龄：二十岁；文化程度：高中一年；职业：地委办公室打字员。

漫长的旅程变得那么短，我们还没有谈够，就快到站了。年轻的姑娘着急起来，她带了好几个大包小包，要是接站的人不来怎么办？

“这还用犯愁？”我举起两只大拳头：“看看这劲！”

她笑了，说：“那最好家里别来人接，你就顶得上一辆小吉普！”

果然没有接站的人。我把她的两个旅行包拴在一起，象本地老乡的背褡一样搭在肩上，两手又提着她的两个大网兜，我的样子，又引起她一阵好笑。就这么蹒跚着，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去。我们刚穿过马路，吴若梅忽然高兴地喊起来了：

“爸爸！”

人群中，一个头发斑白、干部模样的人，推着辆自行车朝我们走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不久前才到任的地委书记吴根荣了。吴书记一边热情地接过提包搭在自行车后架上，一边数落姑娘：

“算你运气,今天我正好有这么点时间,要不,怕要把这个小伙子给累坏啦!”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好听,洪亮宽厚,象个歌唱家。我晕头转向地笑了笑，真没想到啊，若梅竟是吴书记的女儿！

以后发生的事就非常简单明了，我堕入了情网。电影院半明半暗的池座中，市郊新建一半就停工下马了的公园里，经常出现我们两个的身影。她对我很崇拜，父母说不出什么不好，就这样，我终于成了吴书记家的一员。工作立即调动了，按我的愿望,调到农林局当秘书“投笔从政”,步入仕途。

起初岳父对我这样做似乎有些想法。但后来，听说我勤快，工作中有一种笨鸟先飞的吃苦精神，慢慢赢得了他对我的好感。有一次，我们的谈话不知怎地转到了我的大学、老师和同学身上。岳父忽然想起来问道：

“你们学校有个叫辛启明的,你认识吗?”

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知道辛启明？忙问：

“您认识他?”

“嗨,我来地委前,是管军垦农场的嘛!”

听他这一说，我有些警觉起来，不知道老头子是什么意思。我担心启明在他面前，会说出一些不利于我的话来，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但老头子似乎没有觉察我情绪的变化，自顾自地说下去：

“听说他是因为说了两句真话,把党籍丢了,是吗?”

“是——啊！”我小心翼翼地应答着，一边揣摩他的心思，“刚开始,我的思想也不通,替辛启明说了许多好话,挨了领导一顿批评……”

“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三年的困难时期，有些问题总该比较清楚了嘛！”说到这里，老头子好听的嗓音忽然低沉下去，“唉，这几年我们党内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如从前了。有些党员，不说真话，甚至把一些假话加以合理化，合法化，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小魏啊，我事先正告你，你要是也这么搞起来，咱们就分家。我一辈子最见不得就是那种人！另外嘛，我和若梅也说了,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搞特殊。”

话虽这么说，但实际生活中，和吴书记的亲戚关系却象一把钥匙，给我打开了各方面的门户。这一点是很微妙的。岳父是个奉公守法的老头，他律己很严，子女中除了若梅娇嫩一点，留在身边以外，其他的都在远处做平凡的工作。但是他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却格外关照我这个“乘龙快婿”,不论是出于照顾他、还是讨好他的愿望，实际受惠者的种种利益，都降临在我的头上。而且事实上，在地委工作的一批青年干部中，无论就学识、才干还是办事能力，我确实又称得上是个佼佼者。因此，当上面下来精神，要在大学生中选拔培养县委书记,有些热心的人便竭力保荐我,把我定为接班人“苗子”。

在我面前终于展开了我所向往的广阔的发展前途。我带职下放基层锻炼一年。当时正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我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我精神抖擞，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行严厉打击，对干部和社员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揭发。我蹲点的经验上了社教简报，被推广开来，这更鼓起我的雄心。

就在锻炼即将满期的时候“文化革命”爆发了,老丈人第一批就被揪了出来，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揭发中，许多问题

涉及到我。消息传到我所在的公社，那些被我整下台去的干部，那些被我批判过的热中于搞“自发倾向”的群众，一个个跳出来，把我也闹了个人仰马翻。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不好过的。我象一个在天梯上攀登了几步的人，一下子被抽掉阶梯翻身落水，腾云之路眼看成为泡影。我不能不紧张地探听消息、观测风向、分析形势。形势越来越恶劣，老吴头又牵涉进一个“反党集团”案里，被抓走了。家被抄得一塌糊涂，岳母被撵出原来的宿舍，只好住到我们家来。

夜里，一家人都挤着睡下了，我睡不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安稳地睡觉吗？坐在桌前，一枝接一枝地抽烟，想着心事。

我这一辈子也许就这么完了。多少人因为家庭和社会关系受了株连。我想起了辛启明，如果没有那个不法资本家的叔祖父，对他不至于那么严厉。现在有这么一个“黑帮”岳父，不但自己，将来连孩子们也抬不起头来。我太清楚这株连法的厉害了！再说，老吴头的历史我不了解；他现实的表现，领导层内的斗争中挂的是哪条线，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我更不知底。就算这些都没有大问题，又有什么用呢！当年辛启明不也是这样吗？他究竟有多大问题呢？他谈到的那些个事，用眼下的话说，不就是浮夸风嘛。但还不是照样倒霉，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看来，老吴头也很可能同样下场：运动需要他成为“走资派”，他就得是，而且一辈子都得是下去，甭想有出头之日。这真是太可怕了！

若梅已经睡熟了，她一只手搂着儿子，另一只胳臂搭在被外。生过孩子以后，若梅就象个发酵的面团一样肥胖起来，本

来就简单的脑袋瓜，由于不用而更加简单了。凝视着这只肥白浑圆的胳膊，我眼前忽然出现了黎珍的倩影，如果不是因为她，不是因为她占据着我的心，我本来是可以同别的女同学接近的，本来可以组织另外一种家庭，也就不会有眼前这些倒霉事了。

儿子哼哼了两声。我站起身，走到暖炕旁边，朝那个睡着的虎头虎脑的儿子望了一眼，小脸稀脏，上床前因为大人情绪恶劣，谁也顾不上给他洗漱。我又凑近地望着若梅那张酣睡的脸，她仍然年轻、好看，正是妇女们象鲜花那样盛开怒放的年龄。有些女人睡着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可爱。若梅就是这样。这些日子她完全慌了神，除了哭，就是象孩子一样求助地望着大家，要不，说一些毫无顾忌的蠢话，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添乱。

年轻妻子的呼吸是暖烘烘的，弯下腰，立刻就嗅到了她的身体发出来的温暖的气息，带着哺乳母亲特有的奶味。这种气味总是激起我难以忍耐的欲望。不，我不能没有她！她和孩子，是我的，我必须同她们紧紧连在一起，而丈人丈母娘，则是另一回事。

若梅忽然醒了，吃惊地望着我，大概是由于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的脸色很难看。她慌了：

“你，你干什么？还不睡？”

“睡不着。”

“出了什么事了？”

我长叹了一声。

“还在想我家的事吗？”

“怎么能不想呢？老太太搬到我们家住，这步棋……事关重大！”

“那怎么办呢？”若梅又快哭出来了：“她现在没有地方去，说什么也得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何尝不这么想来着，可是……唉！”

“可是什么？你准不会把她从咱们家撵出去吧？”

“你别说这些蠢话好不好？”我又来气了：“我在想，要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好。”

“那你想出来没有呢？”若梅一边问，一边披衣坐起来。

“……若梅，你妈能不能先去你大姐那边住上一段时间？”

“去东北？这么冷天，她身体又不好，路上一个人，不行！我不放心。”

“嗨，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不看看形势！”

“我不管！反正我不能撵她，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

“看，又说蠢话了不是！”我终于按捺不住地发作了：“不管事实怎样，别人就这样认为：她要是跟着我们，我魏大雄就罪加一等！因为至今还跟吴根荣划不清界限，我就得把这个黑锅背下去，将来还影响我们的孩子。你总不愿意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完蛋吧？本来，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现在闹得……你知道我身上压力有多大，都是叫你父亲连累……”

“你胡说！”若梅气白了脸，冲我嚷起来：“你倒霉全是自作自受！你整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爸爸当时提醒过你，你不听，总觉着别人都想复辟资本主义，就你一个人拥护社会主义！你呀，你整人手太狠，怨得着谁呀！我不说你给我爸找麻烦就够客气了！”

“你才胡说呢!”我气急败坏地压住她“:没有你们家老头子那层关系，我能落到那个倒霉的公社去吗？”

“你浑蛋！你现在倒说起这些没良心的话来啦，当初你是怎么央求我来着？是你找的我！算我瞎了眼，看错了你个王八蛋!”又是哭、又是闹,孩子也吓醒了,哇哇大哭起来。

若梅一哭,鼻子皱起来,鼻孔朝天,变得很难看。一见她这样，我更心烦了，可又不便发作，里间炕上岳母在咳嗽，她一定也被吵醒了。

“你看你！吵什么？多没意思！我这也是一片好心，只不过请老太太暂时回避一下而已，要不，她住在这里也不心静。我的问题一了结，咱们再把她接回来，这还不行吗？”

“我哪也不去。”里屋门帘一动,岳母已经穿戴整齐走了出来“:我要守在这块,守着他的消息。”

“妈，您守在这儿没用！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告诉您。”

“不行！我得亲自在这儿看着。要不，都往他头上屙屎撒尿，谁能替他说话？为他辩白？有我在，总还有几个老头给奔走张罗着点。”岳母看了看我,又说“:如果跟着你们不方便,我自己找地方住去！”

若梅急了，从炕上一骨碌跳下来：

“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她一个劲对我使眼色,岳母进里间收拾东西去了，她拦不住，打手势要我去挽留。见我不动，一腔怒气便朝我发作了：

“你聋了？你哑啦？你怎么一句话都没了？你这个……”

“妈不乐意我们给她安排，我也没有办法。”

岳母当晚就离开我们，住到她的一个老乡亲家里去了。

第二天，出现了一张轰动地委机关的大字报，我表态亮相，支持革命群众，打倒吴根荣。家里若梅摔盆打碗，大吵大闹；街上人们戳着我的脊梁骨，指指点点，无非是把我骂得象恶魔一般。我心里也不好受，过着地狱般的日子，但表面上只能若无其事，不为所动。既然下定决心，非走这步棋不可，那就硬着头皮走下去。当然，事情并不会因为一张大字报而完结。人们要求我在大会上跟老吴头“刺刀见红”，我婉言拒绝了；写揭发材料，我却推不过去。我揭发了老吴头曾经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攻击反右倾是“整人”等等，此外还有些别的，我记不住了。反正我没有给他瞎编，全是事实。渐渐地，若梅家的亲戚，还有老吴头的老战友、老部下们，都和我疏远，断绝往来,再没有多少瓜葛,这样,我算是站到了“革命”一边，度过了人生航程上遇到的第一次惊涛骇浪。

后来,我作为悔改较好、已经回到“革命路线”上来的犯错误干部，被吸收进革委会生产建设指挥部工作。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刚从建设兵团移交给地方的东风农场场长患肝癌病故了。因为伊赫沙漠条件艰苦，组织部门物色了几个人选，都托故不肯接受任务。我得知后，主动要求到“东风”。当时，我只考虑要摆脱眼前困境。我知道，在地委机关里，我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得彻底摆脱掉固有的矛盾纠葛。另外嘛，兵团农场是县团一级建制。从公社书记到农场场长，也是一次不容忽视的擢升。条件无疑是苦一点，但眼下只有别人不要的或吃剩的苦果，才轮得到我去享用。常言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结果,却出人意料,来“东风”这一着,成了我一生中的重

大转机。来了三年，粮食产量连续翻了三番！把一个靠吃返销粮的“老大难”包袱变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我的名字又开始挂在上级领导的嘴巴上，出现在报纸电台，堵住了那些对我不利的传言，用别的农场场长的话说，“这小子撵过我们，又矗起来了”。这不，部里派人最后来落实“东风”情况，一旦正式确定为商品粮基地，这对我和我的农场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步！农场将因此得到更多投资、更多的农业装备，实力变得更加强大；而我呢，要不了多久，将又会有人生第二次重大转机……只是，唉，只是想不到这次竟是黎珍来充当我们的“钦差大臣”!

六（黎珍）

接到启明最后那封信，我大病了一场，头发一片片地往下掉，很长时间，我包着块黑头巾，象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里。

看来，我是要失去启明了。在我手里，只有他的一个邮政信箱编号，我只朦朦胧胧知道他在祖国西北的一片大沙漠里，却没有确切地址,我没法找他去。再说,从来信看,他似乎已调动地方了。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他独自一人饮尽这苦酒之杯，而我却没有跟他在一起，为他分担些许忧愁。想到这些，我心里象滴着血一般的痛苦。

在那段日子里，除了魏大雄来家看我外，还有我大哥黎荃的老同学刘子磐。他每次来，膈肢窝下总夹着两本我喜欢的书，笨拙而费劲地讲些有趣的社会传闻和故事，极力唤起我对生活的兴趣，转移我的思绪。可是我那么冷漠、迟钝，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因此，他常常一声不响地坐在一边，用他同情的沉默伴守在我身旁，一直坐到他不得不起身告辞的时候。

其实早在我上中学时，刘子磐就常来我家了。他谦和寡言,懂礼貌,心眼好,忠厚得有点迂腐可笑,身体又高又胖,动作十分迟钝,哥哥们开玩笑叫他‘大牛’。‘大牛’待我象自己的小妹妹一样，每次跟他们出去看电影，总是他替我拿着票，周到地照料我上下公共汽车，给我买汽水和冰糕。有时我碰

到十分想买的书，恰巧手边零用钱已经花光了，不敢朝大哥开口,这位‘大牛’哥哥就‘借’钱给我,并且认真地替我挑选。我很为自己同这位比我年长得多的男子之间的友谊自豪、他毕业后进入了外贸部门工作。听大哥说，他业务极好，学的是法语，英语也很精通。在当时我那样的小姑娘眼里，他简直是个伟人，大外交家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遇见了启明。记得第一次把启明带回家，子磐刚好也在。我兴奋地把启明领到大牛哥哥面前，顽皮地用英语说：“Heismysweetheart.”他惊惶失措地站起来,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纠正我“应该说‘myfiance’”从那以后，他来我们家就少了一些，然而现在，却明显地比前增多了。

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当我们一家人围坐一起，正津津有味地听大哥讲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一件斗争传闻时，刘子磐突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求婚，他说因为过不久他也要到欧洲去了。大家一时都愣住了，众面脉脉，尽不言语。但从父母的神态看，他们是赞成这件事的。平时，从他们言谈中，我也已经知道了。他们这样考虑，一方面固然出于对子磐为人和学识的了解与好感，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打破我的麻木状态，使我从深沉的痛苦和忧伤中解脱出来。大哥黎荃既爱我也看重子磐，他很想撮合这件事，又害怕我会坚决不允，使他在好朋友面前有口难言。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经过两天考虑，我答应了刘子磐。我那时的心情是：一切都无所谓。既然我的首肯能使二老高兴，使这个比自己年长近十岁的大孩子高兴，使全家高

兴，而且能够躲开魏大雄或者别的必定要出现的人的无谓纠缠，那就这样吧。另外，跟“大牛”哥哥在一起，我感到比跟别人安全、可靠，他了解我对启明的感情，了解我的一切，对他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使我的创伤再一次迸裂。

婚礼十分简单，我不愿张扬，只有还留在北京的几个最亲近的同学和亲友来坐了一坐就散了。

只是在后来，当我翻检旧物，给未来的婴儿作着准备的时候，偶然间看到子磐一本日记，才知道他那宽实厚重的躯体里，跳动着一颗热烈而秀巧的心灵。

……让我对自己承认吧，我己经无可救药地象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陷入了情网。我爱上了她。也许是那个夏日早晨，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她，象朵带露的百合一样美妙地朝我跑来，把农学院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情不自禁地拉着我的手跳跃起来；也许是那个秋日的黄昏，她围着雪青色的纱巾，象一枝水边芙蓉一样坐在北海的垂柳下攻读，在遐想中抬起长长的睫毛，看见了我就嫣然一笑。总之，不知不觉地，在我心中就刻下了这个少女的影子。爱情来得这么猛烈，这么折磨人，我就是拿最大意志力来压抑自己，也不能制止它的躁动。要明白：她才到蓓蕾初放的年龄，刚刚跨进青春的大门，而我却早已年过“而立”，这怎么可能呢？

……当她用英语把那个青年介绍给我时，脸颊上的红晕掩饰不住她的幸福与得意。不过她显然说错了，只有结过婚的人，在英语里才能使用那个词，而“未婚夫”是个法语借词。

我一边结结巴巴地纠正她，一边望着面前这个英俊挺拔的青年，和她站在一起，就象剑兰和康乃馨种在一起、非常的和谐协调。比较起来，我就象一丛蓬生的艾蒿，太纷乱了。我不战而败，用外交词令来说，我要自动引退了。……

从她那里回来，脑海里老是浮现着她那消逝了美妙笑靥的面孔，和呆然木坐的神情。我受不了。我觉得心都碎了。如果我无力帮助那个年轻人早日回到她身边，那我愿意替她遮挡一些生活的风雨。

我象一只困兽在宿舍里走来走去，喷吐着浓烟。黎荃进来了。他望着我，迷惑不解。

“出了什么事？大牛，你是从来不抽烟的！”

浓烟呛着我的嗓子，呛着我的眼。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把烟头往地上一扔：

“正好，你来了。我问你，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如果我向你妹妹求婚，你反对吗？”

黎荃大吃一惊。

“别开玩笑啦，你不是在说胡话吧？”

“一点也不。我爱她！”我声音发颤，几乎说不下去，“我觉得自己离不开她。”

“子磐，咱们都不年轻了，不是小孩子了。你冷静分析过自己的感情吗？你对珍妹是同情。你别把同情和爱情混在一起。”

“不不！我爱她，早就爱上她了。”我狂热地说，“以前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帮助她。”

看得出，黎荃感动了。

“可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她会接受你吗？你是知道的，她敬重你，信任你。可敬重和信任也不是爱情。”

“我知道，我可以等她的爱，不过，我想先结婚，可能第二个季度我要出国工作，一走二、三年，我不能先结婚后恋爱吗？”

这是《李双双》里的一句饶有喜剧趣味的台词，我不知怎么竟说出来了，自己脸都红了。要在平时，黎荃一准会哈哈大笑，拿我起哄，可这次，他没有笑，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挚地说：

“子磐哪，子磐哪！我衷心希望珍妹幸福，也相信你能给她带

来幸福。我感激你，子磐 ，可这事最后结果如何，要看珍妹自己的意思。”

“谢谢你，老黎，谢谢！”

……

读着这一页页日记，我忍不住默默地流下了热泪，为启明,为子磐,也为我自己。哦,我是多么冷淡、麻木地接受了这颗热得发烫的赤诚的心呵！

两年以后，子磐从法国回来，我抱着小军等在机场上。当子磐高大笨拙的身躯出现在舷梯上时，我指着他用手碰了碰儿子,小家伙乖觉地大声叫起来“:爸爸!’稚嫩的童音那么响亮，使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浮出了愉悦的笑容。子磐手足无措地愣住了,接着,便笨拙地挤开别人,三步两脚奔下来,把儿子紧紧拥在怀里。

子磐决定趁休假带我和孩子回南方家乡一趟。这是真正的蜜月旅行，而这一趟南国之行，把我心中最后那点冰块也融化了。

我们沿津浦路南下,南京、无锡、苏州、上海,一路逗留过去。参谒中山陵、雨花台，从燕子矶远眺扬子烟雾，到太湖泛舟，在虎丘寻胜。有时候子磐给我讲欧洲见闻，讲巴黎、维也纳和罗马。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描人状物，真切生动。世界上发生的事，慢慢地荡涤了我胸中的尘垢，逐渐打开了我的眼界和心胸。我不但看见了自己美丽可爱的祖国，还知道了国界以外的事情。善良、正直、进步的人们，怎样在为美好的未来奋斗。外国有的国家，现代化再发达，却不能消除剥削，不能解救人们心灵的空虚和精神的崩溃。当然，在我们四周，生

活也并非十全十美，有时头上也会出现乌云，但我们亲爱的祖国毕竟为大多数人摆脱了受奴役、被欺凌的悲惨处境，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而且还在为人们开辟越来越美好的前景。为了这个目标，多少人默默地奋战在机器旁，田野上，实验室里，练兵场上！然而这几年来，我对这些似乎已经淡忘了，学生时代的献身精神，要让祖国大地覆满沃土的黄金般的理想，也好象变成遥远的往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就这样沉沦下去吗？

在上海小住几天，我们乘海船去宁波老家。轮船驶出吴淞口，冲进了大海。天色骤然阴沉下来，不久就下起蒙蒙细雨。旅客们纷纷离开甲板，只有我还在外面留连。子磐把熟睡的儿子抱回舱房，拿了件雨衣出来，披在我的肩上。他和我肩靠肩，默默地凝望着翻腾的海面。暗蓝色的海水汹涌激荡，卷起一个个翻着白沫的漩涡。高扬的船头，迎着风浪的搏击，颠簸向前。

“你知道吗？子磐，这些日子来，我想了许多许多事情，……”

我望着大海，并没有看他，但凭着呼吸气息的改变，知道他已经转过脸来，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子磐听完我正经历的这种精神上的复活，抓起我的双手，捧握在自己两只厚实的手掌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告诉我,子磐,我该怎么办？”

他还是沉默无语。

过了一会儿，子磐突然扬手一指：

“珍妹,你看！”

透过风雨迷蒙的夜色，我看见轮船的右前方，有几点如豆的灯火在飘忽，湿漉漉、亮晶晶、明灿灿，在黑暗夜色映衬下，看去是那么美丽，而且神奇。

“这是什么？”

“渔火！”子磐激动地叫起来。“你知道，我们现在行驶的这片洋面，就是我国著名的舟山渔场。”

说话工夫，渔火蓦地消失不见了。接着，一个浪头袭来，轮船猛地摇晃了一下，沉落在波涛的深谷里。等它从浪峰波谷中重新钻出来时，渔火又出现了，而且比第一次看见的更多，闪闪灼灼，连成一片，宛如天上的繁星，晶莹璀璨。在这风雨飘摇、浊浪滔天的海上，这片渔火显得那么微小脆弱，仿佛随时都能被咆哮的大海所吞噬和淹没；但它却又出奇的倔强，冲破无边夜色、触天巨浪，放射出不灭的光芒！

“多么勇敢、顽强啊！”

没有听到子磐搭腔，我便转过头去：

“你在想什么？”

“想一首诗。”

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

“是的，我从没写过诗。但刚才一边听着你的诉说，一边凝视着我童年时神往过的渔火，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象大海在翻腾，在咆哮，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念给你听听，千万不要笑话。”

子磐激动得连说话声音都有些异样。他清了清喉咙，让自己情绪镇静一下，接着，便轻声吟哦起来：

仿佛是天上的繁星飘落在海中，
仿佛是节日的礼花升起在水上。
晶莹而且美丽，
热情而且倔强。

我永远是祖国各种灯火的爱好者。
然而对于你,渔火！
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美的形体包藏着美的灵魂：

不畏倒海的狂风，
劈开触天的巨浪。
永远在奔波、在探索、在奋求，
为了人类幸福生活的佳肴。

啊,渔火！
你这渔民赤子之心的闪光，
你这水手勇敢灵魂的化身，
人类征服海洋的燎原星火！

你是不凡的！
你虽微小如豆，
但是给予人们的却是那么的多：
一股向上的力，
一种创造的美，

和一颗必胜的心……

子磐念完后，负疚似的说：

“这是为你，也是为我们写的诗。愿我们的灵魂，就象这渔火一样明丽、勇敢而顽强。但可惜我没写好，心里想得好好的，一念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肯定不喜欢它。”

我吞咽着激动的泪水，说不出话来。直到能够控制住发颤的声音了，我才轻声地说：

“写得太好了！子磐，我非常喜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非常、非常想看看他，但这时却看不清他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在船舱透出来的朦胧灯光的映照下，在激动地熠熠闪光。哦，我怎么这么麻木，怎么直到这会儿，才看出来自己这个外表平庸、动作迟钝的胖大丈夫，原来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细腻而且富有才华的人！我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他肩头，第一次这么主动、热烈地亲吻了他。

“啊，子磐，我懂得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灵魂都象渔火那样，在生活的大海里奔波、探索、奋求！这次回去，我要求去基层工作，脚踏实地地搞点土壤改良，把那篇论文搞完！……”

轮船在大海中颠簸前进。大雨把我们浇得浑身透湿，可是我们却没有察觉。

“你知道吗，珍妹，”子磐一往深情地说，“我想念象现在这个时刻，已经想念很久很久了。无论我在哪里，在里昂码头的阳光下，还是在维也纳豪华的酒宴上；无论在多瑙河乘坐游艇，还是在古罗马废墟上参观，我都在想念你，想念自己的祖国，这块贫困落后但又无比富饶的土地。我们的祖国一定要

富强起来，我们的人民也会过上富足的生活！珍妹，我们的事业很艰巨，道路还很漫长，还会遇到风浪。但我决不离开你，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

听了子磐这热烈的诉说，我把头紧紧地依偎在他胸前。我感到自己胸中最后的一点冰屑在慢慢地消融。我终于找到了第二次爱情，又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

然而，我们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子磐在轮船甲板上说的那番话，竟然变成了严酷的现实，而且这次风浪，比上次的更险恶,更凶猛！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子磐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在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期间，外贸部和外交部一样，受到很大压力，一些正常业务活动不能开展，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可是有周总理亲自关怀过问，再乱还是有主心骨，是非正谬尚能分清。就在这个时候，子磐收到一封国外来信。

信是从巴黎寄来的，写信人是他的一位法国朋友,一位律师。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在业务活动中，请这位皮埃洛律师当过顾问，这样，子磐和这位青年律师相识，彼此建立了友谊。皮埃洛在子磐回国以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联系。因此收到这封信我们并不觉得意外。

信里除了一些例行的问候和友谊表示之外，还寄来一张法文剪报，子磐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这是一家自由派晚报，上面在新闻人物栏中，介绍了当时正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那位女“首长”的现在和过去，其中还包含着某些丑闻。

皮埃洛对中国态度一向友好，寄来这份剪报，显然是为了

提供一些新闻动向，希望我国有关部门能采取某些针锋相对的措施。他的用意是友善的。

子磐立即把这份剪报，连同皮埃洛的信按组织系统进行了汇报，并且在一次工作之便，见到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也向他作了口头汇报。

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我刚从郊区农村回来。子磐听说我已完成那篇关于土壤改良的论文初稿，高兴得立刻张开两臂，一把把我搂住，欢声地说：

“珍妹，你变了，变多啦！你不知道，看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我心里有多高兴，这多好哇！”

“还不因为有了你。子磐，还记得那首诗吗？不畏倒海的狂风，劈开触天的巨浪，永远在奔波、在探索、在奋求……”

“这算不了什么，”他挥挥手说“：主要是你自己努力。”

“可我努力还不够呀！这一阶段乱哄哄的，谁也弄不清这运动要搞什么名堂。工作老有干扰，改良成果也不理想，论文才是个初稿，还要作很大修改……”

“但这就不简单啦！”子磐忽然想起什么，从隔壁房间里拿来糖果盒、点心罐“；你大概饿了吧，先吃点萨其玛，还有酥糖，这是今天特地为你买的。现在你就替我坐下，我来烧两个南方菜，我们来小小庆祝一番，为了你的变化，也为了我们儿子的变化。你知道吗？今天小军居然胆敢从跳台上往下跳水了，这一夏天，我到底把他的胆子给训练出来了，哈哈哈！”子磐一边笑，一边动手忙乎起来。不一会儿，儿子回来了，一家人说说笑笑，忙着这小小的家宴。

正在这时，门口响起“笃笃笃”敲门声。进来一个不认识

的人,把子磐叫到隔壁房间,说是“中央首长要接见”,小车就在楼底等着。我和小军都有些扫兴,但既有“紧急任务”,也没再说什么。子磐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歉地朝我笑，又摸摸儿子的头说“只好由你来代表爸爸了,叫妈妈一定要多吃点,这些日子她辛苦了,懂吗?”说完,便急匆匆地跟着来人走了。

但谁也想不到,子磐这一走,竟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急坏了，打电话到他们单位，机关里的人莫名其妙，都说不知道有这回事，但答应帮助查问。

几经波折，通过好几个熟人关系，终于找到了刘子磐认识的总理办公室秘书，把情况向他反映，秘书也大吃一惊。后来，多半由于总理办公室的查询，消息才迟迟下达：刘子磐因“间谍罪”,依法逮捕！

这个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把我震昏了。

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意外横祸为什么会突然落到丈夫头上。我了解子磐，了解他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么，在他的全部所作所为中,究竟有什么能够和“里通外国”的“间谍罪”联系起来呢？想起来了，是法国朋友皮埃洛寄来的那份剪报！这张该死的法文晚报显然是激怒了什么人……可是子磐这样处理，通过组织系统向上汇报，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责任感呀！为什么要被扣上这种莫须有的重得可怕的罪名？

又开始了痛苦的失眠，成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为子磐担忧和对往事的回忆，咬啮着我的心。将近九年时间，我把对启明的回忆深锁在心底，就象一个密封的小盒子，现在忽然打开了，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地映现出启明在卡车上颠簸摇晃的

身影。当年他被送走的时候，自己跟在车后奔跑了一阵，总算为他送了行；而眼前这一个，这样突然地被人弄走，连最后话别的机会都没给留下，音讯毫无，下落不知，就这么不声不响地从生活中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十年前，在启明受批判时我还虔诚地进行自我检查，努力从灵魂深处严酷地剖析自己，唯恐放过一丝细小的思想污垢；那么这次子磐的事情,一下子擦亮了我的眼睛 不但子磐,启明也是同样,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正直、善良，热爱自己的工作，怀抱着美好的信念，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然而他们的命运和下场却是如此严酷和悲惨！要知道，这一切不是发生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而是在他们从小热爱着的解放了的土地上，发生在他们从小就天天咏唱的“社会主义好’的新中国,这是为了什么呀！

年迈的双亲为女儿担忧，怕我再象十年前那样大病一场。他们把我和小军接回家去住，精心料理我的饮食起居。但这次我既没躺倒,也不哭泣,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工作。

迫害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我。因为子磐的问题，我也受到审查和批斗，而且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出来的材料，说我在五九年反右倾时,就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同情反党分子等等。每当我听完这些无端的咒骂，搭上拥挤的公共汽车返回家里去时，心里总觉得那么凄凉，那么严酷：我这辈子注定要为自己爱过的两个男人吃苦了。我愿意为他们吃苦，毫无悔意！

回到家里，我对父母和孩子隐瞒着机关里发生的事。自己的处境，一丝一毫也没有泄露。年迈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女儿每天急匆匆地按时上班，不过是为了去接受训话和进行

惩罚性的劳动。

但同样没有想到，九岁的儿子也对我隐瞒了自己生活的真情。他在学校里，小朋友们成帮结伙地跟在身后，齐声喊他“特务的小崽子”“小特务”,受尽欺侮和辱骂。小军本来生性就有些怯懦，小的时候，从来不象别的男孩那样，在院里疯闹疯玩。春节放鞭炮时，他象小姑娘似的双手捂住耳朵，躲得远远的。给他买的爆竹花炮，都是让他爸爸替他燃放。子磐老说这孩子太胆小，将来不会有出息。为了训练他的胆量，夏天故意把他带到游泳池的跳台上，逼着他往水里跳。现在他突然身处这种境地，一点都不会保护自己。每当别的孩子无缘无故地打他、唾他时，他只是哀哀哭泣，告老师，老师也管不了；有的老师甚至也歧视他，在他和别的同学闹起纠纷来时，总是厉声呵斥他。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小军变了，他开始用拳头来保护自己了。在学校吃了亏，当时不算账，而是在街角上守候，等那个欺侮过自己的孩子只剩下独自一人时，他就如同疾风暴雨一般冲出去，豁出性命地打。这一手果然奏效，有的同学有点怕了，知道他舍得拚命，不敢轻易惹他。渐渐地，他周围就聚集起一小批跟他同命相怜的孩子。他们本着“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原则，成了学校里一个打群架的小团体。小军越打越精，战术越来越高明，加之他继承了父亲健全的体魄，在同龄的男孩中，他比人家几乎高出一个头，因此很自然地成了打架斗殴的首领。可是，我发现这个情况，已经是很晚了。……

那天，因为来了一群外单位的人，围攻的时间比平日长。他们威迫我承认刘子磐是特务，要我交代刘子磐的往来关系

和“反动言行”。十分明显，这次围攻是秉承着某种旨意组织的，他们越凶狠，我反倒越安心。因为这只说明他们没法给子磐定罪，想从我口里“诈”出点把柄来，再去诱逼他。想到子磐还在坚持斗争，我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欣慰的。从各个角度提出的问题，我都冷静地、十分得体地作了回答。而一些故作聪明的人前后左右设下的陷阱，我也都心如明镜，仔细绕行过去，没有上当。但逼供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某几个盘问者的问题，明显地围绕总理办公室打转转，千方百计想让我交代刘子磐和总理办公室那位秘书同志的交往。

我的心愤怒得颤抖起来了，莫非，莫非竟有人想要加害总理身边的人？那时我还不敢想象他们甚至要加害总理本人！

任凭他们威逼喊骂,我只咬死一句“没有什么交往。”

于是发生了武斗，推推搡搡中，我站不住脚，额角撞在了身边一块突起的装饰性砖楞上，疼得火烧火辣，眼泪直淌。

很晚，他们才放我回家。走到父亲住的胡同口时，忽然传来一声惨叫，那声音在暗夜中听去是那样撕裂人心。也许由于当时我自己才经过类似场面，余悸在心，反正我是吓住了，不禁往旁边墙上一缩，这时又听见前头有几个人在叫嚷，是孩子的声音：

“打!打!你还敢不敢了?”

有人在小声告饶,有人说“算了,今天就饶了他吧。”

“不行,还不够数呢,再打!”

这回我听出来了，这个蛮横的声音竟是小军！我脑袋嗡的一声，简直不敢相信。我赶快朝前奔去，一边大声喊：

“不准打人!小军,小军!”

看见来了人，打人的和被打的孩子都跑散了，只剩下小军,站在胡同当间,余怒未消,还朝逃走的孩子挥动着拳头。

我惊呆了，路灯光下，小军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衣服前襟整个撕烂了，一双眼睛象小狼一样闪动着恶狠狠的凶光。

“你……你怎么也打人？”

“我要揍死他们！”小军发疯似的吼叫着。

“为什么？！”

“那些崽子们骂我,喊我小特务,说你也不是好人,每天挨斗……”

我痛苦得快窒息了。哦，我太迟钝了！怎么竟没想到，孩子为了父母在受罪，只能用一双小拳头来保护自己。我一把把儿子搂在胸前，眼泪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

小军抬起头，信赖地望着我：

“妈妈,你没让人挂牌子吧,是吗？我对那些王八蛋说,你每天在办公室，没在黑帮队，对吗？妈妈……你……”

他忽然停住了，眼光落在我的额角上，“这儿怎么破了？你……”他拚命摇撼我：“妈妈,你！……”

“我,我是在上班,儿子。”我拚命咽住眼泪,显得轻松愉快：“我们……今天劳动。我是不小心……碰破的。”

孩子显然不信我的话，信赖的眼神一下子变成了怀疑。

“劳动？造反派才不劳动呢！你一定是在黑帮队里，你骗我！”

小军叫着嚷着，不管怎么抚慰他，他还是粗暴地从我怀里挣脱开去，跑掉了。

后来我被送到干校去了，小军完全失去控制，外公外婆都

拿他没办法，很快，他就成了个小暴徒。最后，我只好把儿子送到子磐一个在部队工作的弟弟那里，为了避免歧视，把他生身父亲改为他叔叔。初中毕业，叔叔把他安插到伊赫沙漠的军垦农场来了。

粉碎‘四人帮”,我回到北京,才知道子磐四年前已被迫害致死，问题真相很快得到澄清，开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为了落实政策，组织上同意我把儿子转回北京。

刚才车上，老魏告诉我，小军这一年长进很大，成了拖拉机手，这么说小伙子走上了正道。很快就能见到儿子了，这真是让人高兴！只是为什么一提到小军，启明会流露出那样惊愕不悦的目光。这种目光只有我才熟悉，才看得出来。难道二十年后，我们三人萍水相逢，又要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吗？

七（辛启明）

我无言地接受了命运的打击，从最初的激动和混乱中，逐步清醒过来，死心塌地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沙漠腹地里的居民。

治疗痛苦的唯一良药是工作。由于老吴场长的关怀和推动，试验站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我和几个吴场长特地从老兵中挑选来的“科学迷”一起，走遍了周围百里之内的瀚海，对它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地形、土质、水文、湿度和日照条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原来，我们农场所在的这片广袤起伏的沙原，两千多年前曾是一片平畴沃野，人烟炽盛，村落群集，是祖国北塞的一个富饶粮仓。根据历史记载，西汉时期，王昭君出塞和亲，呼韩邪单于的迎亲人马，浩浩荡荡地从长安经过这里回罕山北麓，汉王朝厚加赏赐，赠给匈奴三万四千斛的米谷，便是直接取给于这里。

然而由于强烈的风蚀，由于过分垦植和兵燹破坏，这片曾经繁盛一时的肥沃良田，渐渐地变成流沙滚滚、寸草不生的可怖赤地。

“是呀！”吴场长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旧社会把良田变成赤地，新社会要把赤地改造成良田，这任务不轻啊！好吧，讲讲你们的具体打算，准备从哪儿下手？试验地选点选好了吗？”

关于试验地，我心目中已经选中了一个地方，就在公路边，在当年剿匪平叛战斗中壮烈牺牲了的一个老战士的褐色墓碑旁。离它不远，便是水色碧蓝的沙漠湖沼亚茨海。没有到过沙漠的人，往往想象沙漠中只有望不到边际的粉尘般的黄沙，其实沙漠里许多地方，在地层深处，有水量丰富的地下河流，由于压力不同，在地下水上窜冒泉的地方，往往形成大大小小的沙漠湖沼。只不过因周遭土质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湖泊并没有给沙漠带来生机。光秃的湖岸，被人遗忘的一湖静静的死水，更增添了沙漠的荒凉。亚茨海是沙漠湖沼中较大的一个，农垦兵团开到这里，引黄河水灌溉，从亚茨海借道，这才使得死去了的湖泊流动起来，有了生机。但海子四周，却是一块不毛之地。一弯弯新月似的沙丘，鳞次栉比，从西北向东南，朝着海子蜿蜒过来，稍有风吹草动，便扬起滚滚流沙，象密集的雨点一般，纷纷扬扬地倾泻在亚茨海里，发出一片森人可怖的飒飒声。

“那里风大沙大，流沙活动猖獗，条件太差了吧？”吴场长担心地问道。

我说：“难度大一点好，以后搞成功了，让人信服，推广起来价值也大。你不是常说嘛，还是啃硬骨头有味道。另外，那里长眠着为解放这块土地牺牲的同志，我们在他身边劳动，是个很好的鞭策。”

场长审视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用好听的嗓音高兴地说：

“想法嘛，很好 那么，点就定在褐色墓碑旁边！”

试验田动工的头天夜里，吃过晚饭，我想起明天一早拖

拉机来耕地，有几根界桩尚未栽好，就朝试验田走去。快到褐色墓碑时，听见前头有嚓嚓的铲沙声，睁眼探望，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晃动，时而蹲下，时而立起。走到跟前，是老吴场长！

场长也恰在这时转过身来，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插，亮开他那好听的嗓门：

“怎么样,来检查一下,界桩没有栽错地方吧？”

我心头陡地一热，赶紧上去，一把夺过他的铁锹。

“场长，快放下，我来吧！”

“嘿嘿，你呀你呀！往后这里够你忙的，还怕失业？”场长嗬嗬笑着,一面拿手指不住地指着我说“反正呀,你想撵我也不走啦！今晚上估计你会来这里，我是特地来跟你作伴的噢！”

月亮从砂碛尽头升上来，百里瀚海，地上到处有晶莹的大颗明砂象宝石一样在闪闪发亮。蓝色的纯净的夜空，神秘壮丽，高高地笼罩在我们头上。四周悄无声息，一片静谧，只有我们两人铲沙的嚓嚓声，和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二声骆驼短促而吃力的嗷嗷低鸣。

“你不是要拿革命先烈的事迹来鞭策自己吗？你知道长眠在这里的是谁？”场长一边栽界桩，一边用他那好听的嗓音讲起褐色墓碑的故事来，“他是我的老战友，不，是我的老上级，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是你知道吗？他牺牲的时候，却蒙受着很大的委屈！他被停止组织生活，背着重大的嫌疑，受着审查。在他牺牲了五年之后，组织上才查清他的问题，恢复党籍，我们才为他开了追悼会，树起这块墓碑……”

我突然哆嗦了一下，心怦怦地跳起来。清冷的月华，无声地洒在墓碑上，照在场长的脸上，那神情看去是那样冷峻、肃

穆和悲壮。

“大家管他叫老文书,但很奇怪,这个白发苍苍的人,怎么才是个干事！他们不知道，他是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以后，在革命最低潮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工作，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来到延安时，我负责过他的警卫。

“可是在整党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说他是假党员，有一个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据说和他有关系。在上千人的大会上，他被当众捆绑起来。……

“一直到这次剿匪战斗前夕，我才又看见他。他被派到我们团当文书干事,头发全白了,问题还没弄清,没有证据,作不了结论。过去他是我的首长，可现在他成了我的下属，想想，有多别扭！”

场长象是感到有些寒意，双手抱肩，使劲地踩踏着界桩四周的沙土。我默默地挥舞铁锹，听他继续讲下去。

“他显然因为参加了部队工作而高兴，什么都干，和战士一样扛着枪，背起背包行军……

“那次剿匪战斗非常艰苦。我们地形不熟。敌人跟我们捉迷藏，有好几次，在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钻出去，甩开我们，继续作恶。

“记得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我们有一部分队伍迷路了，派了几个人去都联系不上。正在这时，发现了叛匪行迹，需要指令侧翼部队迅速转移，去堵截敌人退路。但没有人可派了。我的老首长带着个小通讯员，主动地承担起送信任务。

“不料就在他们路过亚茨海时，遇上了一群匪徒。老首长命令小通信员借沙丘掩护，绕过敌人，赶去送信，一面自己东

一枪西一枪地打起来，吸引住敌人。可是，子弹很快打完了。他想起自己随身还带着张行军路线图，立即取出来打算销毁。这时，叛匪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把他按倒在地。当他们发现：费了这么重大代价落进手中的，不过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而且嘴里还在咀嚼什么东西，想要拚命吞咽下去。匪徒们真是气坏了。他们卡住他的脖子，用刺刀撬他的嘴，恨不能一把撕烂了他。老首长拚命吞咽着，终于，他吞下去了，他满脸紫涨，嘴角鲜血淋漓，但他在笑，革命军队的机密，永远保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了。……

“这样的人怎么会出卖党呢？怎么会是‘异己分子’？……敌人掏不出那张纸，也掏不出他的一句话，他们把他凌迟处死了！”

场长那洪亮、好听的声音，忽然变得喑哑、滞重起来。

“你知道什么叫凌——迟——处——死吗？”他突然停止了手里活计，直起腰，紧紧闭上眼睛，好象不忍再看见自己老首长牺牲时的惨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呼吸，以免扰乱他。“那是把人当作一块肉，一块一块地割切，一刀一刀地砍戮。当我们部队赶到时，他已身首异处，四肢不全，倒在血泊之中……”

很久，很久，我们谁都没有出声。我一个劲地挥锹攉沙，竟在脚下堆起个沙包来，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栽桩子。老文书的故事，激起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比崇高的悲壮情怀：原来，不仅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者的一生更曲折。我觉得自己刹那间变得懂事多了。我感谢场长，明白他的用心，为什么要在第一块试验田正式开辟前夜对我说这些话。他是要我记

住这位老首长，准备在今后革命征途上，走曲折的路！

土壤改良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个包括一整套措施的大规模综合治理工程：从粮草轮作、合理灌溉、改进耕作制度，一直到防风固沙，保持土壤的稳固性等等。我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全部知识，全部精力和热情，都倾注在这片试验田上了。

任务是艰巨的。要改变沙漠地区土壤瘠薄的状况，必须提高肥力，投放大量肥料。可是肥源在哪里呢？伊赫沙漠本来植被稀疏，不可能大量养畜积肥。而大量投放化肥，又会引起土壤板结。唯一出路就是种植绿肥作物，实行粮草轮作，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土壤化学状态、提高肥力的有力措施！

主攻方向明确以后，我们引进了各种各样绿肥作物。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我们发现“沙大王”产量最高，质量也好，而且翻压在沙地里最易腐烂，肥效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问题是伊赫沙漠无霜期短，满足不了“沙大王”生长发育所需的时间，大多数籽粒没等成熟就枯萎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种植到管理，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作物发育生长，但仍有一多半“沙大王”成熟不了。

正在这时，“文化革命”象突如其来的“尘风暴”①一样降临到农场上空。作为一个被“清洗”出党、在历史上“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横扫”。而且，我的问题还牵连到吴场长。尽管他已调离农场好几年了，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人们还是把我作为他“招

①“尘风暴”：沙漠里的一种自然现象。

降纳叛”的一条罪状，对我特别来劲，企图从我这里搞出置老吴场长于死地的‘炮弹’来。

几乎每一次批斗会上，我都要受到殴打和辱骂。当“造反派”的这个意图落空以后，他们仍不叫人消停，勒令我自己赶着毛驴车，戴上黑牌，按先后顺序，一天去一个分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一天傍晚，我带着伤痕，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赶着毛驴车回来，路过褐色墓碑，不知怎的，象是见到亲人一般忽然想大哭一场。我倚着墓碑，望眼前平沙落日，瀚海苍茫，四周笼罩在洪荒时代一般的寂静中，而我的心境却还要孤寂，凄凉。我看着自己胸前的黑牌子，想起场长临行前语重心长的嘱托，想起学生时代和黎珍一起立下的誓愿，想起长眠在墓碑下面老文书一生走过的曲折的道路……，觉得挨斗、惩罚、殴打和侮辱，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曲折都还能忍受，而最叫人痛苦的是不让工作！我在褐色墓碑旁坐了很久很久。我反复问自己，改良土壤，培育‘沙大王’的试验，难道就这样中断、放弃了吗？血沃中原肥劲草，烈士用鲜血浇灌的土地，应该是田畴肥沃，果实丰硕。不管“造反”造到哪一天，赤地变沃野，沙漠变绿洲，于国于民总还是有利的，培育新型“沙大王”的工作要继续进行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东方刚一露白，我便套上毛驴车，戴上‘黑帮’牌，来到试验田里，观察记录‘沙大王’的生长情况，一直到上班时间，才急匆匆地赶到指定分场去接受批斗。日落时分，受批斗回来，顾不得腰痠腿疼，衣服上满是粘痰唾沫，又去试验田忙上一阵。

黑帮分子
辛启明
试验田
12675

试验站的几个“老兵”,都十分了解我,同情我,他们虽然无法解脱我的苦难，但对我绝不落井下石。他们坚守岗位，埋头苦干，全靠着他们支撑，“沙大王”的试验才没有中断停歇，在勉强地继续着。

不管人世间多么纷扰，大自然还是按照自己规律在运行着。这年,第四代改良‘沙大王’好得出人意料,几乎每棵植株，都分蘖出三、四十杈比人还高的分枝，紫色粉色的小花缀满枝头。细密的叶片，繁茂的枝杈，交织在一起，望去象是大平原上一片绿森森的青纱帐。我们就把这改良的‘沙大王”,叫‘绿纱”一号。秋天,‘绿纱”一号成熟时,试验站工作越发紧张忙碌起来。有天早晨，因为做鉴定品种的染色体试验，我实在脱不开身，可是按规定，去四分场接受批斗的时间却已经到了。站里几个“老兵”都劝我晚去一会儿，反正平时到了那里也总要等上一气。再说，这次试验很关键，精确度要求高，组里其他人怕掌握不好，稍有疏忽，会造成判断上的差错。想了想，我同意留下了。不巧，试验过程中试剂出了毛病，整个试验耽误了些时间。等结果出来，已经快到中午了。不过结果倒是十分令人满意。它准确无误的说明,第四代‘绿纱”一号身上,理想的性状有了稳定表现，可以大规模采种了。

我的那些同伴高兴得要命！这时，我猛然想起批斗会，刚要出门，大门外响起一阵嘈杂的吵闹声，约摸十来个四分场的“积极分子”已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了。他们把手指直戳到我鼻尖上：

“想翻天还是怎么的？”劈头盖脑一顿臭骂。

又开始了我每日的必修课。大概这一天是我害他们跑了

冤枉路，一个个火气更大了。他们把我双手从背后反拧起来，腰弯了还要弯，头低了还要低。他们怒不可遏地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当我倒悬着头站在那里时，从两胯之间望出去看到的情景，顿时使我忘了一切。牛！在远远的试验田里，牛群从围墙豁口闯进来，它们在偷吃我们的“绿纱”一号！籽粒满株,正在成熟的‘绿纱’一号,经过牛群的一阵席卷和践踏,顶端上的枝头都被扫荡一空，光秃秃的，就象一个人没有了脑袋一样。这是我们几年的心血结晶啊！牛群不是在啃啮绿肥作物，而是在啃啮我的心呀！我再也看不下去，猛然直起腰来。

“报告！”

正在大呼小叫、滔滔不绝的人，被我这声突然的高叫打断,霎时愣住了。

“我请五分钟假。”

说完,我扭身便走,从地上拾起根棍子,舞着、吼喊着,朝牛群飞奔过去。

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容忍牛群毁了我们的‘绿纱’”轰走牛群,正要返回来,突然，我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几天前被牛群吃掉枝头的那片秃顶‘绿纱’一号,不但没有萎弱,反而更加茁壮,剩在枝条上的那些籽粒,夹壳发黑,变得硬梆梆的,全都提前成熟了 我明白了：贪吃的牛群替我们进行了自然的打顶剪枝处理，不但减少了植株消耗 而且由于枝穗疏朗,日照充分,空气流通,促进了草籽成熟。真没想到！我们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却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缘中解决了！我们可以在沙漠中，大规模地培育出活的、生长粮食的土壤了！

正当我欣喜若狂，手里搓捻着成熟的籽粒，忽而放在鼻子上嗅嗅，忽然丢进嘴里尝尝，完全沉浸在这意外的发现中时，“积极分子”们从身后追赶过来了。我当时压根不曾注意他们气急败坏的神色，也完全忘了这些人是来揪我回去的，竟象对待试验站里我那几个同伴一样，滔滔不绝地对他们讲起这一发现的一些科学道理，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成功的巨大欢乐。没想到这些人更加狂怒了，误认为我在嘲弄他们，蔑视他们。几个壮汉一涌而上，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地，又在我身上踏上一只脚。

我觉得自己象块烧红的烙铁，一下子掉进冰水里，感情上再也忍受不了，无声地流出了眼泪。这不是为了肉体的疼痛，而是为了自己被践踏的理想，被蹂躏的美好情操，也为了这些人的野蛮无知，为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我不明白，难道躺在我身边不远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竟是这样一种生活？我流泪，但嘴边却又明显地在笑，培养生长期短的新型“沙大王”的最后一项措施终于找到了！

人们忽然停止了对我的批斗，因为我又笑又哭，他们骂我“装疯卖傻”。不过从那以后，蛮横的人们确实不再来骚扰我了。我忽然获得了安静和时间，使这土壤改良的工作，得以一直进行。想起来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有些莫名其妙，“文化革命”不让正常人正常地工作，却给一个“失常”的人以不正常的安宁，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莫大的悲剧！

我的悲剧生涯换来了大片可耕的土地。在这无边无际的流沙中，土壤的团粒结构开始出现了。这片沙漠开始有了孕育生命的能力，它不再是祖国母亲胸前一块难看的黄色疤斑，

它是大片恢复了健康的肌肤！

粉碎‘四人帮’前夕,魏大雄忽然调来农场当头头,这真是大出我的意料！我原以为，我们两人关系一定会十分别扭，结果却不是那样。魏大雄变得老练和更加乖觉，他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竭力不提往事，仿佛我们过去不是耳鬓厮磨的同窗学友。然而，他却又悄悄利用自己职权来改善我的处境。起先，我认为这是为了弥补他心灵的愧疚；后来又以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来调动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最后，我渐渐看出来了，老魏在农场所干的一切，在他雄心勃勃地想把粮食搞上去的奋斗目标背后，隐藏着某些疯狂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如果容忍老魏那一套，用不多久，二十年前吴场长带领战士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的这片良田，会重新沦为千里赤地！

谁曾料到，当这场新的矛盾在我和老魏之间逐渐酝酿发展时,黎珍却作为‘钦差大臣’来到了我们中间啊,难道这就是命运？为什么又一次让我们三人相逢在一起！

按说，我一定会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二十年的日日夜夜，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她！今天，她终于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自己象置身在强烈的阳光下，一时睁不开眼。只要瞥一下她那信任而深情的目光，我就觉得她没有变，她依旧会象以前一样理解我。然而看看她儿子刘军，她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又使人茫然失措，真不知道事情会是个什么结果。……

八 （黎珍）

我们三个人在辽阔的耕地上行走。春天干旱的土地，腾起一股轻烟般的尘土，依恋地跟在我们身后，好象我们是三艘行驶在海面上的小艇，牵动着三条长长的浪花。

眼前的景象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们来到一片规划得很好的种植区，最外围，是封沙育草的造林带，流动沙丘上都插着风墙，沙畔上打着网络般的沙障；往里，是七道与主风向垂直的、宛如峭壁一般矗立的主林带，还有三道与主风向平行的副林带。林带与林带之间，按照地块，是一道道挡沙的毛乌柳灌木墙。庄稼可以在这些树木的严密护祐下，不受风沙侵袭地茁壮成长。

“瞧！这就是我的农场的国土！”老魏伸手朝四下里一扬。

说实在，我挺喜欢这种自豪的气派，这是一个热爱自己事业并对此充满信心的人才会有的。

老魏说完甩开大步，真的象是行走在自己国土上一般，他既不避开坑坑凹凹，也不选择落脚点，擦得黑亮的马靴很快便蒙上一层白白细细的沙土。望着他那副自信、稳重、精力充沛的模样，和大学时代那个大大咧咧的鲁莽汉子形象，确实大不相同。他那身衣着似乎也有些耐人寻味：深蓝色的毛哔叽上装，表示出他担当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下身的一条国防绿的确良军裤，似乎又在告诉人他立足革命，不忘艰苦奋斗。看得出

来，今天的老魏，是一个很知道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有明确奋斗目标的人。

以前，小军从未对我提起过他们场长的名字，总说我们那“头儿”。开始，他总骂他们那“头儿”，后来，骂得慢慢地少了，前不久，竟吹捧起“头儿”来了。因此，当我这次来到这里，听说“学大寨先进单位”东风农场书记就是我的这位老同学时，真是又惊奇、又兴奋。

在我来到的这一路上，听到的全是对老魏的一片赞扬声。从地委分管农业的张书记到农管局一般干部，凡是我访问和交谈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肯定老魏在工作上是“一把手”，有干劲，有办法，善于打开局面。调来“东风”才三年，这个“老大难”单位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粮食亩产上了“纲要”，总产从七五年的四十五万斤，跃升到七六年的九十万，又跃升到七七年的二百万，去年一鼓作气拿了个四百万斤。三年间翻了三番，轰动了整个农垦系统。要知道，这样的成绩，不是出现在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带，不是在温暖的水乡泽国，而是在伊赫沙漠，在这个两千多年不曾种植过的沙漠荒地上呵！

他们还称赞老魏性格好，待人热情，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没有一般大学生的清高、呆气。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搞宣传报导的同志，对他更是赞不绝口，哄传着魏场长的种种豪兴壮举。说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去“东风”参观的人，不论外宾还是内宾，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去的，不论大报记者还是小报编辑，魏场长都亲自陪同，亲自接待，招待起来由衷地周到、慷慨。据说，他把这里的海（水里游的）、陆（地上跑的）、空（天上

飞的）都动员出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假如客人是男的，魏场长就会举办一次夜间围猎，开着大功率的越野车，在沙原上进行扫荡，把沙狐、野兔从芦苇丛里轰将出来，然后驱车追捕围射。客人们在车上喧呼奔逐，一个个都忘了年龄、身份，一时间真是痛快淋漓，赛过古代王侯帝胄。如果客人是个女的，那么就有一次水上鱼宴。听说这里有个美丽的沙漠湖泊亚茨海，海里盛产黄河金翅鲤鱼，大家划着小船，在水上用鲜鱼做成别有风味的野餐。热爱美食的记者们告诉我，到“东风”农场出差，简直不能算是工作，而是外国小说里描写的去往乡间别墅的绝妙休假。老魏变得这样风趣和饶有生活情趣，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清新的和煦的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不时停下来，一会儿在防风林带里抬头望望阳光下泛着青光的那些高耸入云的剑杆杨，一会儿又伸手抚摸那些象羽毛一般刚刚长出细叶来的毛乌柳枝条，顿时觉得这一路上的黄沙风尘，和由此引起的眼球视网膜的疲劳疼痛，和包围着我们的大漠一起，都退到了远远的地方。

“喜欢我们这里吗？”老魏殷切地问。

“嗯。”我点点头，“喜欢。”

“大概未必真的吧？我知道，老同学的鼓励，三分是真话，七分是出于友谊。”

“恰好没有猜对。岂止是喜欢，简直有点爱上了！”

魏大雄突然放出一阵直鲁豪爽的笑声。

“启明，你听听。”他转过身去朝辛启明喊，“要这么说起来，黎珍对我们这儿还真有点兴趣哩！这可是我们的福音，是

不是？”

启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忽然又打住了。

我指指防风林带问：

“这些树，都已经几年啦？”

“十五、六年。”

“照这看来，伊赫沙漠里高杆林的成活率是比较高的？”

“不能一概而论。”老魏振振有词地回答，“等等我们看了大渠那边的树木，你就会发现，高矮大小，跟这里能差上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八年！其实都是同一年种下去的。因为伊赫沙漠地层结构太复杂，土层不同，厚薄不均，影响树的生长。有时还出现这种现象：一棵树，下半部分枝叶很正常，但上半部分却全部枯萎黄死了，就象我们看到有些人的头发，四周还一片漆黑，茂密，但头顶心却已经是光秃秃的一片。”

“这为什么呢？”

“根据历史记载，一千零六十年前，这里是古黄河流经之地，地下冲积层多达几十层，而且全是横向。树根扎到一定深度就扎不下去，只好横着走开花根了。”

“那么这个难题解决了没有呢？”

“这个拦路虎嘛，早被我们收拾了。要不然，这几条林带里的树木能有这么冲吗？”老魏脸上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

“能说说采取的措施吗？”

“对钦差大臣嘛，任何东西我们都如实奉告，绝不保密。”魏大雄把我领到林带旁边一排柠条跟前，“看，就是靠了这个！”

我莫名其妙地问：

“柠条跟这有什么关系？”

魏大雄眉毛一扬，几乎是惊讶地叫起来：

“关系可大啦！柠条根须能打直穿透地下冲积层。靠它们在前头开路，这些树木的根须才能扎进底下好土里。而且，柠条根须上大量的根瘤菌，还能补充咱们土里的氮肥不足，促进树木生长。”

“这可真是个绝妙的办法！”我高声叫起来，为自己老同学工作上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老魏，你成了林业专家了！”

“我可不敢掠人之美。”老魏谦虚地说，“应该说，专家是他。启明是我们农场的一个宝贝！”

“是吗？”我朝启明望去，兴奋的泪水已经沾湿了眼眶。启明没说什么，慌忙地掉转头去，望着别处。

“老魏，启明，主要是你们这路子想的非常对头，真的，怎么会想到这上头来呢？应该好好总结总结。”

“这个嘛，启明最有发言权啦！”静默了一会儿，魏大雄代启明回答说：“在我们沙漠里，要没有林业和水，农业想上去根本不可能。可惜的是地方上经费有限，许多设想仅仅是设想而已。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启明，是不是？”他停了停，见启明无意回答，又管自说下去，“如果这次商品粮基地能被批准，由国家投资，那日子就今非昔比了。我们要再搞上它几条林带，耕地面积扩大它一倍，对国家一定能作更多的贡献，这就要请老同学在上面替咱们多美言几句罗！”

“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工作。条件够了，我们还求之不得呢，商品粮基地越多越好嘛！”

走过一片刚翻耕过的地块时，我伸手在垅沟里抓起一把泥土，摊在掌心，微风吹走一缕轻烟似的沙雾，但剩在掌心里的是有团粒结构的土壤，看去是沙壤到轻壤的过渡阶段。

“怎么样？”老魏凑过来问。

“你们把沙漠荒地改造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啦！”

接着老魏又领我参观了水利灌溉设施，控制闸、扬水站，除了两个进水口去年淌水时被渠水冲坏，用柴草胡乱地修垫起来临时使用外，其余都清一色是洋灰砖石结构，结实坚固。看去管理得井井有条。

说实话，我没想到东风农场的土地能规划得这么整齐、科学。

“老魏，”我问，“这里土地潜力原来属于几级？”

“各个地块不尽相同。启明那里有详细的土地潜力分类图。”

我和老魏不由得同时回过头去，发现启明已经落在后面了。他那磨磨蹭蹭的样子，勉强挪动的脚步，和阴郁孤僻、暗自忍受的神情，处处流露出对我们这番谈话的冷淡。忽然，他好象发现了什么，向旁边一条小路拐去。我们只好再踅回来，跟着他，穿过农田，爬上象高速公路一样光洁平滑的大渠渠背。

这里一群青年正在清理大渠。我们来到时，启明正在和一个队长模样的人讲着什么，他皱着眉，态度很严厉。队长仿佛在向他解释，用手指指魏场长。启明转过身，象要对老魏说什么，可是看了我一眼，又压住话头了。

“黎珍，这也是我们这里改良土壤的一项措施，”老魏介绍

说“根据化验,黄河水里含有大量腐殖质和多种矿物质,每年随着流沙淤澄在渠底。春天耕地的时候，放水之前，我们把渠底淤泥挖出来，上到地里，既清理了渠道，又增加了土地肥力。”魏大雄突然打住话头,原来他发现清渠的青年农工,一个个都拄着铁锹，并不干活，站在那里嘁嘁喳喳地议论什么。

“喂,伙计们,这是怎么啦?”老魏大吼一声,走到几个农工面前“是不是铁锹感冒了?一个个都在替铁锹号脉。”

人群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这个老魏可真能耸人。等这一阵骚动平息下去，一个青年大胆地说：

“报告魏头，发现有地下水。因为是临时通知，我们事先不了解,没有准备工具。”

“库房里不是有抽水机吗?”

那个队长走上来报告说：

“已经扛来了。但水头过浅,泵不上。”

“泵不上水？那你们窝工不干就有理了？是不是？”他威严地扫视了大家一眼“统统给我干活去!”

有的人慢慢散了开去，挑了一块没有挖过的干燥地方干起来；但不少人对老魏的高声吆喝，仍然无动于衷，默默地站着。这些沉默的脸上，显然流露出不情愿和不满意。

启明也在一旁满脸不高兴地望着他。

我发现气氛有点紧张，老魏的脸色唰地变白了，虽然这种苍白的颜色在他那风吹日晒的皮肤上很难看出来，但他的样子确实激动，隐忍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他动作敏捷地跳落到渠里,朝人群嚷道“谁把铁锹借我使使?”

话音刚落，马上有人递过把铁锹来，老魏把锹插在地上，

扒下毛哗叽上装，往干坡上随便一扔，象庄稼里手一般往手掌心吐了两口唾沫，然后拔起锹，在紧靠渠边那块地方上挥舞起来。

我不知道应该走开还是应该等着，转身一看，启明已经不见了，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生起气来。一种不安的感觉攫住了我，是因为恼恨我，想起了往事，才跟老魏找起别扭来的吗？没人伴同我，只好呆呆地站在原地观看起来。

我在干校劳动期间，同村社员中有一个来自黄河灌区的亲戚,他对我说过,他们那里的庄稼人最苦、最繁重的活计,就是挖渠劳动。可是看老魏干这活计，简直不能算是劳动，而是一种优美舒展的健身操！他挖土的动作，不象身旁那些城市里来的兵团战士那样笨拙，做出很多多余的动作。他先后退一步，使身子和取土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拿锹的双臂向后缩,锹头对准目标,然后向前猛跨一步,一猫腰,只听‘嗤溜’一声，连锹头带锹把，差不多把铁锹的三分之一斜插进土里。接着，收腿直腰，顺势把锹把轻轻一提，泥土发出一声吸吮的声响，一块半米长一尺厚、象钢锭一样的坷垃，随着铁锹切割下来。老魏趁这时换了一口气，然后一蹬腿，一扭腰，把锹向后一扬,这团五、六十斤重的泥块,越过好几个人的头顶,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以后，摔落在一人多高的渠岸上。

人群中发出一阵由衷的赞叹，不知是谁竟失声叫起好来。围聚拢来看场长挖渠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老魏！当年在大学里就已经显示出自己是庄稼里手，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他成了声名赫赫的东风农场领导，没想到这一手不但保留着，而且

练得更精、更纯熟了！

随着老魏不停地跨腿、弯腰、挺身、扬臂，一进一退，锹起锹落，他面前的那块渠底淤泥，象是打豆腐一样地被切开、取走，不一会儿，就挖出了个正正方方的土坑，地下水从四下里慢慢渗漏出来，越积越多，变成了一片泥泞。老魏赶忙跳出来，向后挪几步，又飞快挖出第二个方坑。这时，他直起腰来，抹一把头上汗水，见队长站在人群后头，便用手指招他上前面去。

“听着 就用这个办法，把人分成几拨，两边同时进行，还能窝工吗？慢！听我把话说完。”他看队长马上转身要去行动的样子，一把拽住他，把手里的铁锹在第一个坑里比试了一下，又在第二个坑里比试了比试“看见了吧，这个比那个深一点，一截挨一截挖下去，坑子肯定一个比一个挖得深。然后在渠道中间开条排水沟，各个坑里的积水，自然都流到最后那个坑子里，这不就能用上抽水机了？”

“这回我全懂了！”队长大声答道。

“这就是灌区老乡常用的方法，叫‘倒窖’，把人倒到最先挖的坑里，再接着往下挖！”

人群中一阵嘤嘤嗡嗡的骚动。

“嘿 魏头真有两下子！”

“那还用说，他就能来真格儿的！”

“这回呀，我算眼见了 服啦！”

不等老魏发话吆喝，人们自动散开去，按作业组分片包干地干起来。只有一个小青年还站在身旁。

“你还蘑菇什么？还不干活去！”

小青年指指老魏手里的铁锹：

“我的铁锹……”

“拿去吧!”老魏正要把锹递过去,突然又停住了,“刚才你借锹给我倒很积极，大概是想出我洋相，看我笑话吧。鬼东西！你不用拚命摇头。你们那两下子，哄得了你们队长，可哄不了我!”

“魏头,场长,我……我这全是一片好心呀!”

“行啦行啦。今后你服从命令听指挥，能象借锹给我那么积极就好罗！”老魏举起铁锹，用满沾泥水的锹头在小青年屁股上拍了一下，随便把锹扔还给他，发出一阵开心的爽朗的大笑。

我也不由得笑起来。说实在，一上午参观，这里的土地情况、灌溉条件、农田防风固沙的各种保护性设施等等，都出我意料。还有老魏，撇开私人成见，应该说是个称职的领导，将来商品粮基地的担子，他完全能拿得起来。他懂业务，有群众威信，那种跟下属打打闹闹却不失威严的能官能民的作风，在农工们中间似乎挺讨人喜欢。至于那股子身体力行、说干就干的泼辣劲头，在现今我们国营农场场长中更是不可多得。就在我心里隐隐忽忽地萌生出这样一个动念：可以考虑把东风农场列入商品粮基地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把我这念头一下子动摇了。

当我们兴冲冲地从大渠上走下来，四处张望寻找启明，渠背上、人群里,都不见他,这时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迎面跑来,截住老魏。

“这还象话啦?”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嚷嚷,“谁把林业队调

来这里，害得我在苗圃白等一早晨！刚才找见辛站长，他说也不知道,叫我来跟场长说。”

“这事我同意的。”

“这怎么行呢,魏头,要不把树苗起出来,影响我们做苗床啊!”

“临时调换一下嘛。水利上来电话说,粉碎‘四人帮’,他们生产积极性也上来了，今年放水时间比往年提前半个月，误了大田总不好吧？”

“今年这块地不是说？……”

老魏没让那人说完，立刻打断：

“这事我和辛站长研究后再说吧,你不用管了。’不等对方回答，老魏便转过身来对我说，“把启明丢了，咱们找他去吧。我刚才看见他朝机耕队那边去了。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刘军可能也在那里。”

一想到马上能见到儿子，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咳,启明这个人哪,’略微静默一会后,老魏说“二十年了，脾气一点没改，反而越来越古怪了。这回你来，咱们老同学一起劝劝他，都过去了嘛，要朝前看，老是念念不忘地记着那些事有什么好处？”

“他的问题现在怎么样啦？”

“年初给他落实政策,我的意见是问题改正过来,党籍恢复。都已经上报了，正在等批，过两天就准备开大会正式宣布。可是你知道，我没想到难度这么大！”

“为什么呢？”

“干部和群众似乎对他都有点意见。按说他工作没少做，

一直埋头苦干,有不少贡献。”

‘那么?…… ”

“老毛病，他吃亏就吃亏在脾气上,还象过去那样，见什么讲什么,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讲真话,这当然是对的,但要考虑社会效果！你说对吗？”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地随他走着。老魏起劲地讲着机耕队情况，向我介绍起农场的机械装备来，但我思想却再也集中不起来，一会儿闪过启明的事，一会儿又想到刚才那个苗圃老职工跟老魏要人的情景，先前心里那股子兴致勃勃的兴奋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大渠这边的树木确实矮小多了，稀稀落落地矗立在农田边沿，起伏的沙丘从树木与树木的缝隙间显现出来，透露出大漠的荒凉。忽然，我们听见一片喧哗的人声，好象有人在吵架！老魏先是一怔，侧耳听了听，也顾不上招呼我，便疾忙从一片沙枣林的树衖中钻过去，壮实的身躯叫沙枣树带刺的枝条钩住，纠缠了好一阵子。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紧紧随在他身后朝前跑去。

地边上停着台拖拉机，一大群人围在那里，我们来到跟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启明高高的身个，脸色煞白地站在那里。他衣衫凌乱，有几綹头发直钩钩地垂挂在额上，整张面孔由于紧张和激动扭歪了。鼻子淌着血，他正用手绢狠劲地擦拭着。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启明面前，被两个复员军人模样的农工紧紧揪住，还在朝启明跳着脚大骂的不是别人，竟是我的儿子小军！

“你小子敢撒野打人?”一个复员军人气得跺着脚,声音嘶

哑地朝小军喊“：看老子教训你！”

几个人一齐呐喊起来：“揍他狗日的！”

话音刚落，另外一边也有几个知识青年上去了：“打就打！”

有个人劈头盖脑地拿起大巴掌就朝小军扇去。

“别打他！”启明一把抓住那人的手。小军趁隙抽出拳头，“当”地一拳又朝启明当胸打去。这一下，几个复员军人可不饶他了，大家一涌而上。

“小军！”我惊恐的喊声淹没在嘈杂的喧哗里“，小军！”我推开众人扑了上去。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似的断喝：

“你们这是干什么！”

人们见场长来了，一个个松开手站下了。

“什么事闹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象话吗？啊？！”

“小老头他打人！”一个复员军人气势汹汹地指着小军，“你当辛技术员好欺负是不？”

大家朝启明望去，他那两道目光，从深藏着的眼睑后面抬起来，落在了我的脸上。是愤怒？是谴责？是羞辱？是辛酸？它带着那样难言的痛苦，胶着似的停在我的脸上，注视我的眼睛，烧灼我的心。啊！怎么竟是这样！二十年后的重逢，第一次见面竟会是这样开始，我简直眩晕了，双脚象生了根似的钉在地上，一步都动弹不得。

人们诧异地看着我们，小军也惊住了：

“妈妈！”

启明的脸，骤然由苍白转成深红色，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人们叫他，喊他，他却越走越快，最后简直奔跑一般

地逃开去。

“小军,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用轻得连自己也听不见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对儿子说。

“他活该!”小军还处在亢奋状态,脸涨得通红,眼里象要冒出火来。

“住口!”老魏立刻喝住了他;“就凭你这态度,今天,我当着你母亲的面，就该狠狠批你一顿！现在，你先陪母亲去招待所，待会儿去给辛技术员检讨道歉，听见没有？回头我要检查。”老魏接着叫那几个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留下来，其他人都回各自岗位继续干活。然后转身对我说：

“黎珍，你千万别介意。我在这里把情况先摸摸，回头就去找启明。真对不起，只好请你先回招待所歇息，那里我都安排好了。工作我们下午再谈，唉，真不凑巧！”他朝小军挥挥手;“你们现在就走吧,小车在前面路边等着。”

在我们朝越野吉普走去的路上，我忍不住对儿子说：

“小军,你刚才说他活该,可他是妈妈的老同学呀!”

“什么老同学!他是老右倾,老右派!”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哆嗦,再也说不出话来。

“妈妈,你怎么了?你哭了?”

“没有。”我摇摇头,咬住嘴唇,赶紧打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免得让小军看见这不听话的眼泪。

九（辛启明）

我发狂一般地逃开去，起先，还听见身后一片乱纷纷的叫喊声，渐渐地，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只有一个念头：但求不要听见他们的嘲笑，但求快些避开他们怜悯的目光。躲开黎珍，躲开大家，越快越好。气愤、羞辱、伤心、激怒，象一团乱麻，满满地涌塞在我心头。

生活作弄起人来，怎么会残酷到这种地步！它让我们两人出其不意地相逢，忽然又让她儿子动手揍我，让她在一旁目睹，这真是太不堪忍受了！

前几年，在我受尽非人的凌辱和折磨时，曾暗自庆幸过，她不在身边，没有看到我受尽侮辱、无力自卫的那副可怜相；但我又千百次地呼唤过她，多么希望她能在身边，因为只有她能理解我、抚慰我，能给我力量。然而，当这一切都象恶梦般过去，她当真出现在我身旁的时候，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多么可怕，多么颠倒，多么叫人不可思议！

不知这样走了多少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朝什么方向走着，跨过一条又一条沟渠，穿过一片又一片树林，后来，等情绪稍微冷静下来，开始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今天，刘军为什么这么不讲理，这样反常？按照平时我们之间毫无利害冲突的那种淡漠关系，他大可不必对我这样剑拔弩张。当我告诉他们今年这块地休耕，轮种绿肥作物，别的拖拉机手都暂时停车不耕

了,唯独他,不但不停,还故意把方向盘往右一打,大模大样地在我眼前耕过来耕过去。于是，我命令他停车,告诉他 牧耕种草是场部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季节不到，过早翻耕要破坏墒情。没想到刘军完全是一副不屑一听的神气：“管委会决定怎么的？是魏头叫翻的。”我说魏场长也参加了会。他却怒冲冲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拉着我要找魏头去。就在这推推搡搡中，他和过来帮我斥责他的几个农工争吵起来，竟动开拳头了。看得出来，在这整个事件中，刘军对我有气，想给我点颜色看。这么说，他已知道我和老魏之间最近爆发的尖锐冲突，我的看法和打算也已经不胫而走，传播到部分群众当中去了……

前面出现了几间眼熟的红砖小房，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不知不觉走在十几年来已经习惯了的这条通往试验站的小路上。

大概从窗户里看见我神态有些异样，那几个正在处理土样的“老兵”,都从屋里迎出来。他们看见我脸上的鼻血,凌乱的衣衫，便忙扔下手里的筛子、碾磙，打水倒茶，替我洗净血迹，扶我躺下。经他们再三盘问，我只好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我们互相注视着，沉默着。这些朝夕相处的老伙计们，二十年前一个个都是英姿勃发的青年战士，现在，岁月也毫不吝惜地在他们额上刻下了皱纹，都成了儿女成群的当家人，有了老婆孩子，有了生活负累，同时也有了深谋和远虑。现在，他们听了我的讲述，一时都不说话，眼里流露着同情和担忧。过了好一阵，他们才开口。

“你别在乎刘军,那小子是个‘坎货’①,跟谁都撒野。”

“听说过几天他就要滚蛋了。临走前，看我们好好教训他！”

“问题不在刘军,他背后是魏头。”

“可不是嘛,大伙背地里都叫他‘魏二世’!”

哦,黎珍,你知道吗,你的儿子成了‘魏二世”,这一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吧！……

记得刚来时，刘军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个小流氓：头上缠着条绷带，衣领歪吊着，好象刚刚跟人你死我活地撕扯过一阵。那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似的,(天哪,我怎么能想到它那熟悉的轮廓来自谁的眼睛！）那张算得上是俊秀的脸上，刺目地留着一撮乌黑的小胡子。孩子们因此都管他叫“小老头”。

“小老头’体魄强健,肌肉发达,胳膊往胸前交叉一抱,两块肌肉便鼓突出来，中间能夹住根纸烟。可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他把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算成四分之一，把“六亿神州尽舜尧’说成‘顺着摇”,在全农场传为笑柄。平时干活懒懒散散，提不起一点精神，一听工间休息哨声，他和他那伙子人便立刻象死去一样，往脚下的土地上一躺。那种毫不选择处所、满无所谓的神气，和四仰八叉仰天而卧的姿态，让人们觉得他们象是饱经忧患，对生活已经绝望。我那时常常望着他们想，这些孩子的心灵，也象是一片丧失了生机的荒漠啊！

刘军唯一的本事就是打架， 为他自己,也为‘哥儿们”。他

---

① 西北俚语,指那些头脑简单,直忤得近乎蛮干的小伙子。

打起架来神情格外凶狠，完全是豁出命拚的样子，所以大家都怕他，队长、组长们都让他三分。从那时起，老魏就暗暗地盯上他了，想着有朝一日要把他拿住。不久，这样的时机真叫老魏等到了。

那是去年誓夺总产四百万的“大会战”里，场部把所有派出在外的劳力统统调回来。刘军所在的积肥排，整个冬天就住在一百多里外靠黄河的城镇上，也得到了火速回场的通知。第二天上午，积肥排全体人员，按照头天夜里排长的布置，在农管局转运站院里集合上车，返回农场。可是，当汽车走出约有一半路程后，排长忽然发现刘军不在车上，忙乱中，把他拉在城里了。只得把汽车又开回转运站。排长气急败坏地冲进他们原先住的那个楼里，几个房间都找了，却不见刘军。这一下,大家全着急了,所有的人分片包干,有的上街去找,有的上电影院，有的上澡堂子，……最后，在一间烟雾腾腾的客房里发现了刘军，他正全神贯注地和一帮陌生的旅客起劲地“抓娘娘”。排长找得满头大汗，脸色煞白，气得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好!刘军,你在干什么?”

小伙子把嘴里叼着的纸烟从这个嘴角移到那个嘴角，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手里的扑克牌，不慌不忙地说：

“我干什么?你不是看见了嘛!”

“为什么汽车来的时候不出来站队集合?”

“着什么急，你们拉不下我，一定会来找的。你瞧，这不是，没有猜错吧？好，现在我们走吧，这一把也打完啦。哥儿们,失陪!再见!”

这天，因为刘军的耽误，大家回到农场已经天黑，吃罢晚

饭也就休息了。哪想睡到半夜，老魏从分场检查春播工作回来，听说这件事后，立刻象阵旋风似的闯进集体宿舍，一脚踢开房门，扭亮电灯，把孩子们一个个从铺位上喊起来。只有刘军纹丝不动，依旧蒙头大睡。老魏三脚两步走过去，一把扯掉他的盖被，象拖死狗一般地拎着那孩子的两脚，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掼到门口地上。紧接着，枕头、褥子、盖被一起飞向房门，重重地打在刘军身上。

就在老魏大打出手的时候，政工科长、办公室主任、作业队长和我，一大帮人都闻讯纷纷赶来。我发现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呆了。刘军一开始也有点懵了，过一会儿他从被褥堆里一骨碌爬起来，但没等站稳，老魏又咆哮着冲上去，一个耳光把他 搧在地上，同时用能想起来的一切脏话冲他破口大骂，暴跳如雷。

我连忙跑过去扶刘军。他粗暴地一把推开我，自己跳了起来，样子又狼狈又凶狠。大家都以为他马上要扑过去同魏场长拚命，没想到，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旁的血迹，忽然笑了。

“嘿!有你的,还真够劲儿!”

我看出来了 刘军这帮人,服的就是这一套——不要命和不要脸。

“少废话！下地给我干活去！不播完那几亩地，看我把你种在地里!”老魏怒不可遏地吼叫着。

“得让人穿上裤子吧,总不能光着腚去。”

“必要的时候,就让你光腚!你当我不会?”老魏怒冲冲地喊着,“由于你的破坏,九号地播种任务今天未能完成,你要是

今儿黑夜不给我把剩下的那几亩如数完成，明天看我把你扭送派出所，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判你的罪。我决不允许再出现破坏四百万斤粮食任务的行为。谁要是跟我耍花腔、调屁股,没谁的好！”

刘军乖乖地穿上裤子，跟着作业队长去九号地和夜班工一起干活了。第二天，老魏又拧住他在积肥排承认错误，并且叫农场广播站播送他的检查，狠狠地灭了一下刘军的威风。事后，我听见有人在悄悄议论：场长做得过分了，这会结下血海深仇的。“小老头”迟早要找场长算账，爆发一场激战。

但出乎人们意料，激战非但没有发生，倒是场长彻底把“小老头’收服了。

这是七月间麦子快要黄熟的时候，刘军从北京探亲回来，象骡子一般地驮着大包小扎,网线兜、旅行袋,背上背的,手里拎的，肩上挎的，呼哧呼哧，步履蹒跚地从火车站来到转运站问讯顺路车辆。这一天，正是久雨放晴，从城镇回伊赫各国营农场的旅客和农牧民格外拥挤，班车票三天前就已经售空。“小老头”再厉害，此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做一般人都会做的事：准备一盒高级的、带过滤嘴的香烟和一脸讨好的微笑，朝那些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的运货卡车司机走去。

正当他腆着脸跟一个青年司机搭讪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迭连声的汽车喇叭声，一辆越野吉普从刘军身边开过，“吱”地一声在前边停下了，老魏跳下车来。

“是小老头吧？”

刘军看见场长，知道这是麦收关键时刻到了，平常住在远离农场的城镇里的“头儿”又来作照例的巡行督战。

“刚下火车？”场长亲昵地说，“快上车来！我送你回场部？”

“你送我？”刘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他还可怜巴巴，千方百计地想在货车上搞到一个位子；现在场长主动要用专车送他回场部，他反倒犹犹豫豫，磨蹭起来。

“谢谢，”他喃喃地说“：你是官儿，我是兵儿，我还是搭卡车回去吧……”

“哪来这么些臭讲究！”魏场长一边说，一边夺过刘军手里沉重的旅行袋往车门里扔。“早回去早休息，过两天割麦子，就要使大劲啦。”

周围等车的旅客都带着羡慕的神情瞅着他们两人。有人劝刘军：

“别不好意思啦，有小吉普还不坐？小伙子，领导上也是从工作考虑，快相跟上回哇！”

也有的旅客称赞地议论：

“哪个农场的？这么关心群众的领导打起灯笼也难找呀！”

刘军拎起大包小扎，在一片赞羡声中走过去，伸手扭开后车门。

“坐前头！”老魏又亲切地拍拍刘军的肩膀，象对待平辈兄弟一样“：你个子高，坐后面颠得厉害，碰烂脑袋。”

这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态度，完全把刘军征服了。他大概在自己家庭以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待遇，人们不是打他、骂他、瞧不起他，就是拍他、溜他、利用他。而现在，场长兼党委书记，——农场的头号人物竟这样礼遇他、抬举他，不说

受宠若惊，也是感激涕零了。

总之,不知出于哥儿们义气还是‘士为知己者死”,也不知还有什么更深奥的原因，从那以后，刘军便对老魏服服帖帖了。麦收劳动中，他确实使出全身力气，还带动了他那一帮人。魏头当时就给他评了个“先进工作者”。麦收劳动结束后，又把他调到机耕队，补上了那个许多人眼巴巴望着的、许多人在争在抢的缺额。而刘军也就成了老魏最好的义务宣传员。每当新闻记者来“东风”采访，刘军常常作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活典型，现身说法，一有机会，便向记者们夸夸其谈地吹嘘场长的“功勋”。因为他跟魏头跟得特别紧，孩子们不再叫他‘小老头”,背地里都称他为‘魏二世”了。

前不久我才知道“‘魏二世’的父亲在‘四人帮’魔爪下被迫害致死，他跟着姥爷和姥姥长大，心灵上受过重创，失去正常成长的环境，是情有可原的。可谁能想到，他的外祖父母就是我视若亲人的那一对善良的老人；而他的家，就是我魂牵梦萦、多少次在冥想中看见的那个整洁幽雅、摆满盆花的小院，一个清新得象夏天的早晨般的姑娘，正在那里用喷壶殷殷浇洒……

见我默然无语地躺着不说话，年岁最大的老王劝慰说：

“既然明白这底里,老辛,就算了吧,别太认真啦!人家是一场之主，他要把拨给林业队的劳力调回清渠，就让他清去呗。他不着急，你替他着什么急？”

“……”

“人家嫌你是多管闲事啦!”又一个老兵说。

这哪是闲事！”不错，去年我们农场粮食是上去了，可成

本核算怎么样？大大突破了规定指标，每斤粮价高达五角几分，农场财政上出现最大赤字，眼看连职工工资都开支不了，于是就想出个“农业损失林业补”的招儿：虚报造林面积。在我们沙漠地区，造林一亩，国家付给几十元，育苗一亩几百元，数字报上去，钱就下来了，这才补上这个窟窿。

“算了，别生气了，咱们农场工作本来就这么回事嘛！”

“可那是欺骗国家！”我长叹了一声“：去年我提出意见，老魏说这是预报，不是谎报，保证今年开春一定把造林数字实际补上。可是种树季节到了，他又变了卦……”

“唉，这叫下坡的车难刹闸，到了这一步就身不由己，由不得他啦！”老王说。

“就是这话！”另一个老兵说“：不光造林，他叫刘军他们翻上地了，看来‘帮产田’也得照旧。”

“那还用说！眼下‘东风，叫得这么响，粮食总产今年不说再往上涨点，还能不如去年吗？去年种一万亩，帮产一万亩，把所有的地都种上了，才闹了个亩产过‘纲要，。今年你们瞧吧，准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什么粮草轮作，什么种草休耕，靠一边儿去，保住自个儿头上乌纱帽要紧！”

“所以我说老辛，”老王拍拍我的胳膊肘“：你何必挡人家道呢？‘小老头’这一拳，是在跟你打招呼呢，说不定往下还有戏！”

我心里一阵刺痛，难过得闭上了眼睛。平心而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挡谁的道。我不需要同老魏个人论长短、争高下。二十年前的分歧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如果前几年人们还不清楚这一点，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党对五九年那

场斗争已经作出明确结论之后，我们各自都该得出应当记取的教训了吧？现在看来，论争并没有结束，消除过去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脓疮，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还有不少阻力！文字上的结论要成为实践生活中的真理，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斗争中，本来正确的我还是居于劣势，而本来错误的老魏却具有更大优势，因为他已经成了我的上级。难怪试验站的这些好心肠的老伙计们怕我吃亏受治,都劝我‘别太认真”。

“老辛啊,”一个老兵见我睁开眼,便往前凑了凑,声音中饱含知己之情：“老辛，咱们都是相处二十年的老伙计了，你的为人，大伙心里有数。可是魏场长这个人，他上上下下都打点好了，你能斗过他？去年你没少提意见吧，结果又怎么样呢？”

“算啦，算啦，老辛，你也算尽到心，对得起农场和国家啦。……听说这回商品粮基地就要定下来了，魏头不久要调管理总局,青云直上啦!”

是啊,这一年来,我反映我的,人家照样‘先进”人家的。不但没有人认真理睬过我的意见，而且由此对我个人，倒悄悄传出种种议论：有的说我在历史上就和老魏有私人成见，我这是借生产问题闹个人纠纷，拿革命工作撒气；有的说我翘尾巴骄傲了，忘记了自个儿到底是什么人！还有的说：辛启明尽管熟悉业务,但思想保守,科学性有余,革命精神不足,不适合我国农业大干快上的发展需要……

“老辛,’略微沉默一会后,老王又语重心长地开口说;‘你我都四十多的人了，也该为自个儿后半辈子想想了。二十年，

不短啦，如今总算熬出头了，问题平反改正，党籍也眼看着批下来了。在这节骨眼上，还是慎重点好哇！”

“落实政策又不是他魏头个人恩赐。”另一个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该落实他不给落实,那就不行!”

“话是这么说,可工作得人去做,你懂甚么!”

老伙计们你一言他一语地劝说了一阵。见我不吱声，有的拿起放在地上的筛子，有的拿起碾磙，一个个到外屋继续处理土样去了。老王走到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看着我,说：

“还有一点你也得考虑。”他的口气里充满着关注“去年总产完成指标，亩产超了‘纲要’，每个职工能得几十元的奖金。钱不算多，而且没发到手里，还挂在账上，可大伙都盼着它呢。就说我家那口子，早把这奖金打在买缝纫机的数里了。你把这一切都捅穿了，这奖金还能给不？大伙会怎么想？我那口子我能做好工作，压住她，别的大姑大嫂愿意吗？你知道，场子里有几个泼得出命的老娘。老辛，你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多考虑一层没坏处,都是为你好!”

听了老王最后几句话，不知为什么，热泪在我眼眶里慢慢涌出来。我忽然之间觉得：原来在我们生活中，一个人要说几句真话，竟是这样的不容易呵！只要一想坚持实事求是，麻烦立刻就层出不穷：自己受点委屈不提，要得罪那么多人，从地委领导到农场大娘大嫂们，好象我故意跟这些人过不去似的，一下子处在了与众人为敌的危险地位上。唉，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讲真话怎么这样难啊！

然而我没料到，“麻烦”这么快就又找上门来了！只听见

外屋响起一片妇女纷纷扰扰的说话声，领头的象是玉玲的妈，那位全场敬而远之的“胡大娘”。我先是一怔：女人们从不上试验站来。但接着马上就明白了：老兵们有预见，这是刘军对我进行‘磕打’的继续。“钦差大臣”来了，首先得封我的嘴，因此农场的这些大娘大嫂子们因为奖金的事找我来了。有什么法子呢，既然在我们这里，一句真话还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那就自觉地迎上去，躲躲闪闪是讲不成真话的。

女人们的吵闹和老兵们的劝阻声在外屋响成一片，我整整衣服，从炕上跳下来，朝外屋走去。

十（魏大雄）

问了地里劳动的几个工人，我才弄清老辛的去向，便跟踪追击似的拐到去试验站的这条路上来了。

从刚才了解到的情况看，今天这场风波显然只是个引头。刘军用心是好的，他完全出于维护我的目的。但年轻人嘛，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直露，招致一些人的反感，而且时机也不合适，对启明和黎珍都刺激太大，太伤人心！你看老辛那副无地自容的样子,这回肯定对我意见更大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那种老是认为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固执劲，适当地遏制一下，倒也没有什么坏处。难道他不明白,这翻地也好,清渠也罢,不是我魏某人不想让土地轮休，也不是我说话不算，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这是去年的后遗症！是去年拉下的圪蛋！去年满打满算，把所有耕地都动员出来种了粮食，今年想退也退不下来，何况是这块农场主要拿粮的九号地呢！其实，老辛他也不是不清楚 去年四百万斤总产的‘ 军令状 ’立在那里,就是倾家荡产也得完成！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能怪我吗？去年参加地区农业四干会前，我特地召开一次管委会，对农场增产指标进行分析。是辛启明他慷慨激昂地提出来，我也同意，在原来基础上增产五十万斤，争取拿下总产二百五十万斤。但哪想到，到了四干会上，我们那二百五十万却打不住秤啊！

四干会开得欢欣鼓舞。那些面孔粗粝，深深的皱纹里，一

年四季夹带着黄土沙尘的农村基层干部，那些地地道道的老庄稼汉的发言是感人至深的。这些年来，他们眼看着自己县里、社里、大队的地里打不下粮来，农机、化肥、电力供不应求，有的生产队公共积累消耗罄尽，在银行借方名下倒挂几万元钱；农民口粮不足，每年吃国家返销，以农立国的中华古国面临着农业危机，作为党和人民派来搞农业的共产党员们，都感到揪心的难过和惭愧。现在好了，打倒了“四人帮”，有中央撑腰，可以理直气壮地抓农业了，谁不想把这几年耽误的时间尽快夺回来！

会议开到最后两天，上级向与会代表要具体指标和措施。新上任的张书记忽然找我个别谈话。

“小魏，看来我不得不给你这个战将加点苛捐杂税了。”

我规规矩矩地坐在他面前，心里早就有所准备，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我也象所有老于此道的干部一样，并不急急忙忙把能办到的允诺奉献出去，而是故意哭丧着脸，先摆出一大堆困难。这是讨价还价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不行啊，张书记！不是我们保守，实在是困难成堆、成山啊。”我扳着手指头，现想现说：“化肥不足，每亩小麦地还不够二十斤，——这是一；第二，给水时间保证不了，去年我们夏田头水就没淌上；第三，农机具零件残缺不全，供应部门动不动就要你一车‘华莱士’甜瓜，叫人受不了！第四，知识青年中思想动荡，不安心农业，指挥失灵……”

按到第四根指头时，我偷眼望望张书记。他眉心紧皱，眼里流露出不满和失望的神色。我马上打住话头：

“不过，虽说有这些困难，但我们还想再拚一家伙，不能辜

负了领导上对‘东风’的期望。”

“说了半天,就这句话还有点听头。”

接着,我表示开了决心,他摆摆手,打断我：

“行了行了。这些你可以留着上大会讲去。你给我个底，今年准备拿多少粮食？”

我默了默神，吸了口气，伸出一只拳头放到张书记面前，然后象光芒四射一样，把五根粗大的手指忽地放开。

“这个!”

张书记眼里闪射出兴奋的光芒：

“五——?”

“五十万！去年二百万，今年拿它个二百五十万！”

张书记眼里的火花倏忽即逝，熄灭了，厚厚的脊背向沙发靠了下去。

“小魏，你在跟我这个老头子唱‘三岔口’吧?这你可找错对象啦！”

“我怎么敢呢?”

他喷出口烟，用一种掌握全部底细的目光望着我：“我问你,小伙子,你到农场几年啦?”

“两年,今年是第三年。”

“第一年,你打了多少粮?”

“九十五万。”

“你去以前呢?”

“五十万。”

“就是说,总产翻了一番?”

“是这样。”我想了想,又赶紧补充说“能够翻番的原因不

过是因为原来农场有些混乱，生产破坏太厉害，我稍微抓了一下整顿,效果就出来了,并非我个人有什么能耐。”

“谦虚固然是种美德，但并非任何时候都受人欢迎。那么，去年呢？”

“号称二百,实际一百九十万。”

“不管是号称还是实际，又翻一番是事实。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化肥呀！您知道我们每亩地上了多少化肥？那些兔子不拉屎的沙窝地，全靠化肥垫起来，除了上级按规定拨给的以外，老场长去世时给我们留下一仓库化肥，统统用上了。有人说，去年粮食全是拿化肥换来的！”

“我不管你们拿什么换粮食。翻番不假吧，你们潜力大得很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我不知道在他那无动于衷的神情里，酝酿着什么苛刻的要求。我可有点慌神了。

“这样吧，张书记。”我仍然伸出那五根放射状的手指头“增产五成,我们今年增产一百万,总数三百万!”这简直象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一样，不过我已经顾不得了。“对我来说，这就得累趴蛋。三百万拿下来，你就送我进疗养院吧。”

“我还送你进太平间呢!”张书记举起白白胖胖的大手,在空中挥了一下，提高嗓门说：“前年总产翻一番，这是事实吧；去年又翻番，这也是事实。怎么今年专区下了大决心，粉碎‘四人帮’,农业大干快上,要打几个大响炮,闹几个亩产上‘纲要,的‘大寨县’,要大见成效,你的成效倒往下掉了?小魏呀,你不要跟我调皮,拿实的吧!”

我这才算摸到他的底,他是要我亩产上“纲要”,总产四百万斤呀！我的妈！粮食这玩意是呵一口气就能呵出来，还是放个屁就能放出来？说翻番就翻番？谁敢应承！这下我可真的扯开了皮，反复向他说明，在我们农场目前土地和各方面条件限制下，这个目标是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的。

“小魏啊,地委寄希望于你们啦。‘东风’是我们重点拿粮农场，希望你们在会上站出来带个头，给大家背上拍一巴掌。你们不说话，别人不好办，十天会议等于白开！‘普及大寨县,喊了几年,手里还没个‘大寨县’或者相当于‘大寨县,的先进单位,这就不好向人民交代罗!”

我出了一身汗。就象二十年前和邱良才那番谈话一样，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了：我又面临着命运之路上的关键时刻。目前，张书记作为新上任抓农业的领导，手里迫切地需要有几个叫得响的学大寨、迈大步的典型。如果助他一臂之力，这在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肯定会带来举足轻重的好处。从这点出发，我恨不得一口气把“东风”变成这样的典型。但客观条件不允许。长远的利益和眼前的困难在我心里激战，感到棉衣里面，整个前胸后背都湿了。张书记见我默不作声，又开导说：

“当然啦，带头有带头的困难，但这不要紧，有领导撑腰嘛！”

就这样，我们交换了条件，他给了我许多保证：农机、水利、化肥等方面的优先条件,还有,四百万斤拿出来以后,让我换个地方“松快几年”。就这样,我咬咬牙,心一横,答应带这个头,亩产过“纲要”,一年建成大寨式农场,在大会上立了“军

令状”。

没想到就是这纸“军令状”，带来了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惹得辛启明处处挑我的错儿。难道他这是冲我一个人来的吗？显然不是。他是对地委、对张书记有意见嘛！

迎面蓦地响起一阵急促的车铃声。我刚要抬头，一辆自行车已经冲到跟前来了，我慌忙往路边一跳，谁知那车子也跟着朝这边躲让，我又赶紧退回来，就这工夫，“咣啷”一声，一个纸包从车上摔出来，接着，连车带人一起撞在我身上。

农场小卖部女售货员玉玲，满脸通红地从地上扶起车来，气喘吁吁地喃喃说：

“对不起，魏场长，真对不起！”

“你这骑车也够水平罗，这么宽路，还能把人撞着。”

玉玲抱歉地笑笑：“没撞坏您吧？”

“撞坏？别说是自行车，小吉普还得用点力气才行呢。”

玉玲笑起来，从地上捡起纸包，轻轻掸着上面的尘土。

“其实，”她腼腆地解释说：“我打老远就响铃了，可您象在考虑什么问题，一点也没听见。场长，您这是去哪儿？”

“上试验站找辛站长。”

一听说我找辛启明去，玉玲脸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晕。这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年轻女人，三年前和丈夫离了婚，搬回娘家来落户。给她介绍了多少起对象，她都不吐口，农场的人都知道她在等谁。有人看见她到老辛宿舍去，悄悄地抱走衣服，为他洗涤、缝补，有时还替他收拾屋子，默默地表示着专一不贰的痴情。但启明对这一切并未加以注意。玉玲妈为这事已经跟女儿生过几场气了，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她对辛启明

的一往情深。现在她听我说要去找老辛，忽然张了张嘴，象是有话要说但又说不出口似的。

“有事吗？”我问。

玉玲想了想，挺不好意思地递过来那个纸包。

“请场长把这捎给辛站长吧。我忙着上班，送不了啦。”

“这是什么？”

“我自己编的两个小柳条盘儿，老辛说是实验时盛样上要用。”

当我拿着纸包着的这两个柳条盘儿兴冲冲地来到试验站时，出乎意料，屋里屋外纷纷扰扰，拥着一帮农场家属，把老辛团团围在中间。领头的玉玲妈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几个试验站老兵在一旁劝说着。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老太太为女儿事情领着一帮‘娘子军’打上门来找启明‘说清楚’。听了一阵才明白是为了奖金的事。

“老辛，”玉玲妈拍手打掌地说，“亲戚有厚薄，朋友有远近，都是十多年老军垦了，你还能从这些人碗里把肉叼走？”

辛启明鼻孔里塞着棉花，脸色苍白，不住地点着头，正想解释什么，这边又一个模样精明的大婶叫起来：

“说的是呀，人不亲土还亲呢！”

话音没落，那边一个年轻的大嫂用胳臂肘推开众人，挤到老辛跟前，理直气壮地朝他嚷嚷：

“哼，这事到哪儿也说在理上。如今不是说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嘛，去年为了誓夺总产四百万，拧得咱们每天奶孩子都脚不着地地跑步回家。姊妹们，照我说呀，那点奖金还顶不了咱们这份辛苦！”

“就是哇！”

几个声音一齐喊起来。没等这边话音停落，背后又有几个家属在哭声哭气地大声央求：

“老辛呀，你没家小，不知道咱们过日子的艰难！有这几元没这几元可不一样啦！”

“唉,咱家还指望这笔奖金顶饥荒哩。”

“辛站长，你就别折腾啦！”

辛启明就这样被这群吵吵嚷嚷的家属们包围着，瘦削苍白的脸，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两支胳膊象风车翅膀一样地舞动着，示意大会静息下来。

看到他那副焦头烂额的狼狈模样，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丝怜悯同情，但转念一想，觉得这是对他固执己见的一种应得惩罚！他不是高唱什么对人民负责，要揭露帮产田问题嘛。现在怎样呢，农场绝大多数人都不买他账。这回，他该清醒一点了吧？生活里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罗，想法归想法，行动可不能那么感情用事。等女将们把意图陈说得差不多时，我站出去替辛启明解围，告诉她们奖金没问题,定了,地委领导同意的,跑不了 辛站长一定会很好考虑群众利益；我们眼下有点紧急事情需要商量等等。很快把这帮咿哇乱叫的娘们打发走了。试验站那几个老兵似乎意识到什么，一个个也都知趣地回避开去。

当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老辛两人时，不知为什么，气氛反倒比刚才紧张。启明侧转脸望着窗外，气哄哄地坐在椅子上。我把玉玲那个纸包交给他，他打开来看，是两只小巧玲珑的柳条小盘，编工精致，色泽白净，样式朴素美观。老辛拿在手里翻

来复去地察看着，一句话也不说。

“老同学。”默默地来回踱了一阵后，我开口说：“玉玲的事不能老泡着，得给人家个回话啦！”

辛启明脸涨得通红，惊讶地扭头望着我。

“我看你是过于谨小慎微了。这对工作有用，搞对象可不中用……”

他还是一声不吭，望着我的眼光里，已经露出恼怒的神色。

“要不要我替你……”

“啪”地一声，启明把纸包往桌上一扔，站起身来：

“这时候你来找我，是为了说这些吗？”

“好好好，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我挥挥手，“咱们谈正经的。”

我点起枝烟，吸了一口。

“启明，还在生刘军的气？”

他又是刚才那副样子，一声不吭地看着柳条小盘想心事。

“唉，刘军打人，这无疑是错的，刚才我当着黎珍的面也说了，一定要严肃处理！”

提到黎珍的名字，他象被刺着了一样，猛一震颤，扭过身，把脊背对着我。我假装没注意，接着往下说：

“当然，我也有责任，派机耕队翻地，没有事先跟你打招呼。不过，你也该理解老同学的苦衷！”

他还是不说话。

“再说，刚才你也领教了吧，还得为那些大婶大嫂们过日子想想。唉，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好心不一定就能办出

好事来。这方面的教训，你也总该吸取点了吧？”

“老魏,你回答我个问题,”辛启明突然回过头来,打断我说，“我们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不要讲真话？”

“你说具体的。”

“具体的就是我们这个农场。”

“农场怎么啦？”

“这个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是否真的先进？请你回答！”

他目光灼灼地盯视着我，那眼睛象炭火一般发着光。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冲，我真想发作，但还是拚命按捺住自己的火气。

“为什么要使用这样耸人听闻的字眼呢？”我竭力做出一副笑脸来，“现在许多问题不在于口号和概念本身。实事求是讲真话，这我赞成，你我之间没有分歧。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和运用。就拿去年我们的工作来说，四百万斤，这不假吧？为了防止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说闲话，我特地请求张书记从地委派车队，直接从场里往国家粮库装运。人人看清楚，这可没掺半点假！从农场来说，这是最大的实际。闭眼不看这一点，就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至于其它一切，多用了点籽种、化肥，成本核算突破指标,这都是领导首肯的,有言在先的!”

“这些可以先不讲，就说你那四百万，这究竟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嘛,很遗憾,只好请张书记本人来回答了。”

“可这意味着什么你清楚!”他从椅子上“噌”地一下站起来，“作为农学院的毕业生，你完全能预见到这四百万斤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四百万斤的代价太大、太昂贵了!”

“你就是死心眼,要算政治账,懂不懂?”

这一说，他更急躁了：

“我不懂,我不懂!经济上损失了,就说算政治账,我不懂经济和政治怎么会是对立关系！再说，弄虚作假，破坏党的威信，究竟这笔政治账该怎么算？”

“你别冲我嚷嚷，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我们一个地方。我去参观过昔阳县，那里介绍的每一条经验，我看也并不都是实打实不掺假的，可是带动了全国，全盘！能说贡献不大吗?”

这一说，他可再也没有从椅子上跳起来了。象个泄气的皮球似的，他颓然地坐在那里，低垂着头，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那张随手扔在桌上包小盘的破纸。

“唉,”我长叹一声“!何必那么自苦,有些事我劝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对上面负责任的是我，又不是你！至于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这是咱们家里的事，随时可以通过谈心解决。你要知道，这次黎珍来，如果确定我们为商品粮基地，那就万事大吉；要是由于我们的纰漏，把事情搅乱了，那叫张书记脸面往哪儿搁，你我受得了吗？今后在他手下怎么工作？何必自找没趣！”

辛启明慢慢抬起头来，出乎意料，他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兴奋，仿佛有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

“有啦,老魏,有办法啦!”

他一把抓起桌上那张已经撕去一角的破报纸，塞进兜里，急急忙忙奔出试验站去。

“喂!你去哪儿?”

“ 找玉玲,有事 !”

辛启明响亮的声音，从旷野上远远传来，我给弄得莫名其妙。

十一（黎珍）

越野吉普傍着一座高大的新月形沙丘，优美地拐了个弯，不一会儿，前面出现几排白色的房屋。挺拔的新疆银白杨，从院墙后面高高地矗立出来，枝丫刚刚修剪过，就象是人刚理过发一般，看去显得格外年轻而有精神。

“妈,我们到啦!”

小军提起旅行包，旋开车门，带头跳下车去。我象个梦游症患者，迈着蹒跚的步履，跟他朝最后一幢房屋走去。刚到门口，蓝色塑料带的门帘闪了一下，从里面迎出来个穿白工作服的女服务员。很显然，这里的一切老魏都已安排好了。她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套室里，倒上洗脸水，又把我小小的旅行兜，放进空荡荡的大立柜里，把一切都安顿下来后，便招呼小军去营业室办理住宿手续。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觉得自己的心痛楚得几乎要胀裂开来，便一头趴在被垛上，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来。刚才的事真象一场恶梦！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会在这里又见到启明；更叫人意想不到的是，一见面竟发生这种揪心可怕的事，那是我的儿子呀！当着我的面，揪他的衣领，把他殴打得鼻血直流，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来这里还没开始工作，便卷入这做梦也想不到的纠葛中去，叫我怎么向启明解释？

小军吹着口哨兴冲冲地回来了，见我脸色苍白，坐在床上发呆,立刻便停住了：

“妈，您怎么啦？还在生我气吗？”

我摇摇头。

“那您怎么不高兴，不说话？”

“唉，我心里乱得很，叫我说什么呢？”

“怎么说什么？!妈,刚才这一路上,您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您连来这里干什么都还没告诉我呢！爸爸平反昭雪的会开过好多日子了，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没有？您在北京跑得怎么样？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呢？”

是呵，我这次来不也是为了我的小军吗？这些年来，子磐蒙冤，孩子受了株连。现在，政策落实了，应该把这好消息及时告诉孩子，让他这颗受过伤害的心灵也早些得到抚慰。我把这次来伊赫沙漠的目的简单地说了一遍。

小军一听说我是办理他的调转手续来的，高兴得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忘情地摇着。

“妈妈,这是真的吗？你没骗我？”

“傻孩子！”

他拉着我的手，嘻嘻哈哈，在房里旋转起来：

“哦！妈妈，我太高兴了，太愉快啦，太幸福啦！你知道吗，我想北京都想疯了！我恨不得明天就离开这个沙窝子，今后，就永远跟您在一起……”

直到这时，我才好好看了看儿子，发现他个子更高，肩膀更宽了。他长得快极了，简直象格林童话里汉斯的那棵豆荚树一样。满是油渍的工作服上散发出刺鼻的机油味，可那张

面孔却处处漾溢着少年人活泼的生机。他还是个小孩子！

“哦,小军,”我一边说一边理着他那散乱浓黑的头发,“你象现在这个样子多好啊！”

“是吗？”

“可刚才,你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呀!你那样子,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我不知道为了刚才那事让您这么伤心，我心里很难过。原谅我吧，为了您，我去向辛启明做检讨还不行吗？”

“不是为了我。你不了解，辛站长是个很好的人，他受过许多委屈，难道你还忍心再伤害他吗？”

“其实在我们这儿，争吵起来推推搡搡是常事。不瞒您说，去年这时，我跟魏头还打过一架。”

“你怎么跟谁都打架!”

“魏头打起架来真带劲,力气足,不要命,凶得象个鬼。不过他打完了就没事，反而跟我们称兄道弟。不打不相识嘛！”

小军比比划划，眉飞色舞地说着，笑着。过了一阵，老魏回来了。他一进门，便一迭连声地嚷嚷：“抱歉抱歉，你们都饿了吧？”他看看我,象是明白我的心思,赶紧解释说:“没事了。这里头有点误会。刚才那块地，启明以为是留给他的试验田，他计划种草，不让马上翻开。其实，我另外给他拨了一块。这事说开就没事了。”转过脸，对着小军挥挥拳头，我看出他是虚张声势。

“你就捡老实的较个儿？有话不会好好说？你得给我向辛站长做检讨去！”

“遵命!”小军立正行了个军礼,看得出来,孩子在他面前

是很随便很调皮的。

我轻轻叹了口气：

“老魏,你把他惯坏了。”

“哪能呢，这孩子在这儿也吃了不少苦。要早知道是你的公子，我还真该好好照顾照顾他。好，现在想补救也来不及了,要走啦!”他声音里透着一种深为惋惜的情调。

我不由得涌起一阵感激之情：到底是老同学，过去在学校里彼此间不觉得特殊，如今到了工作岗位，关系确实不同常人。

老魏不愿意显得感伤，便紧忙着张罗，看看暖瓶里有没有水,茶叶筒里是什么茶,然后就催促我：

“走,上食堂,吃饭,吃饭!”

开饭时间早过了，我告诉他，我还有好些路上没吃完的面包、饼干什么的,够我们三个人吃了,才来第一顿饭,别给炊事员添麻烦。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伙房在服务态度上还是可以的。我早上就招呼他们预备了，来客接待工作没有完毕，他们不会离开的。走吧,别叫他们等得太久了。”

“伙房”的排场吓了我一跳,一看就明白,这是个很特殊的“小灶”。当我在铺着白色厚塑料布的餐桌旁坐下来等待用餐时，穿着白工作服的食堂服务员，就按照高档餐厅的要求送上茶巾，进行铺台摆位。我惊讶得闭不拢嘴，这哪象在沙漠包围中的“僻壤”啊！老魏望着我惊愕的样子，开心地大笑起来：

“你现在是这里的贵宾罗,所以你最好都习惯下来。”他一边说,一边挥挥那只象铁铲似的大手“:这个食堂,要是能向客

人夸耀一点的话，就是那位掌勺师傅。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来的。人家原来是天津的名厨师，准备过国宴，五七年打了个右派，发配到塞外来了。我给他的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老头这才肯屈尊上我这儿来干几年，说好了带出徒弟就走。”

“你这儿用这么高级的厨师干什么？”

“客人多啊！别看地方不起眼，来的客人哪个级别都有，以后多半还要来外宾呢！”他又津津乐道地说下去：“这位老师傅的拿手是广菜。想不到吧，在伊赫沙漠里你能尝到典型的南方风味！他对炒、焗、烩、烘、炸、煎、油浸、清蒸……样样精通；不过在用料上，只能将就些，用我们现有材料来做罗。做出来倒也同样富有广菜特点：生脆清淡，爽滑鲜嫩，一会儿你实践以后就有体会了。”

听他谈了这一通“吃经”，我更惊讶了：

“想不到我们的老班长，当年最欣赏红烧猪蹄的‘普罗’饭店主顾，现在成了美食家了。”

“没有办法嘛，”老魏脸上是一副做作的悲怆，“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四面八方的知识都得有。要不然，象现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就只好大眼瞪着小眼，默默地等待吃饭了。”

挂在厨房门上的那幅白布幔后面，响起一阵急促而欢快的勺子拍打声，大概饭菜就绪了。老魏站起身来，打算走开。

我一把拉住了他：“不行不行，你怎么能走，再说开饭时间早过了。”

“不行呀！”老魏富有表情地把铁锹似的大手两下一摊：“农场有制度，本场职工不能在这里就餐，今天小军例外，在这里陪你妈吃饭，你可要好好代替我招待哟”

我竭力挽留他,他坚辞不肯,说“:领导可不能带头违反制度，我去前面大食堂，自己的农场，还能不给点吃的？”他见服务员已经端上菜来了，便强行把我按到座位上，一再叮咛：“要吃好，吃饱！吃完了好好睡个午觉，下午我们再谈。”

我和小军留下吃饭了，心里总感到不安。菜肴数量不多，但老魏确实没有吹牛，做得极其精美，而且富有特点：一盘鲜奶炒鸡，一盘碧绿青鱼片，一只蘑菇虾仁汤。我不善烹饪，也不知道广菜特点是什么，可是吃在口里，确实鲜美清淡，生脆爽口。尤其那只青鱼片，我好半天舍不得伸筷子，这哪是一盘供人食用的菜肴，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吃吧,妈!”小军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大筷大筷把菜夹进我的碗里“:放心吃好了,谁来都这样。不吃白不吃!”

“太特殊了吧?”

“特殊什么？别人来，吃得比您还要好，还要丰富！每次地委张书记来，光是名酒就要上四、五种呢。顿顿如此。”

我心里暗自盘算着，不由得有点打鼓了：

“小军，下午你跟魏场长说说，咱们不能这么搞。顿顿这样,伙食费我也吃不消。”

小军噗哧一声喷出饭来,忍不住哈哈大笑：

“伙食费？六角钱您还掏不起吗？”

“什么?每顿六角!”

“每天六角！放心，一分钱也不会找您多要！”

“那怎么行？六角还不够这里一只菜的钱。”

“那您就别管啦。”

“小军!”我看着他那满无所谓、大口吃菜的样子,心里很

不是滋味。“他们怎么才收六角钱？这是一个干部出差每天的住勤补助。我们平时在机关呆着也得花吃饭的钱呀！现在倒好，吃得比在家不知好多少倍，自己却一个子儿也不用掏，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又不是您一个人这样。”小军放下筷子，用手背抹了抹嘴，从牙签筒里拔出根牙签来慢慢剔着。“您还是五十年代人的想法，”他说着，身子往后仰去，把椅子前腿翘起来摇晃着，完全是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妈，您别忘了，如今是七十年代末快八十年代啦！”

“七十年代末又怎么样？难道你不认为揩国家油总是不好的？”

“有意见您跟魏头说去，”小军不高兴了，“魏头可不象您，他比您灵活多了。”

下午，老魏来同我商量日程安排，还带来了一堆书面材料，是有关农场各方面的情况总结，让我抽空儿先看着。至于日程，他说：“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头两天安排得紧凑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剩下来的几天就松快些，给小军办离场手续，怎么样？”

“一切就听你的啦。”

商量完工作，我把吃饭问题提出来。老魏听后，果然象小军说的，大不以为然。

“嘿，这有什么呢，”他两手交叉在胸前，仰起头来哈哈一笑：“我们沙漠地区条件差，上级领导部门同志辛辛苦苦地来一趟，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很不容易啦，我们谢都谢不过来。生活上力所能及地照顾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可这样的照顾法,群众会有意见。”

“黎珍啊，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说，你们部里同志高高在上,有点不了解下情啦!”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有板有眼地说“:现在的群众,看问题比我们透彻,漂亮的宣言对他们再也没有吸引力了，他们感兴趣的是真实的好处。前年，我刚搞起这个小灶来时，恰好来了个水利调查组。下面的人叽叽咕咕，骂我们拍马屁，献殷勤，搞铺张浪费，甚至还有人身攻击……说什么的没有啊！谁想，这几位客人回去后，马上给农场拨下笔水利投资费来，我们用这钱修了条渠，水浇地一下子增加几千亩，多打粮食几十万斤，每个职工增加了奖金。这下大家算过账来了：我们在吃喝上对客人照顾一阵子，他们回去后，工作上稍微支持一下，就够我们吃喝一辈子啦！”

对他念的这本经，我确实没有一点常识。看来，我们这些人是有点脱离现实了。

“你们一年到头接待多少客人,这该贴多少钱呀!”

“嗨，农场哪来这么些钱？”老魏突然压低声音俯过身来，脸上显出一种知近亲昵的神情，“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叫‘以客养客’。”

“什么‘以客养客’?”

“这是我们搞经济的专家起的名儿，我们考虑到干部出差,伙食费不能报销,就少收点,住宿费实报实销,就略微提高点,把多收的钱贴补在伙食上。”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他们做的手脚原来是这样！农场确实不需要花一个子儿的招待费，出差干部也不必多掏一个子儿的伙食费，两家都满意，而多用掉的钱则名正言顺地转到国

家的开支账上了。难道这就是小军说的七十年代人的灵活性吗？我顿时觉得自己象是被人骗了，稀里糊涂做了件不光彩的事情，又突然被人戳穿一样，心里感到十分窘迫，很不是滋味。

看我缄口无言，老魏象是已经猜到我在想些什么，便以攻为守似的继续说下去："当然罗，也有人对我们这样搞不以为然，可他们哪里明白下面的难处。我们每天都在矛盾中应付矛盾！上面来的人那么多，从党的领导到皮肤病研究讨论会，都要叫我们接待，'人怕出名猪怕壮'吆,稍一怠慢,下次工作上就给制造麻烦。你总该理解，我们多么需要在各种各样上级机关中有我们自己的人啊！可是有的人，唉，就是这么诚惶诚恐地招待他们，还是昧着良心把我们耍了。在酒饭桌上胡吹乱拉，要在我们亚茨海上架桥啦，发展养鱼事业啦，给你们拨二十万交通费啦，给你们两辆解放牌啦，……回去后呢，一个钢镚儿都不见拿下来，让你干瞪眼！"

也许，老魏说的全是事实，基层工作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难处。但"东风"并不是个揭不开锅、靠别人恩赐过日子的穷农场。它是全地区"学大寨先进单位"。地委张书记介绍时嘴边老挂着魏大雄名字。然而就是这个被领导视为农垦系统中"抓纲治场有成效"的战将，却对这套不大光明正大的处世哲学，甚至对一顿客饭的来历、价值和就餐者应有的信誉以及道德观念，讲得如此透彻和淋漓尽致，而且带着某种兴味，这总叫人不大好理解！

"好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吧？"他笑嘻嘻地问。

我鼓了鼓勇气,尽量不使他难堪地说："老魏,我想自己还

是到大食堂去吃饭,和大家一起,能多了解些情况。”

老魏不高兴了。可他尽量克制住自己，故作轻松地说：“如果你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比如，想进行一些我不便参与的访问，那么……”

小军急忙插进来：

“妈！场长都给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现在有谁象您那么认真！”

“你看,连小军都提抗议了。”

在小军面前，我不好再和老魏多说什么。

“那好吧,往后吃得尽量简单点,这行吗？”

“行,哪还有什么不行？”说完,老魏转过脸去,高兴地拍拍小军肩膀“看来,还是你比我有权威！”

老魏准备起身告辞了，我忽然想起应该去看看启明，便问：

“启明家在哪里,我想看看他去。”

“对对对！”他连忙接过话头“一会儿小军不是要向他赔礼道歉去，你们娘俩正好一块儿。不过黎珍，你也应该上寒舍看看去,都是老同学,应该一碗水端平呀！”

“你不说我也要去拜访的。但为了上午小军的态度，我得先上启明家,对吗？”

“可惜他到现在还没个家。”

“什么？他还没有结婚？！”

“是呀。”

“他是疯子！谁能看上他呀。”小军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的心又象叫扎了一刀，全身都发凉了。大概看到我脸

上表情有点不对头，老魏连忙解释说：

“那是运动中受了点刺激，现在已经好了，过去了。听人反映，启明好象正跟农场小卖部一个女的搞对象。刚才我来时,他还有事找她去了呢。”

老魏说完就走了，我送他到门口，小军却跟着他一直走出屋去。

这又是没有想到的事！启明曾经神经失常？照这么说来,过去‘史无前例’的十年中,他经受的迫害肯定也是‘史无前例’的。要不然,象他那样性格坚强的人,决不会发疯的。可怜的人，自我认识他来，苦难和不幸就象影子一般不曾离开过他……

我一定这样目无所视地想了很久，因为我忽然听见小军在说话。

“看您,魏头安排得好好的,非要到大食堂吃饭!”

我不解地问“:那又怎么啦?”

“魏头对您有意见啦,说好象有点信不过他。”

“我不明白，跟农场职工一起吃饭有什么不好？”

“妈,我说您别这么看不开好不好?”小军不耐烦地说“:来这里的大小干部，我也见得多了，哪一个不是往招待所一住，在贵宾食堂用餐，一天到晚呆在屋里聊大天！要不，就出去玩个痛快,沙窝子里围猎沙狐、野兔,亚茨海上钓金翅鲤鱼,摆鱼宴,名堂多着呢!报表、数字、情况,还不都是魏头给弄的便便宜宜，到走时只消往公文兜里一放就妥，哪象您这样认真!……妈,何必呢?”

“小军,”我把儿子拉到身边坐下,十分严肃地说“:刚才我

就想说,对工作,不论大小,都要认认真真地去做。”

“反正过两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别的事，您管得了吗？”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小军迟疑了一会，摇摇头：

“没有,我只是一般地说说。现在的人嘛,都得讲求一点实际。我们的实际就是我要调回北京，这儿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我们还有事求着魏头，您说对不？所以您最好顺着他点，有些事您就装作没看见、没听见得了。”

我大为震惊，这是我的儿子吗？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在我心目中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套标准实用主义的话来。

“你这一套从哪儿学来的？”

“用得着学吗？这是生活告诉我的。周围多少人都在这么干！”

“只顾眼前,只顾自己？”我不由提高了声调。

“不顾自己行吗？时代不同了，妈妈，我们要是自己不顾自己,谁来顾你？”小军望着我,眼里闪出一种陌生的、复杂的神情,既有期待,又有悲伤,还带着一点冷酷：“不信您就试试，得罪了有求于他的人,准得倒霉！”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全身象浸在凉水里，脑子里乱纷纷的，只是隐隐感觉到这里好象有什么事儿似的。

十二（辛启明）

我带着柳编小盘找玉玲去。

想不到这最普通不过的、沙漠里不起眼的居民——毛乌柳嫩条，在她手下，竟然能如此柔美地挽成湖波海浪般的弯弯，编出繁星碎月似的花格，以及桃李争艳、蜂飞蝶舞的美丽图案。无知的草木，在能工巧匠手里，仿佛注入灵感一般，十分传神地表现出大自然的丰姿。我过去只听说玉玲有这手绝招，如今见了实物，才知道她手艺确实娴熟高超。这哪是普通的柳编，这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完全可以拿到广交会上展览。

是的，就是这小小柳编，激起我一种热望，一番雄心。刚才魏大雄在试验站里向我进行“劝导”时，我无意间发现那用来包裹柳盘的纸张，原来是外贸收购土特产的通告。收购栏目内恰巧写着“各式柳编”。我马上想到，我们伊赫沙漠里遍地都是搞这种编织的原料。要是能把玉玲从供销社动员出来当老师傅，在家属当中组织起柳编社，那么，全场职工的收入将会有所增加，这就可以弥补大家尚未到手的那几十元奖金的损失。揭发农场问题，扫除职工家属中的某些思想障碍，事情也许就会好办一些。

可是怎么去跟玉玲开口呢？我不由得放慢脚步，心里踌躇起来。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躲着玉玲。我自己也不明白

这究竟为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如此，免得跟她单独在一起时说出一些我所不愿听到的某种决定性的话来。

这种奇妙的感觉究竟怎么产生，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都说不清楚。大概是去年秋天，经过打枝处理的“绿纱”一号快要成熟，玉玲路过试验田，看见我正察看结籽情况的时候。

那天，我收到母校组织上来信，叫我去北京一趟，说是中央对五九年反右倾重新有了评价。照此说来，过去的问题算是有了平反改正的机会了。赴京前夕，我独自转到试验田来，再看一看“绿纱”一号籽粒成熟的情况。当我蹲在地上，把一颗颗结实饱满的籽粒摊放在掌心，凝神地望着它们在秋天阳光下闪烁着淡淡琥珀色的光彩时，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二十年了，这片和我朝夕相处的土地，渗透着我的心血和热汗,青春和爱情,忧伤和屈辱,信念和希冀的土地,如今总算结出这点小小的果实；然而在生活中，我却错过和失去了多少东西。对我个人来说，中央这个决定来得太迟太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实际意义，然而我心里毕竟还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党在倡导讲真话，在努力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这对我今天正在从事的改造沙漠的工作来说，对我们整个国家的任何事业来说，是太重要了！

一大滴热泪从面颊上滚落下来，滴进脚下的泥土里。我怎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真叫人不好意思。正在这时，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说“辛技术员,你怎么哭啦？”我连忙拭去眼泪,回头一看，见玉玲笑盈盈地站在地边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情景：她穿着件天蓝色的布衫，草帽脱下来拿在手里，一双沉静温柔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大食堂早已开过饭了，

怎么还在地里？辛技术员，我见你天天都这样，可得当心身体啊!’她说这话时,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亲切和热烈的光芒,使她那张难得有笑容的端庄、俊秀的脸上，霎时放出满脸光辉。

从那以后，她开始上我简陋的宿舍里来，默默地抱走我的衣裳，为我洗涤，替我缝补，有时家里做了好吃的还拿些来送我。农场的人为此议论纷纷。我几次谢绝她的帮助，但全然无用，她仿佛丝毫没有察觉似的，还象过去一样上宿舍来，神情淡淡的，既不特别亲热，也不故意疏远，而是固执地期待。偶而，望着我的那双沉静温柔的眼睛会突然燃烧一般地熠熠放光。每当这种时候，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快快借故走开。我暗暗告诫自己，说什么也得避免单独跟她在一起。要知道，我从心眼里不愿使这个温顺好心的女同志伤心。特别是前不久，在一次管委会上，我和老魏公开发生意见冲突后，玉玲象往常一样来宿舍收脏衣服，我怎么藏也没用，她全翻了出来。临出门时,她忽然喃喃地说“:哦,辛技术员,……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好…… ’我一下子屏住呼吸，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幸好，试验站两个老兵来串门，才避免出现尴尬局面。

现在为了农场的土地，为了眼前这场斗争，却不得不同玉玲单独地进行一次详谈，邀请她出来独当一面，传授手艺，把柳编社搞起来。

对玉玲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牺牲。供销社营业员的职位，在农场中属于“美缺”。物质生活的贫乏，使得人们对接近物质的人很是羡慕。因为有什么短缺商品或是削价处理的物资,他们是‘近水楼台”有些什么经济情报,他们也总优先受

惠。许多想捞点便宜的人自然千方百计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走到哪儿，人们总热情相待，看不到冷脸子，更不至于受气。对于一个孤身女人来讲，职务就是她的凭靠。玉玲的这个凭靠应该说是很仗硬的。当然，如果我去求她，她多半会答应……但是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她作出这种牺牲？我又用什么去报答她的这种牺牲？

我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在场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得承认，因为黎珍！我至今无法把她遗忘！二十年来，虽然我们彼此音讯不通，连个下落都不知道，但在精神上，她却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一直藏在我的心底。今天上午在农场大田里，她象梦幻一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就象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整个混沌成一片。

刘军的事不能怪罪于她。当她瞥见自己的儿子在向我挥舞拳头时，眼睛里闪射出惊恐、愧疚，满含凄惶而又强自隐忍，我仿佛又看见了二十年前那个夜晚，在校园小路上等待着我的那个年轻姑娘，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柔情。有什么办法呢，我始终觉得一个人一辈子真正的恋爱只有一次。尽管我这爱情的小花是苍白的，苦涩的，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忠诚于它。因此，在我看来，对别的女子抱有任何非份的想法和过于接近的行动，都是对心中这纯洁爱情的一种玷污和亵渎。这样一想，我不由得往回走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过路的农场职工见我在十字街口来回蹀躞，都投来惊异的目光。我只好赶快离开，转身返回试验站。

闷头闷脑地干了一下午活，回到宿舍，晚上是我照例的读书时间。我摊开了几本饶有兴味的资料——是国外对土壤研

究的最新成果，一位在科学院工作的同行寄给我的。但我怎么也工作不下去，尽管我用了最大毅力控制住自己，眼前却一个字也反映不进我的视网膜里去。要知道，黎珍来了，她就住在这里，近在咫尺。我全身心，我的每一根神经，每一颗细胞都感觉到 她在这里,她在这里！

她当然是参加电影晚会去了，这是照例如此的。来了客人，就放一场电影招待，好叫职工也高兴。老魏一定寸步不离地缠着她，我无法和她单独见面。可单独见面又有什么意义？她是刘军的母亲！……传来嘈杂的笑语声，电影散场了。

然而，她那双眼睛老在我面前晃动。她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着我啊？象年轻时代一样，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时这双眼睛如歌如笑，而现在变成如怨如诉的了。她是怎样强颜欢笑，在我们整个参观的过程中，我相信，只要老魏不注意她，她的目光总是在寻找我，跟踪我孤苦伶仃的身影。她没变，她是不会变的！

我心里又充满了激情，想见到她，立刻见到她，避开那些监视的、戒备的、好奇的、刺探的眼睛，跟她面对面呆在一起，互相凝视。我是这样狂热，立刻关灯走出门去，跑到了招待所前面。……可是夜深人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一个房间，更不便打听，几次犹豫地举起手来，想试探地去叩打那些冷冰冰的玻璃窗，但又忍住了：万一里面不是她，我岂非又要给全场制造笑柄。离开，赶快离开！我的理智是昏乱的，我的行为是轻率的，不象饱经沧桑的中年人，简直象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

但我不能读书，不能入睡，连坐都坐不住。我在夜的荒原

上疾走,奔跑,月亮被云彩遮住,眼前昏蒙蒙的,没有房舍,没有声息，沙漠也在沉睡。辽阔的空间象一个无底的深渊，一只张开的大口，一片寂寥的虚无。这恰恰是多年来时常在我梦中出现的景象：在昏蒙蒙的天光下，我向虚无的深处跑去，既累人，又无望。我一直跑到褐色墓碑面前，把头靠在冰凉的墓石上。

哦,老文书,老首长,还是让我和你呆在一起吧,用你的冰凉来消除我的灼热吧。——一阵微风从天边吹来，田地四周的防风林立刻摇头摆脑，窃窃私语，传送给我一阵使人感到亲切和安慰的呢喃。解了冻的田地也立即放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泥土气息。哦，它们并没有入睡，我亲手种的树木，我开垦的土地，它们忠实地陪伴着我，和我在一起。

想起了眼前这块土地，白天魏大雄关于昔阳县的那几句话，又回响在耳边。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那些名闻国内外的先进单位成绩中掺了几分假，更可怕的是，在那么一部分干部的心目中，为了眼前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去撒谎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他们什么都不相信，却蒙蔽群众，叫群众去相信；他们把一切宣传看作欺骗，自己却随时都在作欺骗的宣传。

这简直象恶性肿瘤一样在破坏着社会主义的机体、毁坏着党！如果我们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我们借以自夸自慰的成绩大多数是假的或者掺着很多假，那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怎么能取信于民呢？

如果把谎言看作一种作物，那么什么是它生长的土壤？要彻底铲除它，又得怎样改良这片土壤？作为一个农业科学

工作者，我从事改良自然的土壤，搞了将近二十年，才在有限的面积上，刚刚弄出一点眉目；而要想改造社会的土壤，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化更大的力气，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现在党正在这样做。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我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做不了什么更多的事情，只能保证自己象一棵性能良好的绿肥作物，和不适宜的土壤环境作斗争，用自己根须部分分解出来的氮肥，给土壤提供养料，稍稍改良一点周围有限的生存空间。

春天泥土的清新气息从鼻管慢慢扩展到全身，驱散了先前充塞在我头脑中的乱纷纷的思绪。我忽然萌生起一个新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可以去看黎珍？在她走之前，象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另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作一次纯业务性的谈话？为什么我不能摆脱个人感情，跨越横在我和她之间的二十年往事，把她仅仅看作一个上级派来的人。尽管过去我作过类似的谈话，都没有取得应有效果；但黎珍不一样，她是内行，她会重视、会调查，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当然，保护土地，把农业生产开发建立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眼前怎么办？坚持土地休耕，今年农场职工的口粮如何保证？务农的人总不能向国家伸手要饭吃！我得找出可耕地来，完成今年最低限额的生产任务。作为一个农场技术员，我的责任不仅在于指出去年的错误，而且在于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还要学会保护和尊重群众的物质利益。前两年，我的意见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考虑不全面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

天边已透出微明的曙光，林带、道路、隆起的沙丘，都显出

浅浅的轮廓。我抖落身上尘土站起身来，径直去小卖部，留了个条儿，让玉玲中午上我宿舍来一趟。洗过脸吃了点东西，我便朝亚茨海方向走去。那边有一片我过去踏勘过的可以利用的土地。

还没等我开始吃简单的午饭，玉玲已经来了，她显然很兴奋，不知我要找她干什么，走进门来望着我，脸就红了。

我把宿舍里唯一的一张凳子端给她，请她坐下，自己坐在一张翻倒过来的木箱上。

“玉玲,你给我的柳编小盘老魏交给我了,谢谢你。”

她满脸红云“:你喜欢?”

“喜欢,非常喜欢!我就是为了这事找你。”

她期待地坐在那儿，手搁在膝上，静静地听完我的想法和打算。

“要是你同意，我就先拿这只柳盘到外贸去挂钩，商量妥了,咱们就干起来,我想场部一定会支持。”

玉玲显得非常失望，她沉默着，纤长的手指扯动着衣角，半天才说：

“就是这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我说“: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事担当起来,它会给我们农场，给职工们带来很大好处。当然，一开始你要吃点亏,特别是你妈那儿,还得好好做工作。”

“我妈管不了我,”她脸红得象要滴出血来“:她早就说,她再也不管我了。”

我尴尬地沉默着，不知该说些什么。玉玲的妈为什么不管她，原因我是知道的。正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胡大妈一见

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总是不依不饶。

我沉默着，玉玲忽然哭了。

这一下子搞得我惊惶失措，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给她倒了杯水。玉玲推开水杯，抽泣着说：

“这些时日，就是块石头也总该焐热了。……可你的心，怎么比石头还冷还硬？”

“玉玲,……真对不起你,”语言对我来说,忽然变得那么艰涩,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比你大了十几岁,象过了正午的日头，开始偏西了。你还年轻……”

她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话：“要找年轻的，我跟前头那个……就不用离婚了。”

我更狼狈了，玉玲这还是第一次这样直率、热诚地坦露自己的心。

“你大概不知道，我们一家是被沙子撵到这地方来的。以前我们在河西住，爹拉骆驼，记得小时候他常讲起海市蜃楼的故事,茫茫沙海,烈日当头,口渴难熬,走着走着,突然在前方出现一片湖水，水波闪闪，四周绿树环抱，……每次我听完故事，总要连着几天梦见它，盼望着有朝一日我们住的那片沙窝子里，真的能出现水草丰美的绿洲。可是绿洲没出现，村里的地一片接一片叫黄沙吃了，小土房让沙子埋了，同村人一户接一户搬走了。亲戚们劝我们去河套，爹不，听说这儿办军垦农场，改造沙漠，就往这里来落户。这几年，你们试验站改良土壤有了成绩，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为改造沙漠贡献力量!”

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激这纯真崇高的友情，但是

我不能对她说谎。

“你并不了解我，玉玲同志，你不了解我。我独身一人惯了。我……我不能再连累别人了……”

“干嘛这么说？‘四人帮’也粉碎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你总得有个家，老辛！看看你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冷馒头就糖白开，铁打的人也撑不住啊。该有个人给你洗，给你缝，安排好一天三顿饭，让你安心地工作、研究、试验……”她用热切、期待的眼光望着我。

我的心都快碎了。这样强烈的感情袭击，对我来说，是很生疏、很不习惯了。我象一个闯了大祸的小学生似的，不敢抬头看她。但我终于还是强迫自己正视她的眼睛，那一双充满了泪水和期待的眼睛，我得告诉她真情。

“玉玲，你真好，可是……请你听我说，和你说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我，我不愿伤你的心。可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有爱人。”

“你有爱人？！”她惊讶而慌乱地站了起来，“这么多年，她、她在哪儿？”

“在这儿。”我走过去打开床头小柜的门，在那里，年轻的黎珍站在一个小巧的镜框里朝外望，含笑的眼睛象在诉说又象在询问。玉玲拿起它，仔细地端详着。

“二十年前我遭到的厄运，使我们被迫分手。那不怪她，我至今还……还忘不了她。”

“我认出她来了……”玉玲捧着照片的手在颤抖，“她现在就在这儿，是吗？”

我点点头。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每一个新来者一天之内

都会被所有的人打量过、议论过，深入地研究过。

玉玲象遭了大难似的痴痴望着我，脸色刷白。

“她会……嫁你吗？”

“我压根没想过这事儿,二十年来,我们不通音信。”

“那你……”

“……玉玲,你是个好人,忘掉我吧。”

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出来，她也不去擦它。

“谢谢你告诉我真情,我会管住自己的。……’她嘴唇翕动着,仿佛用着很大的劲在说“至于工作,我相信你对,我答应你,什么时候开始都行!’说完她就夺门朝外跑去。

我一把拉住了她，紧紧握住她的手：

“玉玲,谢谢,谢谢你!”

大概因为我们非常挨近，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转过身，扑在我肩上哭起来。我说什么呢？只能抚着她的头发。这一刻，我觉得她多么象我的小妹妹，她是个多好的女人啊！

十三（魏大雄）

据办公室报告，座谈会已经准备就绪。其实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数：这一年多来，这些事情对我那帮子人早已变得驾轻就熟、毫不费事了。特别是那几个“笔杆子”，完全不用操心：他们善于按照需要，把农场里发生的事冠以各种名目，提高到原则高度上来。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一件事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任意地来回变换角度，用上一辈子，而且每变换一次便生出一层新的意义，前后效果迥然不同。就拿刘军转变那件事说，他们一会儿用以说明场部领导亲自抓后进的转化工作；一会儿用来说明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一会儿又用来说明领导敢于抓管理，加强纪律性，等等。听起来都头头是道、煞有介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安顿办公室代主任，要跟每个与会人员交代清楚：座谈会的目的是争取部里调查组提名“东风”农场为农垦系统的商品粮基地。所有发言都要围绕这个目的来进行。

比较难办的是老辛。那个人，你跟他打招呼是白搭，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僵，只好任他胡闹去。不过这次跟以往不同，他跟黎珍关系不一般。然而要不通知他是说不过去的。找个什么事情把他支开就好了。没想到，办公室主任来汇报说，辛启明到城里办事去了，真是天公作美，太巧了！

开会前，我提前去招待所请黎珍，她不在，服务员告诉我，

她已经先去会议室了。这倒让我感到意外。——在一切人和一切事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她竟连最细微的习惯都没有改变。记得在大学时，她就是一个最遵守纪律、最准时的女学生,无论上课、开会还是班级活动,她总提前到场,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边看书，一边等待。这个习惯，经过十多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刷，还顽强地保持到今天，倒让人小看她不得。不知怎的，我心里突然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要了解我这时候的心情，你得先了解我们那些科室干部才行。你得先弄清他们是怎样的一些人。

这是一些“神聊”能手，无奇不谈的人！这些年变幻不定的频繁的政治斗争，造就出人们一种奇特的本领，就是不着边际的神聊。如果谈任何正经的、有价值的事都有被歪曲上纲的危险,有卷入派性纠纷的危险,给自己带来麻烦 如果‘祸从口出”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敲打人们的中枢神经的话，那么大家走到一起的时候干什么呢？他们不是哑子，不是畸人，其中有些人非但不孤僻还非常活跃，非常合群，他们不说话就喉头发痒胸膈发胀，那么说什么呢？只好聊大天，海阔天空，飞云跑马，从鸡鸭饲养到孩子管教，从怪病偏方到烟酒糖茶，从妇产院到火葬场，真是无所不谈。不过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这种‘神聊’倒不失为一种养生之道,可以消愁破闷,使人暂时忘了身边的烦恼。人们对喝茶与清谈的爱好，表现出对国事的冷漠，但它同时也象一种痼疾，一种嗜癖一样，很难根除。“四人帮”粉碎了，人们的这种才能却又由于政治空气的民主与活跃而大大发展起来，它夹带着流言蜚语，助长着牢骚不满，一直在我们的干部中盛行。我也喜欢聊大天，而且因此

颇得下级好感，但深心里，有时也不免对这种风气感到忧惧。因为目前聊天的内容可真是五花八门：社会动态、海外珍闻、冤假错案、不正之风……不一而足。虽然人们“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对于顶头上司在公众场合还不敢妄加评头论足，但我不在的时候，天知道他们会说出些什么来！

我跑到会议室，果然有几个早来的人已经放开了嗓门，一阵阵哄笑不时爆发出来。这回是在聊着“试销品”的事儿。谁都知道,许多高档商品通过‘试销’的名义,几乎是无偿地馈赠给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我们这些中下层干部又气愤、又眼红，羡慕到了极点，已经不止一次地聊过这件事了。

还好，黎珍不在这儿。

于是，我立刻也插进去说：

“只有一种东西试销准保没人要。”

“什么东西？”大家兴致勃勃地问。

我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火葬场试烧,最先进设备,你们去不去？”

会议室里顿时爆发一阵哄堂大笑。大概是听见我的声音，黎珍从邻接会议室的小房间走了出来。我吓了一跳，原来她在里面！

“嗨！你这么早就来了,等了半天吧？”

“没有,我在里面看报纸。”

在座的有几位显出一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一个个收起了哄笑打诨的怪相，摆出端庄稳重的神色，等我替他们介绍。我朝黎珍望望，她也神情尴尬地望着我。

该死！这帮浑蛋一定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我真想把他

们一个个痛骂一顿，但脸上却竭力要漾出笑意来。

“啊，真想不到，”我对黎珍说，“还象大学时候一样，你做什么事都这样准时。”

“准时和认真是科学工作者的两大美德，这不是你在学校时常说的吗？”黎珍朝我谦逊地笑了笑，“怎么样，咱们书归正传吧？”

等大家落座后，我朝四周环顾一遍，故意大声地问老辛怎么没来。

“辛站长有事进城了，”办公室代主任连忙凑过来说，“今天一早我又特意去请了一趟，他不在。试验站另外来了个同志。”

我有意等了一会儿，见黎珍没有丝毫反应，便宣布开会。在我致了照例的欢迎词后，黎珍讲了讲来伊赫的目的和对座谈会的要求。她谈得很客气，对所见到的一切，肯定也很充分，态度诚挚而热情。看来，刚才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

发言开始了。按照事先布置，先是办公室代主任汇报农场总情况：土地面积——耕地面积、播种面积、林地面积。耕地面积中，又按土地潜力不同，分二、三、四级各若干；人员情况——总人数、男女人数、干部人数、整半劳力；农业装备——农用机械、运输机械、水利设施、技术力量；附属设施——小学、卫生所、供销社等等。这一套数字本来就够枯燥乏味，现在让代主任那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一念，再配合上他那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神态，听来更使人感到沉闷冗长，头脑发木。果然，没等他汇报完，有个分场头头便发出了均匀的、只有熟睡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深沉呼吸声。

接着，人事科代科长汇报，这可是一次更加猛烈的疲劳轰炸。那些从报纸上抄来的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的套话、串话，比数目字更空洞、浮泛，对黎珍来说，肯定味同嚼蜡。但它又不能省略和取消。好在这回主题扣得还紧，通篇汇报旨在说明，通过这两年工作实践，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一旦“东风”被确定为商品粮基地，人们的觉悟没问题。

再接着是生产科秦代科长，他的发言几乎是数目字和百分比的堆砌，而且统计之繁琐，使人无法记住，常常听了下半句就忘了上半句。打呼噜的声音现在增加到两个了，一个低沉，一个尖细，仿佛在表演睡眠二重唱。这些分场里来的同志，你真拿他没办法。他们喜欢干活，在生产第一线大叫大嚷，叱咤风云；一到开会，表现得很糟糕，经不起稍长一点发言的轰击，让人脸上挂不住。提醒他们一下吗？我看见全场已有半数的人昏昏欲睡，在那两个风匣子的伴奏下，连我的头也开始发沉了……

“请等一等，”忽然，黎珍清亮的嗓音打断了生产科长单调的嗡嗡声，昏昏沉沉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一个个竖起耳朵听起来。

“有个地方我没听清。来到农场后，我常听人们谈总产四百万，刚才生产科长同志谈的也是总产四百万。”

生产科秦代科长连忙点点头，表示首肯。

“可我在地委和管理局听到的，都只说亩产四百斤，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区别吗？”说完，她微笑的面庞朝我这边转过来。

我也微微一笑，但不作声：让下面的人去解答好了。果

然,被打断汇报的老秦立刻回答说“:这两个数字是一致的。我们种一万亩,总产四百万,亩产自然就四百斤罗。”

“哦，哦哦！”她似乎明白地点着头，但仍然客气地问道：“照这么说，亩产四百斤是个平均数？”

“对,是平均数。”

黎珍在笔记本上记下点什么。

“这就有个问题了。’她抬起头来说;“办公室主任同志一开始介绍，农场只有几百亩潜力二级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三级、四级。按照通常概念,这三、四级潜力的土地,平均亩产不可能达到四百斤。也许，这中间有些情况有出入？”

最后这句话，黎珍说得很婉转、很轻，几乎是用一种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说出来的，然而所有在座的人，都显出如雷贯耳的神情，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一齐照我这边看过来。我心里不由得楞怔了一下：莫非黎珍已经听到点什么？看来，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单纯轻信的女大学生了。别看她外表依旧那么温柔、文雅,甚至驯顺,骨子里却出人意料的精明,她没有被疲劳轰炸击溃，她甚至在前后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间的漏洞。

室内一片寂静，使人感到缺少了点什么，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一粗一细的两种鼾声也停止了。我明白，就连那两个种田汉子也清醒过来，在等我解答呢。

过了尴尬的两秒钟，仅仅两秒，我恢复了常态。

“情况不会有什么出入!’我大声说;“只是我们汇报得不清楚。是的，按照通常的科学概念，潜力三级的土地不可能亩产过‘纲要’,但是我们估计到这一点,事先采取了某些特殊措

施……”

“对对对!”老秦这时才接上话来。这个老实巴脚的人,多年来的政治斗争在他身上只培养起一种特长，开口多磕头，少得罪人,特别是对领导,只要有机会,就不遗余力进行吹捧。然而由于笨拙，他的吹捧常常帮倒忙。只是由于他肯吃苦，踏实，一时又没有其他合适人选，所以去年整顿班子时才没有把他拿下来。

“我们土地底子薄，要叫它提高产量，这怎么办？只好在化肥上做文章，下功夫。这一点要特别感谢我们地委领导张书记,由于他的关怀,从化肥厂到我们农场,一路开着绿灯,使我们能够大量地投放化肥……”

“老秦,讲实际措施吧。”我打断他说。

“对对！关于具体投放化肥的方案，可以说是辛代站长的一个创举！……”

“请等一等,您说的是谁?辛——代——”

我立刻醒悟过来：这位老兄又撂漏子了。

“哦——”我连忙接过话头,解释说“他说的就是老辛,辛启明呀！去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抓了一下班子整顿，叫老辛负责试验站工作。纯粹是因为忙，没等上级批，同志们都先代理着职务干起来了。你看，代主任、代科长、代分场长……。好在大家没计较，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说明同志们觉悟是很高的。不过据我所知，最近，有一批干部正式任命就要下来了……”

我看见在座的人紧张的面部表情开始松弛下来，露出兴奋热切的神色。黎珍仿佛对这个解释满意，她笑笑，又低头在

小本上记下点什么。秦代科长继续汇报。

“为了充分发挥肥效，辛代站长打破常规，提出每亩小麦上四十斤复合化肥作为底肥，头天下午用播种机播到地里，第二天上午再单另播种籽。”

“这很新鲜！”黎珍惊异地说“：不过，麦种挨上化肥，不会烧死吗？”

“是啊，一开始大家都接受不了，管委会上吵成一锅粥，播种任务布置不下去。全凭我们场长力挽狂澜，”秦代科长十分友善地望了我一眼“：他二话没说，礼贤下士，亲自坐车把辛代站长拉到各分场游说，向全体职工详详细细解释这个方案的好处。”

“有意思！”

“原来，在我们沙漠地区，昼夜气温差别大，经过一上午日光的烤晒，下午土层消得开，化肥播得也深。过了一夜，地又冻了，麦种播得就浅。这样，化肥在下，麦种在上，根本挨靠不上，到浇水的时候，土地里的肥效就全部发挥出来了。去年，就因为化肥施放得好，夏田捉了全苗，为全年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这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的增产措施！”

黎珍眼里显出赞赏的神色，这给了老秦勇气和希冀，他汇报的情绪更高涨了，会上气氛活跃起来，黎珍插话也多起来。她详细地逐项询问了增产措施，对每亩地化肥用量、籽种多少都不马虎，而且问题提得很内行，大家都得认真对待，无法糊弄她。

“不过，按照这个数量，”她说“：已经不是合理密植了。这

也是辛启明同志的试验吗？”

试验站来听会的那个“老兵”鼓了鼓腮帮子，好象想说什么,望望我,又不说了。

“这不是老辛的试验。”秦代科长说“跟别处比起来,我们种籽用量是大了一点。但这里是沙漠呀，春天种下以后，风刮沙埋,经常得补种,有的地块甚至得种三次。”

“这种情况占全部播种面积多少？”

秦代科长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我心里猛然提高了警觉,忙接上说：

“每年不等。前年不多，去年因为增加了任务，不得不把一些缺乏防风固沙保护设施的耕地也种上了。这说明我们治沙工作要及时跟上来。”

说到这里，我瞥了黎珍一眼，发现她刚才一直埋头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这时正抬起头来，朝我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又一次感到她的精明和严密，大大超出了我的估计。看来“文化革命”还是给每一个人带来了变化,也许正是“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把她从一个耽溺于幻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柔弱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精于计算、脚踏实地的、强悍的实际工作者了。

这时候，办公室代主任也插话了：

“籽种用量比别处大这是事实。所以咱们这里有‘春种秋收,一年白受’的说法。前几年,一般年成也就刚够收回籽种。”

黎珍赞许地点点头。

“从这一点说,”她说“东风农场的成绩确实是了不起的！把商品粮基地选择在沙漠里，这个设想的本身，我觉得就很有

英雄气概！”

会上发出了稀稀落落的笑声。我吩咐老秦说：

“黎珍同志刚才提到的具体比例数，回头落实一下，告诉黎珍同志。”接着，我又引导说：“农场还有很多缺点，也存在实际困难，这些方面我们也应向上级派来的专家汇报一下，大家接着谈，随便谈。”

黎珍听我称她为专家就红了脸，正想说什么，一直不作声的人事科代科长开腔了：

“我们这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员不稳定。特别是业务干部和技术工人流动量大，人心浮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事科代科长挺沉着地望着她，嘴角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很大一部分知识青年已经回去了，现在还在继续流走，他们当中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在这里学习了技术和专业特长，对我们来说，真是重大的损失。”

黎珍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也皱起了眉头，这位老兄阴阳怪气的，他要说什么？

“对广大干部来说，不安定的原因是一样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嘛，都是出于对子女前途的考虑。我们在沙窝子里，条件差，没有好学校，没有好教师，孩子们在升学考试中没有竞争能力，考不上初中，考不上高中，更考不上大学。所以大伙说，自己陷在沙窝子里不要紧，不能误了子女。”

一谈到子女问题，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管人事的这位代科长懂得大家的心理，他算找到了一个最强烈的共振点，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起来了，而刚才打瞌睡的那两位现

在来了精神，他们最起劲。

那个吸起气来尖声尖气的说：

“农场子弟小学原来有几个好老师，怎么也留不住，走了。待遇低,生活苦嘛!”

那个打出呼来粗声粗气的说：

“您问问魏场长，他的家为什么一直不搬到这里来，而是留在城里？也是为子女上学好嘛。可我们不能跟他比啊！”

对于这种混乱的局面，说实话，我是一点也不怕的，甚至还有点欣赏。因为他们当着客人对我作一点无伤大雅的批评，这只能说明我们这里有足够的民主气氛，对于我个人的威望无损而有益。

最后，子女问题的发难者，那位操着人事大权的人又把话头象扯风筝一样扯了回来。

“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基地问题能早日确定下来，这样能够振奋士气，同时，给我们多一点财务上的自由。我相信我们场长是不惜突破框框，高价重金聘请些好老师来工作，哪怕是临时兼课的。”

大家于是说了许多对确定基地的期望，要求黎珍大力支持，似乎基地不定下来，农场就要垮台。

除此以外，又提了很多困难、要求，机耕队希望进几台大功率的联合收割机；财务科要求放宽农场的亏损指标，因为事实证明，要沙漠拿粮食，国家是得多付一点代价；我也诉了一通苦，关于水利方面，我们受黄河管理局钳制太多，冬天不给拉油,夏天不给送瓜,他们简直就卡住脖子,不叫我们喝够。我要求在用水上多一些自主权……

整整一上午的座谈,大家又腻味、又兴奋,真是疲倦透了。听说有开会开死人的，我信！我这个农场场长 ,如果不是这么五大三粗,具有真正‘少壮派’的体魄,一定也会在这种会议的马拉松里发作起心脏病来一头栽倒的。可是我看黎珍一直在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既无倦意,也不走神,大家都糊涂了，可她还清醒着呢。最后，人们怕误了中午饭，都不说什么了,她才开口,仍然那么温文尔雅：

“谢谢大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详尽的材料，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我一定尽量全部、如实地带回去，向上级汇报。只有一个问题还想向大家请教：从农场亏损指标来看，我认为管理局订得不算低了，可是去年你们亏损还是大大突破，造成了很大赤字。幸亏林业方面补了上来。……”说到这儿，她犹豫地停下来看看我，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否继续说下去。会议室安静得出奇，人们屏住呼吸望着我，仿佛在看我打算怎样收场。

我说“:是啊,我们只能顾一头,要拿粮就多花了点钱。”

黎珍摇摇头“:我初步计算了一下,种子、化肥、机械力、劳力和水利费用等等，把这些全算上，每斤毛粮成本高达五角钱以上，这就是说，你们生产的每一斤粮食，三倍于国家出售的成品粮！”

她脸上掠过一种难于捉摸的表情，低头想了一会儿，又接着慢声细气地说起来：

“同志们，我得跟你们说实话，我也很希望东风农场能够被确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得到更多的投资和便利。但是去年你们亏损指标上造成的过大赤字，也许会给这件事情增加

困难。请你们一定采取措施，把亏损指标降下来。”

没有人作声，也没有人动一下，大家沉默着。在座的谁都知道，今年即使不要求我们再增产，为了保住四百万，我们只有一条路：比去年投入更多的种籽、化肥、机械和劳力。

就在这时，电话铃忽然刺耳地响起来，我接完电话，放下话筒，竟呆呆地在电话机旁站住了，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好奇地望着我。

“怎么了，老魏？”黎珍关切地问。

“我儿子在学校挨揍了，头破血流，真……”

“那你快回去看看吧。”

我只好十分抱歉地向她表示，提的意见很中肯，很重要，农场党委和管委会一定认真考虑。在送我出来时，我把人事科长叫到车前，关照他：刘军调转手续等我回来办。他会意地点点头，望着我，脸上又浮起微妙的、略带嘲讽的笑容。他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又勾起了我的火气。我强笑着朝黎珍摆摆手，“砰”地拉上车门，心里诅咒着：

“妈个屁！关键时刻，后院起火了！”

十四（黎珍）

沙漠的气候真怪，上午还是万里无云，天色一派青碧，下午却狂风骤起，从辽阔的地平线那边扯起一片沙雾。起先，它象一张张开的帷幔，在远远的天边拂动着。但很快，有如科教影片中的慢镜头，黄色的沙雾升腾上来，扩大开去，吞没了整个画面。房舍、防风林和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全都笼罩在遮天盖地的浓烟似的沙幕中。风挟裹着沙粒，刷刷地打在玻璃窗上，单调、凄凉。招待所象被风沙包围的孤岛，望着混沌成一片的世界，我的心也感到凄苦和迷茫。

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在和子磐经历了那次难忘的旅行之后，在感觉到了他那宽厚肩膀的有力支撑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子磐遭受迫害一去不回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这样凄苦和悲酸。对他的死，我的愤怒超过了悲伤。可是现在，在这遥远而陌生的漠北，它却又悄悄袭上了心头。它已经那么疏远，那么陌生，象一支年代久远的乐曲，又透过这夹带着砂石、自由而狂暴地流动着的大气，朦胧地奏响了。

我坐在会议室隔壁小屋里看报的时候，听到了一些闲话。尽管我竭力做出不在意的神气，但听见的议论还是让我吃惊，而且是那样的伤害了我，刺痛了我的心。起先，有几个人在那里闲聊着谁替谁弄到了两瓶好酒，哪几样东西就要提价，一两桩社会新闻……可是不知道什么人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启

明。

“辛站长一两天不露面了,听说他进城去了,说是办事,我看是躲人!”

“那是为什么?”几个声音一起惊异地问:“以前每次上面来人,他总是一马当先,恐怕没地方唱他那一套嘛。”

“这里边啊,奥妙多啦!……”讲的人故意卖关子,不往下说了。

“说嘛,”好几个声音在怂恿着,“这里没外人。”

“算了,叫人听见了不好。”

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报纸,竖起耳朵在听。我很不自在,不愿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正想走过去,可那人又在小声地、神秘地往下说了:

“魏头和老辛在大学里就是对头嘛!”

“这谁不知道呢?”

“嘿,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边啊,还夹杂个女的呢。”

我猛然一怔。

“哦?!”人们更感兴趣了。我不止一次发现,在这类闲谈中,只要一涉及女人,总是会有人发出这么一声津津有味的“哦”,还伴随着一个暧昧的微笑。

那人更加神秘地说:“人家这次来啦!……”

“啊?!”大家起初不明白,接着就又恍然大悟似的“哦”了一声,立刻便嘈杂地、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真有意思啊,……写篇小说倒不坏。”

“老辛哪是场长的对手,你瞧他那个倒霉样儿!加上‘魏

世’那么跟他作对!”

“唉呀,那天刘军还揍了他。”

“还有玉玲……胡大妈可不是软的！”

“所以呀,要不老辛躲了?这是第一个人的声音。

“瞧好的吧，热闹啦！魏头老婆跟他打离婚，这回他可要下决心啦！”

他们越说越起劲,我只觉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羞愧,羞愧到无地自容。大学时代的无稽之谈，时隔二十年，怎么竟在这杳无人迹的地方传开了？老同学关系，加上恋爱纠葛，我这一次象闯进了一个满是水草、深不见底的海域，胳臂和腿脚都叫乱麻一样的水草纠缠住，真是够难堪的了。一想到小军也难免听到这种流言蜚语，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可恶的老魏，一定是他！不是他本人散布，这里谁会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我心中涌起极大的反感。我竭力控制住自己，尽量不把个人好恶掺杂在工作里，把座谈会坚持下来，简直耗尽了力气。

中午，不顾小军的劝阻，我决然地到大食堂去吃饭了。那里的人十分惊奇地看着我，好象我是从月球上光临的人。小灶的工作人员慌了，追到食堂来问我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与此同时，那个在座谈会上想说话又咽回去的转业军人，却在我吃过饭之后，在我回招待所的路上等着我。

“黎珍同志!”他喊了一声，随即又转过头去，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有些详细情况请你找老辛,哦,也就是我们的辛代站长谈一谈。”

我疑问地望着他，转业军人又心急慌忙地说：

“他从建场时就在这里。这两万亩土地上酒遍了他的汗水和心血,一切他最清楚。”

“这我知道,他是有些不同意见,对吗?”

小军走了过来,那人看见他,便不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妈,他找你干什么?”

“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孩子,谁都可以找我。”

“妈,你当心,这人有过‘四不清’问题。”

“是吗?”

“嗯,这儿的人员很复杂,你谁也别信。”

“对魏场长也别信?”

“不,当然不包括他。你就相信他得了。”

我很痛苦，我看出来了，除了老魏，相当一部分人对小军印象不好,人家背后甚至称他‘魏二世”。在大田里当他和启明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几个转业战士对他有多么憎恶，他们一直不愿搭理他。启明一定也讨厌他。确实，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象他随随便便把持有不同意见者说成坏人，象他露骨的实用主义，使得我十分不悦。他不象我，也不象子磐，仿佛一株植物离开了原来的土壤，移栽到另一个地方，遗传的因素差不多被环境造成的变异湮没了。

走！我得赶快走！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最好马上就离开。可是，一想到启明，我的心就那样酸楚凄凉。就这么悄然离开他是不行的。两三天以来，我始终没有机会见到他，叫刘军把书面检讨送去了，回来也没有听他说起什么。

走廊上响起小军的脚步声，他去人事科办手续回来了。房门响动了一下，但不见小军走进屋来。他背靠门框站着，脸上

挂着阴沉而恼怒的神色，就象这个风沙弥漫的天气。

“怎么啦？”

“碰钉子了。”

“为什么？”

“人家说，我这种情况不能按国家正式职工调转，只能按落实知青政策,办困病退。”

“什么,你不是技术工人吗？”

“代科长查了有关文件，说农场工人不能转成正式工人，劳动总局不予承认。这些王八蛋！”

我就象叫人按进了冷水里似的，全身都发凉了。办困病退回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军失业，意味着无休无止的等待，意味着我在工作之余，不停地跑到居民委员会，到知青办公室、到劳动局去,一次、两次、三次,说明、请求、打报告、探听……我想起前门大街上抢着向游客兜揽生意、卖自编的玻璃丝茶杯套子的三十来岁大小伙子们，想起了一个小小茶水摊上拥挤着八九个营业员。……我痛楚地闭上了眼睛。虽然小军是我们的独生子，但我肯定没有能力为他尽快获得一个学习和工作的正常环境。于是他在街上游来荡去，继续打架斗殴,直至走上……我的心抽紧了，声音也止不住颤抖起来。

“可是,他们本来不是满口答应没问题吗？”

“情况变化了嘛。妈！咱们现在是求人的时候，可您偏要跟人家过不去。”

“我怎么过不去了？”

“我跟您说过不要多管多问,又舒服、又省心,您不干。”

“怎么？我受组织委托来了解情况，有些情况不清楚，怎

么能不问呢？”

“要搞得那么清楚干吗？”小军对我发开火了：“这里的情况地委都掌握，都是张书记点头的，这还有错吗？”没容我回答，小军又说：“我再也不愿意在这个鬼地方呆下去了。妈，您看看窗户外边，看看这飞砂走石，黄荡荡、昏蒙蒙，我们被扔在这里，没人关心，没人心疼，一呆就是好几年。我们出去劳动，回来时常常找不见宿舍在哪里，在沙漠里迷了路，一宿一宿地转游。害怕、受冻、着急，什么苦都吃过了。今天，好容易晴了天，我要回家去，你忍心还把我留在这儿吗？”

我默默地望着窗外，没法回答小军。是的，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可以在边野荒漠中工作，可我们绝大多数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我也是这样。我不是个具有英雄性格的母亲。我得把儿子带走！就在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位人事科长的出尔反尔，该不是对我有什么索求吧？我想起偶而听到的闲聊中他们对名烟好酒的津津乐道，我怎么那么不懂事，从北京连一瓶酒都没有带来！

儿子象是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说出来的话，竟同我无声的思想完全吻合：

“妈，您也太正统了。瞧，什么礼物都没带来，连送给人家孩子吃吃的糖块也没有。”

我确实感到抱歉：“真是的，这可全怪我。我本来想，公事公办嘛。……”

小军深深叹了口气：“都象您那么公事公办就好了。现在只有靠人情，靠关系。妈，您就再好好跟魏头说一说吧，只有这一条路了！”

“那就试试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小军高兴了，可我却犯愁了。去央求老魏，走他的后门；我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启明，想起他对老魏那种冷淡的、不满的目光。我问小军：

“让你给辛叔叔赔不是,你去了没有？”

小军脸上浮现出一种古怪的表情：“我第二天中午就去了,可他哪顾得上我啊！”

“怎么,他在忙……”

“他在忙搞对象,抱着那个女的,我都看见了,嘻嘻……”

我的脸陡地红了，为了小军那愚蠢的笑声，好象我自己受了侮辱一样。我默默掉转头，挥手叫小军走开。

房间里又只有我一个人了。窗外，黄风呼啸，流沙滚滚，刚才小军的话，也象一阵风沙席卷过我心头。我这是怎么了？心里为什么这样凄楚？在我们分手以后的二十年里，启明历尽艰辛，终于重新获得了爱情和幸福，我该为他高兴！但心里却又是这样伤感，二十年后的重逢，我们竟形同路人。生活真是折磨人啊！

在不安的睡眠和一个接一个的恶梦中辗转反侧，最后我决定了：撇开个人的感情纠葛，明天一早就去找启明，我首先得完成自己的任务。另外嘛，作为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看看需要为他做些什么。……

天亮了，迎接我的是一个风停沙静、格外明丽的早晨。阳光倾泻在远远近近的沙丘上，金黄色的沙海又把全部光辉反射上蓝天，天上地下形成了光的交流，象无声的交响乐，一切都变得金光灿灿。我入迷地望着大漠涌起的金色波涛，它们

仿佛受了什么魔术的催眠作用凝固了，而且将千年万代地辉映在丽日蓝天之下。

我问了一个路上遇见的小孩，他指给我看启明的宿舍，我压住心底的颤动走了过去。门虚掩着，敲了半天，没人应声，我便推开门跨进屋里。

这是一间单身汉的宿舍，没有什么家具。正面墙上挂着一大幅土壤潜力分布图，两边沿墙排着些木架，架子上井然有序，摆满各种各样的玻璃瓶、纸口袋。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木桌上到处是书，床铺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很窄，很硬，太简朴了。还有一个没有油漆过的小柜，一个同样没有油漆过的木箱,煤油炉,暖瓶,脸盆,小锅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这么不舒适的环境中！过去他在学校时，是爱整洁的，眼前这一切虽然都很干净，但是已经简陋到不方便的程度了。

我去察看那一列木架，大大小小玻璃瓶上贴着标签，我很快就分辨出来了：第一格是可作绿肥的作物种子，第二格是土壤，各种性质的土壤，第三格是各种肥料。我翻了一下档案袋，发现里面是一份份实验记录，详详细细记载着在几号畦，栽种了某种绿肥作物，施用了什么肥料，结果土壤成分和结构起了什么变化。这里还有“绿纱”一号和其他绿肥作物的详细育种记录。……我激动起来了，我看见的是一个规模十分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辛勤而细致的耕作、试验与观测中建造起来的。启明那挺秀清健的字体，写下了他辛勤劳动的结果，也记下了他二十多年来每日生活的进程。而在每一本实验记录的扉页上，都写着；

“让祖国每一寸土地都覆满沃土！”

我激动得闭上眼睛，心里又是痛苦，又是欢乐。他！还是那个他！他没有变。沉静、矜持，内心充满火一样的激情。

哦,这些规划、这些记录、这个工程,很难想象出自一个从二十年逆境中走过来的人。相比起来,我很惭愧,二十年来,我浪费了多少光阴！客观条件固然不允许，但我自己也没有用全力去坚持我们的事业，他托付给我的那篇论文，始终没有最后完成。……

去年李小蕙来北京探亲，她在东北的一个农学院教书，还象学生时代那样喜欢唱歌，喜欢文学，热情洋溢。她生动地向学生们讲述“不同的河流雕塑出各类河谷的地形”,讲“年轻的河落差大,水量丰富,充满力量”,讲“阳光温暖的触摸使种子孵化”。……学生们很惊讶,以为她是中文系毕业生,以为她是诗人。但她也告诉我，许多学生是不理解我们的，以为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是劣等生，不得已才进了农学院。他们不能想象，怎么能把学农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对当代青年来说,学农,就意味着下放农村,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他们没有享受过当年我们阅读达尔文著作时的激情；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曾自诩为未来中国的米邱林。

那时，我们还曾一起畅想过，未来的农学家应该是这样的：有一双农民的大手和一个科学家的头脑，热爱土地，迷恋着田野的工作,细心地耕耘、栽培、观察,给每一株作物挂上小牌子，给每一畦土地插上标志，象照顾婴孩一样照顾它们。他整天生活在蓝天下,原野上,风吹日晒,脸上很快布满皱纹,把

整个生命献给祖国大地的播种和耕耘。

未来的农学家还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给人民提供最优良的种子，象些没有家室的人一样，成年累月地跑来奔去。冬天去海南岛育种，春天上黑龙江栽培，全身心都在那把黄澄澄的谷种上，他们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在为祖国育种。

未来的农学家还应该是这样，他们没有多少著作，默默无闻，但他们是伟大的实践者，他们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可宝贵的根据。这些人年复一年地使花粉互相交配，把果木来回嫁接，蜜蜂和蝴蝶环绕他们，苍蝇和蚊子叮咬他们，他们忘掉一切个人的烦恼，不断地为大地增添着新的品种。

在我们同学中，难道启明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看到眼前的这些东西，我更想见一见他的爱人，那个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同他结合在一起的女同志。她是谁？是个怎样的人？她怎么会理解他？而又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在逆境中同情他、支持他，帮助他把这样大规模的、有意义的科研活动进行下去啊！

我没料到，她已经来了，就在我身边。当我合上厚厚的实验记录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女同志站在门口，兴趣浓厚地打量着我，犹豫着是否走进来。

我立刻就感觉到这是她。她比我想象的年轻，穿着很朴素，梳着两根乌黑的辫子，长得挺秀气，眼神中流露着善良和颖悟。我结结巴巴地对她解释说：

“噢，对不起，我，我看见这里门没锁，就进来了。”

“哦，我见门大开着，以为辛站长回来了。”她见我很不安，又加添道：“没关系的，他常常不锁门，谁想什么时候来，就什

么时候来。”

她说着,走了进来,让我坐下,倒了杯水给我,又把屋里零散放着的小东西，归整到一边去。我默默地注视她的动作，好象是一个在这间小屋里操劳了多年的主妇。

“我和辛站长是老同学。这次来，我还没有上家里来看看他。这么些年，我听说他处境很不好，……哦，我只是想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他的病好了吗？”

她迅速回过头，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

“什么病？”

“不是说他,说他……”

“神经病对吗？难道您也相信？!”

“我一来他们就告诉我，他一度受刺激……”

她生气地涨红了脸：“他们太欺负人了！到处这么胡说八道，给人造谣……您是专家，您会明白，”她比划着，把架上的瓶、钵、一堆一堆的书籍指给我看：“这么多的工作，大规模开发沙漠、改良土壤的计划，试验，难道是一个神经病人能完成的吗？他从来没有病，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就说他是‘疯子’、‘傻子’。您,您怎么也相信了？”

我激动得站了起来，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是的，是的，在那些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月里，用谣言杀人的事还少吗？一些无中生有的中伤、攻击竟会弄假成真，它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除。

她掉泪了，背过身去。

这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啊！她爱他，理解他，体贴他，卫护他。是的，主要是卫护他！有这样一个人在他身边多么好啊！

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搂住她的肩：

“原谅我,我想你就是那个玉玲吧。”

她点点头,转过身来,透过晶莹的泪花,期待地望着我。

我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辛站长这些年来太苦了！恕我冒昧，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感到她的手在我掌心里剧烈地颤抖起来。她惊惶失措地望着我：

“请您……请您不要这么想，我们只是同志关系，我只是……想减轻他的负担，支持他工作，有时候帮他干点家务活……”

“怎么,……不是说你们……为什么你不嫁给他呢？”

玉玲望着我，我说不清她的眼色里包含着些什么表情。遗憾、难过,甚至还有几分责怪。

“难道您……您真的不知道，他一直有爱人？”

“他有爱人在哪儿？”

“床头小柜第一格里,您自己去看吧。”

我拉开了小柜的格子，在一个制作精致的小像框里，站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天！是我自己那张年轻的、笑微微的脸在望着我！

我傻了。心儿猛然狂跳起来，身体象被雷电击中了似的，软瘫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好不容易转过身，才发现玉玲已经跑掉了。我扑倒在启明的小床上，双手蒙住脸，大哭起来。

十五（辛启明）

我在沙漠里迷路了。

早上没搭上载客的班车，为了抢时间，我拦截了一辆运货的卡车。好心的司机带我走了没多久，卡车就开不动了。

从我们农场到专区所在的城镇，得先坐汽车，在漠原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最近的小火车站，然后再坐约摸两小时火车。这条千辛万苦从沙漠里开辟出来的道路，两边是绵亘不断的沙丘，这些年虽然花了不少力量，种了些红柳、荆条等固沙植物在上面，但一场大风之后，这一段、那一段的公路仍然会被流沙湮没，或者侵占过半；有些地方路基漏沙，一遇雨就塌方，形成一个象炮弹坑一样的洼洞。那时，整个交通就瘫痪了。

我没有翻看黄历，这天那上面一准写着“不宜出行”的字样，因为我们两种情况都遇到了。先是汽车给误在流沙里，怎么也走不了了，我们俩只好一起下去给车子搭桥垫路。好在沙漠里的司机出门象带着拐杖似的，总是带着两根长长的碗口粗细的杠子。我们一人扛着一根，钻到车底，垫在两个前轱辘下面。然后司机爬到驾驶舱去发动汽车，走完这一截，把杠子抽出来再垫。就这么垫一截，走一截，真比蜗牛还慢，刚走一半，倒快小晌午了。司机很抱歉，满脸流着汗对我说了些好话，谢谢我给他帮了忙。我心里虽然着急，想快点赶到专区同外

贸部门取得联系，但又不忍离开他：这些沙子叫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呢？

公路上，往来的车辆那么少，我不免有些纳闷，发生什么事了？很快就弄明白了。对面过来的一辆大车告诉说，前面一段在修路，养路段今天一早就通知了，得过晌午以后才能修复。我和司机面面相觑，顿时感到一筹莫展。

在象我们这样艰苦而偏远的地方，人们的耐性是惊人的，遇上不顺当的情况，谁也不发火，谁也不抱怨，因为这全没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这里的人们就象那些既耐旱又耐碱，既能承受酷暑又能抗住严寒的沙生植物一样，总是把自己的需求减低到最低限度，以至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都缩节成棒状或针状，有的甚至消失成为无叶树；赖以传种的花朵，缩小到都很难从枯黄色的枝条上辨认出来。大家习惯了行路难，绝对不会象大城市的人那样对难走的、尘土呛人的道路，对拥挤的、不遵守时刻的车辆，对因为出现了各种意外而无休无止的等待大发雷霆。

我也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因此，不管我出门的时候有多急迫，现在也只好听天由命。好在我没带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尼龙丝网兜，装着用报纸包好的柳盘、柳篮，圆形的、椭圆的、菱形的，是玉玲又给我送来的几种样品，我相信任何人见了都会爱不释手。

司机已经走到附近沙丘上躺了下来，他不打算费力气再前进一步了。我决定步行。方向很清楚，从我们停下的地方穿过沙漠，对角线走到车站，三十多里路。我向司机道过谢，便一个人向沙漠腹地直插过去。

太阳晒得沙漠暖烘烘的，黄色的沙原之上，是蔚蓝得象用水冲洗过的天空。天边有几朵塔形的白云，象漂在海上的几块浮冰，它们不一会便拉长了，溶化了，变成几缕淡淡的云翳，仿佛是天空这面大纛上的几条鲜亮的褶子。

一般人都以为沙漠是一个死寂的世界，除了一望无际的黄沙，什么都没有。其实不然，沙漠里也有着活跃的生命，特别是在春天，万物复苏，各种小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在繁忙地经营、劳碌地奔走；一些短寿的沙生植物，正利用春季带来的那么一点点和风，那么一点点雨水，急急忙忙地发芽生长、开花结实，完成整个生命的周期；而在干旱酷热的夏季，它们就要进入休眠，无声无息，直到凉爽多雨的秋天再把它们唤醒。

还有各种沙漠上的小居民：牛大、扁斑豸、虎皮蜥蜴，和奔跑起来把瘦小的肚子高高地收缩上去、弓起脊背象小狗一般的沙虎子。

它们忙忙碌碌，熙来攘往，一群一伙的象是在赶集，又象在串亲。……

经过一片红柳丛时，我看见一只毛色翠黄的黄鹂子，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一边发出婉转悦耳的啼鸣，象是在笑，又象在唱，活象一个自得其乐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在悄悄地玩着表演的游戏，沉浸在天真无邪的忘我的陶醉中。突然，空中响起一声顽童起哄似的尖叫声，有对翅膀在阳光下一闪，小黄鹂象是被人偷看了秘密一般，感到很难为情，大叫一声，便朝捣乱的伙伴飞追上去。霎时间，空中传来它们热烈嬉闹的欢叫声。

我兴致勃勃地走着、观察着，沙漠是我的家，对它我早已熟悉了。

走累了，坐下歇息一会儿，思想便又第一百次地回到黎珍身上。不能不想啊，二十年的思念，只得到了短暂、痛苦、充满屈辱的一聚首。只要一想起拖拉机前发生的事，我心里就充满了难以忍耐的激愤和辛酸。奔腾的铁水会有凝固的时候，活跃的火山终于会冷却，可我心中这一点爱情的岩浆，却依然这样灼热。它翻腾得这样持久、执着、难于控制。不仅使我受苦，也害了玉玲。

昨天后晌我去小卖部买墨水，忽然看到一样好东西，几盒包装得十分精致的红虾酥糖！刹那间，年轻时代的一切仿佛朝我冲击过来 林荫道，白衬衫，夏季灼热的气流，秋天金色的树叶，一个少女的笑靥，音乐会，游泳池……这一切，包括红虾酥糖，都是这样长时间地久违了。

似乎是属于首都专利品的高档糖果，竟然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沙漠当中的供销店里，简直不可思议！我不假思索地买了两盒。

只是在买完之后，我才茫然失措地站住了。给谁呢？那个最最喜欢吃这种糖果的姑娘还在吗？她还喜欢它吗？我痛苦地低下了头。

回到宿舍，忽然在房门边的小木箱上发现了刘军的一个纸条，不知是什么时候放下的，上面七歪八扭地写着几个字：

辛站长 我错了，不该动手打人，我向你赔礼道歉，妈妈希望你能原谅。

“妈妈希望”那么，一定是她叫他来的。

原谅……原谅谁呢？原谅刘军还是原谅你？——为了你有这么个孩子。二十年来，我生活的义务好象就是承受别人对我的损害并对这种损害加以原谅。半年前回北京去的时候，遇见了邱良才。他可丝毫也没有请我原谅的表示，还是那么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当年整我是对的，现在纠正也是对的，云云……我没等他说完就走了。本来，历史的错误是不能由一、二个或几个人来负其全责的，我也无意追究哪一个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中有些事情直到今天还是颠倒的：一些被伤害过的人反倒念念不忘地请人原谅；而一些真正伤害过人的人，却仍然一贯正确，根本无意于请人原谅。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才能完全颠倒过来啊！

我朝面前那片贫瘠、崎岖的沙原望去，到火车站估计还要走不少路。我站起身来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发现沙漠的色泽忽然变得黯淡了，四周不再是那个充满活跃生命的金色世界，而是一片枯败死寂。原来不知什么时候，蓝天上那几束光洁的白丝不见了，不知从哪儿飘过来大朵沉重而潮湿的云，遮没了太阳。

要下雨了！我着急起来。在沙漠里行路的人遇上雨是毫无办法的，这里没有一点可以遮庇的东西，更没有一个藏匿的处所，你得完全裸露在乌云下任其浇淋。

我急步走着，雨点象追踪着我的足迹，一会儿就撵上了我，先在我周围沙地上打出些圆圆的浅坑，接着连成线，变成一张密密的雨帘。沙漠在最初雨点的叩打下，腾起一道轻轻的烟尘，天上地下顿时昏蒙蒙一片。

我很着急，柳编样品可不能着水，弄湿走了形，我到外贸

部门就难说话了。我急忙脱下上衣包裹住它，在沙原上奔跑起来。

左边似乎隐隐出现几间小房，我急忙朝那边跑去，好容易奔到近前，却大失所望！原来这不过是几面断墙，许是很久以前地质队或治沙站的小屋，房顶全没了，椽子和檩子早都被人拆走，几面悄然肃立的颓垣，凭空增添了沙漠的荒凉。没有避雨的地方，我只得又朝前面一片红柳林跑去。密不透风、低矮的丛莽中，并没有一个人的安身之地，但我总算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把尼龙丝网兜藏在里面。

密密的雨帘，使我看不清周遭的东西，但是透过雨的喧嚣，我仿佛能听到水份怎样渗进沙漠土壤里，而所有的沙生植物，它们那细长的、错综盘曲的根须怎样在贪婪地吸吮，急急忙忙,发出嘶——嘶的声音。

我的毛衣又湿又重，贴在身上。我把它脱下来拧干，再穿上，很快，身上感到了彻骨的寒冷。这是起风了。雨总算停下来，灰色的云在空中缓慢地浮动，象一张张阴沉的脸，巡视这块受到它的欺凌或是恩赐的大地。

我取出完好无恙的小包，又继续赶路，走了很久很久，按里程计算，我该到达火车站了，起码该听得见汽笛鸣叫声，但是一点迹象都没有。我朝四周望望，前后左右，几乎是等距离地横亘着起伏的沙原，一直伸延到地平线。在这辽阔的视野内，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移动的人，也没有一样突起的目标；只有我，站在广漠大地中心，头顶上是压得低低的层云，连一点判断方向的标记都没有。看看表，手表不知什么时候也停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没有时间，没有地

点，没有方位概念，没有同伴，就好象回到了远古的洪荒时代。

对自己的荒谬感觉感到惊惶，为了摆脱它，我又走起来。一定是我在朝那几面断墙跑去的时候就弄错了方向，以至越错越远。我努力追忆着自己走过的路线，但没有指南针，什么都搞不清楚。随便改变方向是愚蠢的，只能朝着我认为正确的方向走下去，我知道，弄不好今晚要在沙漠里过夜了。

我并不怕在沙漠里过夜，前些年搞普查的时候，我常常带着水和干粮一个人深入沙漠腹地，晚上就睡在暖和而干燥的风蚀坑里。在沙漠里很安全，这里没有猛兽，也没有歹徒，除了提防着别在大风中睡熟，以免被沙子埋住外，没有别的危险。有时候，可以遇见拉骆驼的人露营的篝火，那就更有味道了：从他们那里能听到很多故事，了解某些地形形成的历史，还能和他们一起喝在洋铁罐里烧开的气味很特别的炒米茶，吃他们烤得外皮焦黄、恰到好处的喷香的土豆。

然而现在我湿透了，被冷风一吹，感到异常寒冷、疲倦、饥渴，毫无办法，只能在走动中思索和等待。

我此行的结果会怎样呢？最好的结果无非是：外贸部门和我们订立合同，农场领导批准，柳编社搞起来，职工增加一点收入，我可以争取到在阻力比较小的条件下揭发问题。于是，老魏大光其火，触犯了张书记，我的组织生活的恢复无疑要推迟。当然，我也不善罢甘休，双方相持不下，等上级派人来了解，一年、二年、三年五年，遥遥无期地拖下去。土地呢，被胡乱垦种着，绿肥作物呢，仍被忽视；我呢，依然是一个被清除出党的、毫无希望的人。总而言之，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

这样……

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突然袭上我心头，不但两腿发软，还扩展到四肢、双肩和全身。我觉得自己累得快要倒下去了。我想不通,说句真话,竟要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这何苦呢?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取一个好一点、顺利一点的处境，集中精力搞科学研究，改造大自然的土壤呢？和我有长期联系的那个科研单位，对我很感兴趣，他们已经表示过欢迎我去工作。同时，根据目前情况，只要作些准备，我完全可以报考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甚至参加出国深造的考试。解决党籍问题，平反不留尾巴，这一切都很容易办到；闭上眼睛封住嘴！凭我的刻苦用功，最后一定可以远走高飞……这个农场反正要糟蹋了，随它去吧！一切都是地委张书记，甚至更高一级领导点过头的，对我来说，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呢？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迈上一座沙山，打算再好好地把方位确定一下。但我朝下一看，不由得骇然站住了，两腿象生了根，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那令人悸怖的景象。

就在沙丘下面，在离我不远的一片低洼的沙谷里，出现了一片小树林！但这不是一座生命的树林，而是一座死亡的树林，七歪八倒死树的躯干，扭曲零乱枯树的身姿，使人感到凄惨、恐怖和怪诞。

是幻觉吗？我揉了揉眼睛，不是。我曾听人说过沙漠中存在这种历史的陈迹,在河西走廊——当年的“丝绸之路”上,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这种死了千百年的树林是存在的。但在我们这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今天却这样出人意料地劈面相逢。我象着了魔似的，身不由己地朝它们

走去。

这是一座胡杨林，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歪倒着死树的残骸，但也还有不少树仍然站立着，象一段段干枯的木桩。这些死树，象沙漠里大多数高杆植物一样，在长年不断的西北风压力下，身躯朝东南方倾斜，有如倾身躬立的人群。整个树林就这样倾斜着死去了。一些零落残败的枝干，颓然搭在另一些树上，互相乏力地依靠着，就象死人的尸骸互相撑拒在那里。细长纷乱的枯枝，互相纠结缠绕，象落满尘土的蛛网。我相信，只要用手轻轻一碰，它们就会变成粉末。这一切真象一场浩劫，一次屠杀！这是水土流失后土壤破坏造成的毁灭。

想当年，这座年轻茂盛的胡杨林也有过它美丽的青春。这里有过绿叶红花，有过鸟雀争喧，柔枝在春风中婀娜起舞，嫩叶在月光下絮絮私语……而现在，周围是一片黄沙，枯黑的树林这样死寂，这样安静，静得可以听见我自己的血液在耳鼓里突突跳荡，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冥世，看见了地府中的悲惨景象。……

突然，在我身后响起一声嘶哑的锐叫，悲惨得使人毛骨悚然，紧接着便传来微弱的哼哼声，象是有人在呻吟，又象有人在弹琴，琴弦单调地颤动，发出呆板的、单一的嗡嗡声。

我周身的血都冻结了！听拉骆驼的人说，沙漠里有饥渴而死的亡魂，这些死人为了寻找替身，往往在旅人疲倦的时候向他们弹琴哼唱，把他们催眠。……

我使劲摇摇头，四下张望，一只不知名的怪鸟正慌忙朝远处飞去，而嗡嗡的琴声还持续了好久。

这下我才恍然大悟，这是遇见“沙鸣”了。显然，刚才那场

雨并没有落到这里，干燥的沙石在外力（多半就是飞走的那只大鸟)推动下,从沙山上滑落下来,沙粒彼此摩擦,就会产生这种富有弹性的回声。然而，科学知识抵消不了面对死亡的恐怖感。望着这座坟场般的死树林,古怪的‘琴’声,仍然使我汗毛直立。

我赶快转身离开那里。

这时，天边云缝里漏出来几束惨淡的阳光。太阳西倾得很厉害了。毫无生气的、惨白色的夕照，把沙原上的一切照耀得更加悲惨和怪诞，它使地面上每一样突出的物体都拖出了长长的影子。死去的树林经过夕阳放大投影，伸展出骸骨，张牙舞爪，象要活动起来。我自己的身影也变得颀长可怕，在起伏不平的沙原上，蛇一样弯弯曲曲地爬行着。

不过现在好了，我已知道了方向。刚才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朝东走着，实际上却朝北偏过去了！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当我把行走的方向确定以后，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念头象闪电一般照亮我的思想：改造自然的土壤固然重要，但改造社会的土壤更加重要。不然的话，因为谎言侵袭，已经改造好的土壤，有朝一日，又会变成象刚才见到的那片被毁灭的古代绿洲一样……我哪儿也不去了！我要留在这里，同老魏他们弄虚作假的行为再斗下去！

十六（魏大雄）

狂风不断地把沙石打在车窗上，在这种飞砂走石的天气赶路是最令人不快的了。可是儿子出了事，非回去不可，好在不用绕道换乘火车，从农场直接回专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我望着黄沙满天、象起了大雾的海面一样动荡、险恶的漠原，陷入了沮丧的思虑。大概我的脸色阴沉得怕人，司机想对我说什么,望了我一眼,吐吐舌头,把话咽回去了。

我的不快，当然首先是黎珍在座谈会上的态度引起来的。她为什么刨根问底，什么都不肯忽略，一点也不肯马虎呢？她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可刘军告诉我，这几天她没见到老辛，老辛也没来看望她，过去的感情反而使他们之间有了距离，彼此生疏了,隔绝了。

辛启明的问题也叫我感到棘手。组织部已经几次催问过他的组织生活问题。那位主管科长虽然是张书记圈里的人，对我也很友好，但这件事他却克丁克卯抓得很紧：“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法向上面交待，现在就抓落实政策嘛。再说你们那边群众反映也很强烈。”我说“：嗨，还不就试验站那几个老兵？所以呀，还得仰仗你，通融通融，别催得那么急行不行？”他说“：可你那边也得抓紧,老弟,在党面前,在整个党组织面前，我们不是法力无边的，你要明白这一点。听说各级党

组织都要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到时候别指望所有人都张开伞来替你挡雨。”

他说得对。在整个组织面前，个人再能耐也很渺小。雷雨来临的时候，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我撑伞的。

在这么个紧要关头，后院起火，若梅真是坑了我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义灭亲”之后，家庭生活就再也没有愉快过。若梅对我态度变了，不是平平淡淡，就是冷嘲热讽。当年那个一切听我安排的单纯少妇不见了，我身边有了个一踩就响的“地雷”，浑身带针的“荆果”，完全是一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架势。我在她面前不知不觉矮了一头。

家庭危机的总爆发，是在老丈人的问题得到平反以后。老头东山再起，官运亨通，调到北京去做“京官”了，若梅更加冷眼看我。而这时，我当年写过一些“揭发材料”的事又不知由谁传到她耳朵里，大概把其中一些言过其辞、无限上纲的话也告诉了她，这下可来了个七级地震，若梅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不说话，抽抽搭搭只是哭，人整个瘦下去一圈。后来她不哭了，带着极为冷峻的神情跟我“谈判”。她说，她过去一直崇拜我，认为我能干，有气魄，就是当年出乎意外的背叛，她也老是朝好处想，认为是屈服于压力，不得已，还为我在母亲和姐姐们面前开脱。而现在，她看透了我的灵魂，她实在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亲人。一句话：她要跟我离婚！

我真是伤透了脑筋。事业上我正在转机，家里却不可收拾。这怎么行？我苦苦求她：看在孩子份上，替我想想吧。再说，允许人犯错误，难道就不允许人改正错误了吗？我还提出要直接去给岳父赔礼道歉，负荆请罪，把岳母接来和我们同

住，侍奉她安享晚年等等。可我嘴皮都磨薄了，也哄不转她的心，扳不回她的主意。头脑简单的人，总是这么一条道走到黑。我没辙了，为了把她拴在家里，我一反常态，跑农场住去了，整整一个星期不回家。这几天黎珍来一忙乎，把若梅怄气的事给忘了。可是这个狠心的女人，多半是为了逼我回去跟她上法院，竟把小儿子和家都统统扔下不管了！现在邻居来电话,说若梅昨天走了,今天小家伙就出事了。唉唉,看来,这个一度给我带来过好处的家庭已经变成了我的包袱。这种局面应该结束了！

到了家，打发走司机，我气哄哄地一脚踢开院门。一只公鸡迎着我的面扑闪着翅膀惊飞起来，吓了我一大跳。这该死的公鸡掀起好一阵骚乱，几只母鸡都咯咯哒哒地大叫起来，还夹杂着一只公鹅的嘎声哀号，真是鸡飞狗跳，全都没了章法。小儿子跑出门，见我回来就哭了起来，我看他头上缠着一道白纱布，象个伤病员。原来老师已经陪他上过医院了。

我本想发作一通，可一看孩子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压下心头的怒火，领着他走进了房门。

屋子里乱得更让人心烦。本来，我这一套四间的独院平房,是本地最高级的住宅之一 光洁的地板,方便的壁橱,宽敞的厨房，雪白的粉墙。粉墙下半截全刷上乳黄色的亮油，显得那么素雅、豁亮，哪个女人不羡慕？加上我这两年美美地做了一套家具,大立柜、五斗橱、酒柜、圆桌、沙发……去年又装上了土暖气，朋友们经常拿我的家做样板。这群“发家致富”心切的人常开玩笑说“别看我们老魏人是‘地方级’,家可是‘中央级’的。”这么好的一个家，我以为若梅是决不忍心抛弃的，

可是现在呢，到处显得肮脏零乱，什么东西都放在最不应该放置的位子上，处处都显得颠倒紊乱，碍手碍脚。

我望着儿子那副哭丧着的面孔，长叹一声：

“说说吧，怎么回事儿？”

从儿子断断续续的哭诉中，费了很大劲儿我才听懂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晨语文课上，老师叫小朋友们用“因为……所以”这组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造一个句子。当老师问到小家伙时，他正跟邻座淘气，一时心慌，冲口便说：“因为我去年转学来这里，所以今年大家才能暖暖和和地上课。”老师问小朋友们，回答得对不对。好几个男孩子都说，不对，哪是因为他呀！小家伙急了，眼睛一瞪，连忙解释说，他来前，教室玻璃窗都打烂了，好几年都没配上。爸爸怕他上课风吹感冒，才写了个条子，从东风农场替学校解决了两箱玻璃。小家伙理直气壮地宣称：“要不是我，你们还得再冻上一冬天！”但男孩子们也不示弱，一口咬定他回答不对，是因为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正不是他那个当农场党委书记的爸爸。几个人争执不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又拌起嘴来，最后发展到拔拳斗殴，扭打在一起。

我气坏了，没等他说完就怒吼起来：

“你活该！”

“怎么？”

“谁叫你胡说来？”

“不是你亲口说的？”儿子哭声哭气地抗议。

“我说是我说，你说就不行！下次你要再敢多嘴，我轻饶不了你！”说完，对准儿子后脖颈，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儿子大概满心以为会得到我的同情和支持，没想到招来这么一场责打，便拚命哭喊起来。他哭，院里那些鸡鸭也跟着大叫，我再也压不住火，终于大发雷霆了：

“你造的这个狗屁不通的句子，用不着两天就会当作笑话传遍全专区！你尽给我找麻烦，滚滚滚！跟你娘一样，全给我他妈的滚！”

儿子看我真的气黑了脸，操起扫帚疙瘩要打他，吓坏了，抱着头一溜烟跑了出去。

我颓然倒在沙发上,心里充满了恼恨,恨儿子,恨吴若梅，也恨黎珍。他们全跟我作对！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没等我答应人就进来了，不用看，光听脚步就知道是我的邻居——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他戴一副黑边眼镜,面色焦黄,老是犯胃病,走到哪儿,手里总捧着自己那个保温杯，里面泡着上好的绿茶。

果不其然，他捧着杯子在我对面坐下了。

“唉,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他什么都知道,准是儿子跑过去哭诉了。“毕竟是小孩子嘛，不懂事！这会儿跟我那小子玩得好好的,啥事都没啦！”

副主任呷了一口茶,见我没动静,便关心地问:“吃饭没？”

“不想吃。”

“那还行？这才多大点事？这可不象你呀，老魏，吴若梅对你来说，一条浅沟嘛，就迈不过去啦？”

“说哪儿去了？我是累了,想擦把脸。”

等我洗完脸回来，副主任开始和我谈正事了：“知道我打电话催你回来是为什么吗？”

“不是为了孩子打破脑袋吗？”

“这只是其一。我找你是为了要那个东西。”

见我没反应，他有些不满似的说：“忘了？我急要的那个证明办好了吗？”

我也不满地瞅了他一眼，心想，我能把你的事忘了？就你重要！一边慢吞吞地从前胸袋里掏出个信封递给他。他抽出证明看了一遍,高兴了。

“嘿,还给她写了几句鉴定,这就显得更真实了!”

原来前些日子国营企业招工，副主任的小姨子想进这个门，可是按规定，招工对象必须是下乡两年以上的，她他妈一天乡也没下过,于是来找我想办法,要‘东风’出个手续,证明她在农场劳动了两年以上。对我来说，这虽然并不困难，然而搞多了，也是一种麻烦。但是没办法，人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不考虑各种关系，依靠各种关系。说穿了，我把家留在专区所在城镇，也是为了便于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

自从在同老吴头的翁婿关系上跌了一跤后，我不能不考虑建立和发展新的关系了。这几年来，我对“关系学”也慢慢有点入门了。我领悟到,不仅要研究人们‘经济基础’(物质生活)方面的关系,还要研究他们‘上层建筑’(兴趣爱好)方面的关系；不仅要研究人们相互间亲近良好的关系，还要研究他们相互间对立仇恨的关系。只有把一个地区干部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搞得很透，才不会象盲人骑瞎马似的，在这场杂技表演中跌得粉身碎骨，也才有可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关系架成的桥梁或造成的缝隙，迈进和发展。

“关系学”的奥秘还在于：各种关系象货币一样互相间可

以流通转换：运用人事关系帮助医院大夫的儿子上了学，在一定时机就可以运用生活关系给某部长弄到急需的特效药，再到一定时机就可以借某部长的关系为自己要官要权。除了跑腿花些时间和精力外，不需要别的本钱。而自己却象掮客一样，在把甲方货物介绍给乙方过程中大捞其利。

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农场给了我十分雄厚的资本：亚茨海里有鱼，南头畔上有瓜，车库里有卡车，还有几百个急于回城的知青。掌握着这些东西，使我在“关系学”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研究别人，变成了被人研究；从替别人跑腿变成了也有人替自己跑腿了。几年的实践使我认识到：有着互相利害关系的关系，是最牢固的关系！我求某人办事，我手里最好有某人托办的事。我本想把黎珍置于这种关系里，可惜她不懂，而眼前这一位是深谙此道的，他同我就处在这种最牢固的关系中。

“你这证明来得正是时候,明天他们就讨论。”他心满意足地把证明收起来，呷了几口茶，蜡黄的脸上忽然出现了几组放射形的线条，笑吟吟地望着我。

“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膝盖上,语气十分亲昵“:任命批下来了。”

“怎么说？”

“调你去管理局当副局长。”

我不由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确实吗？”

“文件我已经看到了。”

“哦!”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天乌云都散了。我真恨

不得揍他一顿！这么重要的事，卖了半天关子才告诉我。不过我嘴上还是高兴地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不过还有个情况你需要知道一下。上面对接你工作的人,大体有个谱了。”

“是副书记老杨?”

“他哪儿行呢，业务不熟，第一把手怕是拿不下来。他们物色的是辛启明！”

我吃了一惊：

“他?!”

“可不是，他是农场的老人，情况熟，又受了二十年的委屈,该提拔一下了。再说,他的党籍也快恢复了。”

“这是谁的主意?”

“不清楚。不过对他的问题组织部门吵吵很久了，有那么一批自封是为民作主的‘清官’嘛。现在正抓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辛启明赶上点儿了。不过，他跟张书记你们两岔，怎么交工作,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倒没什么,”我豁达大度地说“:咱们不在乎。老乡说话了,‘浅蓝的裤腰深蓝的裆,谁也窜不了谁的行’。我走了,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能把我怎样？再说，不挑担不喘气，压上担子兴许他就明白过来了。”

“不过,他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是啊，虽说任命下来我就要远走高飞，别人说什么也不碍事，但问题如果毫不保留地揭露出来，造成不好的名声，对今后的发展前途，影响也是非同小可。再说，事情还牵涉张书记，给他抹了黑，削弱了他的权威，今后他怎么替我说话呢？

我对办公室副主任说：

“得把这朵乌云给吹走。你见书记们先吹吹风。情况你不是都了解嘛！”

副主任蛮有兴趣地问：

“还跟那个女售货员拉拉扯扯吗？”

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至于接替的人，让组织部先不忙定，我们再物色。”

“那你可得抓紧！”

就这么，我又把老婆和儿子的事抛在脑后，跟主任议论了一气人事安排上的问题，动手炒了两个菜，把桌上的东西往旁边一推，面对面喝上了酒。

我是天生的好酒量，半斤白干落肚，副主任大醉酩酊，我还面不改色。把他送走之后，我沉浸在极度兴奋和激动的盘算中。

从北京转到地方，又从地方到沙漠里苦战了几年，如今总算有了预期的收获，远走高飞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迈出这一步，以后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大，越来越顺当。本来我还担心若梅可能会坏事，会到上面去吹冷风。如今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与她的关系也该是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荣升了副局长，还愁再找……我的思想忽然转到黎珍身上，她还是那么小巧、迷人；她现在也是一个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忽然浑身发躁，旧日的情意又在心底骚动起来。

重修旧好，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大立柜的穿衣镜里，清楚地映现出我的形象：血色很好的脸膛，粗大结实的脖颈，公牛一样强壮。不错，腰身粗壮了点，显得个子稍有些矮，但背部仍然挺直，加上一身得体的衣服，一副信心十足的实亚家派

头，对于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你还要求些什么呢？

当然我得考虑辛启明，但他目前的状况远远不是对手。苍白的脸上，粗糙的纹路，艰苦劳动毁坏了的双手，在人前表现出的一种近乎迟钝的沉默，眼界开阔的首都妇女不会再属意于这样的人。更何况还有个玉玲扯着他，他想不干也不行，胡大妈会活吃了他！

一想到管理局副局长有一个在部里工作的妻子，我的心就兴奋得狂跳不已，那才叫如虎添翼呢！今后的发展速度将是一日千里！到了一定时候，我又能打回北京去，和二十年前那个我，就不可同日而语罗！

我快乐的思潮忽然被电话铃声打断。住宅内安了专用电话，这也是我这个相当县团一级的国营农场场长的一种特权。有了它，我坐镇在家里就能对二百里外沙漠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电话是农场办公室代主任来的，他报告了三个情况：

一是刘军去人事科办手续，那边暂时卡着他，他们母子很不高兴，要我有个准备。

二是黎珍已到大食堂吃饭，不肯再吃小灶，而且有迹象表明，她很可能单独找辛启明谈话。

对这两个问题，我挥了挥手，对电话筒轻松地说：“没关系,我有数,不必担心。’可他报告的第三件事,却使我吃惊得跳了起来。他告诉我：农管局通知我们，部里分管三北地区国营农牧场的副司长，黎珍他们那个调研组的组长，在别处视察后将转到我们这边来看看，要我们准备接待。来者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岳父吴根荣！

“什么！”我大声嚷嚷：“什么时候通知的？我在这儿怎么没听说？”

对方从我的口气里大概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嗫嚅着说，是下午一上班时来的电话。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过了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扔下话筒，我就去找我的邻居，这个浑蛋！这么大的事他竟不告诉我。

副主任还在睡觉，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喊醒了。

“听说老吴头要来？”

“啊？”他还有些迷糊：“谁要来？”

“我问你，是不是我们家老头子要来视察东风农场？”

“啊，是，是！”他算是清醒了一点：“哎呀，糟糕，光顾跟你说高兴的，我把这事忘了。”

“你们早不通气！”

“临时决定的。原计划他不上这边来，直接去新疆，老头不知怎么高兴了，又想来打个拐弯。”

“那不能不安排他看‘东风’？日程不是由你们和农管局定吗？”

“伊赫农场是他的老根据地，你们‘东风，又是先进单位，大名鼎鼎，挡得住他去吗？”

情况有点难于驾驭了。我陷入紧张的思索。

首先蹦到脑子里的念头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不跟吴若梅破裂，那工作上万一发现差错，也左不过批评教育，老头儿不至把事做绝……对！我今天就去把她接回来。有什么办法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好梦还没做就破灭了！至于农场方面，要堵上辛启明的嘴可不那么容易，特

别是他和老吴头还有老交情，这可有点棘手……忽然,我心里一动：要是把农场交给辛启明呢？妙！真是一个绝招！如果立刻恢复辛启明的组织生活，由我出面来保荐他当继任场长，他就不好再一个劲地揭前任的短了；而我在组织部门又可以落个好名声。黎珍那里，为顾念他，也会手下留情，不至做出有损“东风”的事情来。对！黎珍决不忍心从这个受尽苦难、现在刚刚翻身出头的旧日恋人手里，夺走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的种种优惠条件……老吴头嘛，一旦他知道农场交给了辛启明，态度也肯定会温和起来。

这真是个一石三鸟的好主意！通过若梅和辛启明，从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两个角度牵制老吴头和黎珍他们，化险为夷。“关系学”,“关系学”,能说你不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吗？

主意确定以后，我便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打了一系列电话，弄清老婆在哪里，目前情绪如何。然后，把伤兵一样的儿子打发到她那里去。其次，尽快给刘军办调转，给黎珍饯行，一个“海上鱼宴”的计划迅速安排下去，时间、参加人员等等，用电话下达到了农场。这一招很有效，以往多少回，我总是把在办公室或会议桌上未曾满足的要求悄悄收起来，塞进最后这个“余兴节目”中提出来，往往如愿以偿，十有八九获得成功。经验告诉我，人在高兴的时候什么事都好办，何况自己又是这样奉承巴结，亲自替他们张罗吃，安排住，提供种种方便……一个堂堂党委书记，甘效犬马之劳，求他们办点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怎么可能再回绝呢！

这两步棋走好之后，我拉着办公室副主任，立即写好一份报告，半夜去敲张书记家的大门。……

十七（黎珍）

我和小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痛苦的谈话。

进行这样的谈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自从那天到过启明的小屋，跟玉玲谈话和发现了启明小柜里的秘密后，我怎能无动于衷呢？……再说，那斗室内的巨大工程，我们年青时代理想的霞光，这一切都在召唤着我！我情不自禁地留了个小纸条，夹在枕边的书里：“看见了一切！明白了一切！我等待着你。珍。

但是，我怎么能跟小军说得清楚呢？这么复杂的感情，他能理解吗？要是子磐九泉有知，他是会理解的。

在我眼前立刻出现了我那高大、宽厚的亲人，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用无限锺爱和信赖的眼色注视着我，好象在说“祝福你，珍妹，永远为你祝福！”

这样一次谈话既然不可避免，于是昨天夜里，小军来招待所时，我便拐弯抹角地跟他讲起启明来。

话刚开头，小军就打断了我：

“妈！您为什么总跟魏头作对呢？”

“这从何说起？……”

“老实说吧，魏头讨厌那个姓辛的！可您呢，老是反其道行之，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管怎么说，人家昨天是给咱们面子了，亲自领着我把调转手续办妥了……”

是啊，老魏从家回来，忽然对小军开绿灯，同意放了。这变化，总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儿子见我默不作声，管自说下去：

“妈，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您想让我象你们年轻时那样对待生活。可我们怎么能和你们那时相比呢？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上不了大学，连谋生的本事都没有！谁顾念过我们？我们能不考虑自己吗？我们高尚不了！”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儿子不常象这样说话，我这才发现，他脑子里的事并不简单，他也想了很多。

“……从我懂事时候起，爸爸便离开了我，您又被送去干校劳动，我成了叔叔的儿子。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让我回到北京，回到您身边，好好地跟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妈，难道您就不想和我在一起？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没有好好地在一起生活过呢！”

儿子的话，每个字都象一柄大锤打在我心坎上。我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

“妈妈也一样,离不开你……”

“那我求求您，别再挑魏头的刺儿了，但愿我们能平平安安离开这里。”小军使劲摇晃着我的胳膊，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我的工作还没有最后结束呢。”

“他们不是已经把材料都给您了吗？”

“材料还没有很好核实,还得跟辛站长谈一次话。

“说来说去,您还要跟魏头唱对台不是!”

经小军这么一提醒，我感到东风农场一定有什么难言之

隐。如果是这样，我不能装作视而不见！于是我明确地告诉小军：

“这跟你的事扯不上。如果他借故刁难，为了你，我可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

儿子的脸由于气愤和恐惧扭歪了，他转过身去不看我，从窒息的喉头挤出一句话来：

“不是为我,是为了……那个人,是吗？”

我沉默。不出所料，人们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他耳里了，闲话总比任何飞行器的速度都快。这倒好，即使是一种歪曲，也省去很多口舌，免得我自己来说明原委。

他突然喊了起来：

“甭想！我恨那个人！他是个神经病！”

我平静地说：“你说得完全不对,他是个真正的农学家,一个好人，值得你尊敬……”

“妈妈,您别再说了！”小军蛮横地打断了我,转过脸来。我看见在他那倔强的眼睛里，有一闪一闪的泪光。我心疼了，抱住了他结实的肩膀。

“孩子……我的孩子,你怎么了？”

“妈……难道……您把爸爸忘了……”

我难过得闭上了眼睛，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忘,也永远不会忘。……”

“反正我不同意！”小军挣脱了我的手，“我恨他！”

说完，他便发疯似的冲出门去。

整整一夜，在我眼前轮流出现他们两个的身影：一个是我唯一的、失而复得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深深牵念的受尽折磨并

奋斗不已的人。过去，我听许多女同志谈起过，成年的子女对独身母亲的制约力。女儿好一些，女孩子们能够体谅、同情。而儿子们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虚荣心，往往使他们变得不通情理。记得在一本什么小说里描写过，一个母亲屈从于自私而粗暴的儿子的压力，牺牲了毕生的幸福。而当孩子长大成人，明白了这一点时，他已追悔莫及，为时已经太晚，母亲的生命已将及走向了尽头。是的，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道路，母亲不应该一辈子绑在儿子的战车上。等他们再长大些，他们会逐步理解和同情一些他们当初竭力反对过的事，而我们却已青春不再。没有时间等待别人的批准了！

可是一大清早却出现了异样的情况。我去吃早饭，人们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农场场部门口出现了一张匿名的小字报，揭发一件风化“丑闻”，内容牵涉启明和玉玲。人们在窃笑，有些人在到处打听、传播，我象受了致命打击，几乎站立不稳。这是恶意中伤和毁谤，想用谣言毁掉两个好人。是谁干出这样不光彩的事？

据说胡大妈在全场乱跑乱骂，要找启明拚命……人们等着看热闹。

我到处找不到小军，心里怀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恐慌，我怕这是他干的，但愿不是！正当我心急慌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地寻找小军时，老魏的吉普车从场部驶出来，他老远就打开车门，朝我喊着：

“正要上招待所找你去！”

我指指小字报问“看见没有？”

“看了，”老魏摆摆手，“嗨，启明也是，早结婚不就什么事

也没了？清官难断家务，这种纠纷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可这是谁写的呢？……你看见小军没有？”我急急地问。

“刘军？一早就打发他去海上准备了。今天我为你在亚茨海上布置了一次别致的鱼宴。走吧，黎珍，来到我们这里就得这样，先办正事，尔后享乐！”

我还有什么心思去“享乐”？可是听说小军在那里，便只得跟着老魏登车驱往亚茨海。

亚茨海象面巨大的镜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告诉我，原先它是个天然的沙漠湖沼。军垦农场修建引黄大渠时，有一条支渠从黄河导水进入亚茨海，再从亚茨海引入部分农田。后来发现这样借道，工程倒是省工，但河水浪费惊人，而且更主要的是渠水流入湖沼再引出去，流速大大减弱，以致不少地块浇不上水。于是在海子当中筑起一道大坝，把亚茨海分成里外两半，让渠水只走里湖，减少浪费，提高流速。外湖比里湖大得多，从车上远远望去，只见湖面开阔，波光粼粼，使人心胸顿时一爽。

大功率的越野吉普在大坝头上停下来。小军和另外一个知青，早已备好两条小船在这里等着我们了。

小军脸上喜气洋洋，他一见我们，便欢声喊道：“魏头，昨天下的套子都漂得那么远了，怕是挂上的鱼太多，再不收，那两张挂网就报销了！”

老魏手搭凉棚朝外湖水面上眺望了一阵。

“果然不错！”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黎珍，你运气好，今天咱们肯定丰收。大家快上船！”

远远的，有一个人沿着隔开里外湖的大坝朝我们走来。

起先谁也没注意他，可就在我们准备上船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这是启明！是的，是他！熟悉的、挺得笔直的身躯，用我看惯了的姿态，急急忙忙地大步走来。我的心狂跳得快窒息了。

老魏催我上船，我却象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从第一天邂逅相遇到现在，这才是第二次见他，短短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件和变故，仿佛已过了整整一年！

老魏只好无可奈何地等着，小军脸色变得阴沉，充满敌意。

启明在紧张的气氛中大步走到了面前。

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脸色是那么明朗，微笑把整个脸庞照亮了。好象没看见别人似的，他走到我面前，那样诚挚、坦率、专注地看着我。他一定看到那张纸条了！

“怎么，老辛！”老魏假装高兴，又亲热又快活地喊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告诉一声？”

他没有理会老魏，只是歉然地对我说：

“这几天我出去了。听说今天安排了海上鱼宴，知道你要走了。我想，该送送你。”

这么说，他没有看见字条，我有些失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去过你那里，你不在。……”

“……”

“我看见了你的工作，……你做了这么多工作！”

“谢谢你！”他避开我的眼睛，低下头，有点怅惘地站立着。

“快上船吧，妈，时间不早了！”

我看了看小军，忽然鼓起勇气对启明说：

“一块去好吗？老魏，你看呢？”

“当然啦，一块去最好！”老魏热烈地应和着：“要知道你回来，早就请你去了。”

启明朝他笑笑，坦然地带头下到小船上。

小军和另一个知青划一条船，我们三个人划一条船，一起出发了。老魏带着一股做作出来的高兴劲，眺望四周说：“今天天气真好啊，老辛，我们来个君子协定，玩个痛快，‘莫谈国事’，怎么样？”

启明也用轻松的口吻说：“敢不遵命？”他又对我说：“我们沙漠里其实是很美的。这一湖碧蓝的水，配着周围橙黄的沙，鲜明的色调你看象不象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大师们的绘画？有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小天鹅，又苗条又柔顺，象小姑娘……”

老魏哈哈大笑着打断了他：

“启明还是老样子，又会做梦，又会做诗。”

两条小船朝海子中心缓缓划去。

初春的阳光照在亚茨海上，把湖水映得蓝汪汪的一片。四周安静极了。几只嘴子尖得象十字镐、尾巴和翘膀尖上有一圈漂亮黑羽毛的灰色海燕在水面上盘旋翱翔，偶尔发出几声轻叫。岸边水浅处，雪白的羊群站在湖水中，在恬静地舔吃着刚刚钻出水面的苇草嫩叶，远远望去，宛如蓝色天池中朵朵雪白的睡莲。再往远处看，便是明亮的金色沙岸，仿佛一抹耀眼的朝霞，静静地横亘在天际。

启明脱下上衣为我们操桨，他划船本来就划得很好，双桨飞快，悄无声息地插进水中，小船象箭似的全速前进。

老魏喋喋不休地告诉我，早先这里人烟稀少，亚茨海里的

鱼多得都游不动。听附近老牧民说，套马杆子插在水里都能直立不倒！

“你这当场长的,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夸张有,’启明支持他说“,但鱼多是事实。”

老魏立刻便常有理了：

“是呵，启明的话你该相信吧。内地吃鱼紧张得要命，可在我们沙漠里，鲜鱼反倒随手可得，奇怪吗！”

到了下套子的地方，老魏探出上身，熟练地从水里捞起系在网绳头上的那块‘浮木”,另一只手抓住漂在水上的‘浮子”,轻轻一拎，只听“泼拉”一声，一个东西在水里亮了一下，没等我看清，老魏已经从网上摘下那东西来，哈哈大笑地扔在船上。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条一尺多长的鲤鱼，大张着嘴，拚命喘气，胸前那对金黄色的鱼鳍，象是落水的人伸出来的双手，在呼喊救命似的舞动着。

“这叫金翅鲤鱼，是前几年从黄河流进来的。”老魏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水珠,把‘浮子’串进那块‘浮木’的竹签子上：“据说,从前专门供应皇帝御厨。……”

没等老魏说完，启明在船尾发出一声欢愉的叫喊：“接着！”随着声音，“噗通”一声朝我脚下扔过一条鱼来。细长的身条，雪白细密的鱼鳞，在阳光下一闪一亮，好象一把蒙古刀在闪闪发光。

“嘿!这才是真正的佳品!’老魏十分内行地指点说“:这叫‘浪里白条’,也是黄河特产,肉很细,很嫩,味道极为鲜美，比金翅鲤鱼好吃，但名气不如它大。”

他们俩一齐动手,把‘套子”一截一截收拢来,等最后一个

“浮子”串进竹签子后,站起身,四只手使劲往上一提,把“套子”从水中拽了上来。霎时间，我觉得眼前仿佛亮起一道银光，各种各样的鱼，象动物标本固定在塑料纱布上一样，一动不动地挂在这张套网上。

“怎么样?”老魏欢声喜气地大声喊叫。

“嗨,想不到你们这里鱼这么多,吃鱼这么方便,真太有意思了!”

启明说：“要是夏天来更好，一边游泳一边捕鱼，累了去岸边沙地上晒太阳，看白云从头上飘过；要饿了，生起堆篝火，煮上锅鱼汤,啊!真正的鲁滨逊生活!”

我真奇怪，启明今天兴致那么好，简直变了个人。他又恢复了青年时代的幽默、活跃，我不理解，但为他高兴。为他担忧的那朵乌云被驱散了。小字报的恶意中伤对他没有起作用，他曾从荆棘丛中走过来，一根小小的毒刺伤害不了他了。

老魏喊我说：“黎珍，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鱼从网上一条条摘下来,放在桶里。”

“这好办！”我挽起衣袖忙碌起来。挂在网眼上的鱼真多啊，船上的鱼腥味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海燕，它们跟着小船在空中来回盘旋，两只锐利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监视着船上的一举一动。也有胆大一些的，好象一点不怕人，绕着船舷在我们身旁上下翻飞，啁啁啾啾地叫个不停，象是在向人讨吃一样。启明从套子上摘下条鱼，向船外抛去，刚一出手，好几只海燕一齐冲上来，在鱼快要落进水里的刹那间，空中直扎下来的一只一口叼住了它,两只张开的翅膀猛地扎在水面上,发出“泼啦”一声，但随即，又迅速地飞起来，好象顽皮的孩子抢到好吃的

食物以后马上逃开去，躲起来独自享受。我望着这有趣的情景，不由得欢愉地笑出声来。

整个上午我们玩得非常高兴，打到了好多鱼。我对启明说：

“你说得不错,这里很美,微波荡漾的湖水,水边的羊,湖里的鱼，天上的鸟，新鲜的空气，……说实话，我倒真想留下来。”

启明忽然提议说：“让刘军他们先把鱼拿到大浮船去吧，这么好的春光，我们再玩一会儿。”

“好啊,”老魏欣然同意,“老辛,难得你今天兴致这么好。”

打发走小军他们之后，启明拨转船头，朝我们来的方向慢慢打起桨来。他说：

“刚才我说到了鲁滨逊，有时也真想过两天那样的生活，可总是做不到，一分钟也做不到。”

“怎么？”

“工作总是侵入我们的休息，叫人不得安宁。”

老魏皱皱眉头:“你又来了,老辛,我们之间的意见下面交换好不好。”老魏转向我,满脸委屈:“每一次总是这样,在客人面前，不分对象，不分场合……真叫人受不了！”

启明诚恳地望着他:“黎珍不是生客,她再过一、二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们三个人碰到一起不容易，二十年才一次，有些话该趁野旷风清、在湖光云影中说一说。说完就拉倒，该怎么做,各自听便,这还不行吗？”

老魏脸色阴沉地望着他:“实在憋不住,你就说吧。不过我也有言在先,劝你客观、冷静、慎重！”

“明白你的意思。”启明迅速地回答，“客观我尽力做到，但冷静却有困难。试想，一个人为了几句真话，失去了党籍，失去了爱情，失去了职业，失去了生活；今天，如果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还不能说真话，那么，这二十年的苦算是白吃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不过我相信，历史不会重演，党正在从过去的错误中总结教训。靠说假话飞黄腾达，总有一天会此路不通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于老同学的一片真诚，当着黎珍，再向你进几句忠言。”

老魏冷冷地说：“你挑了个好时候！”

而我却五内俱焚。启明的那段自白，在我心里顿时激起一阵强大的感情狂澜。我声音颤抖地说：

“有什么话，快些说吧……”

“话很简单，我们这里去年总产上了四百万斤，是真的；而单产达到四百斤，上‘纲要’，却是假的。老魏，这我没乱说吧？”

沉默。四周一片静谧。我知道启明说出了真相，老魏无法否认。过了一会儿，我问：

“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是这样，我们种了一万亩‘帮产田’。就是说，向上报一万亩，实际种了两万亩，把所有应该轮休种草的土地全部种了粮食。我听说你查问过种子、化肥用量过大的原因，人们一定告诉你：风沙大，毁种，补种……实际上，那是两万亩土地的消耗量。”

我把眼光转向老魏，奇怪的是他竟一点也不显得狼狈，反而悠闲自得地眺望湖面，好象启明是在说别人的事。

“更糟糕的是，一次说谎要引起一连串的谎言，就象滚雪

球，越滚越大，身不由己，最后想不说谎也不行了。由于使用的人力物力大大突破了国家允许的亏损指标，因此不得不谎报造林面积，以林业投资来弥补亏空，以便能够给职工发奖金。否则，大幅度增产而职工收入没有增加，岂不笑话？”

“那些树林……”

“在我们图表上种满了树林、育满了苗床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空白的沙滩。”

“你就不怕林业部门来调查？”我问老魏。

见老魏不吱声，启明一边轻轻地打着船桨，一边接着又说：“没有人来实地调查过。官僚主义者满足于表格，你只要在表格上填满需要的数字就行了……为了防万一，顶多告诉他们风沙大，成活率低……沙漠嘛，谁都知道往上浇油也白搭。”

我倒吸了一口气，又转眼去看老魏，他还不说话，我忍不住了。

“老魏，这一切是真的？”

他挑战似地望着我：“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需要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专区需要有‘农业学大寨’的排头兵，需要有亩产上‘纲要’的先进典型。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可也不能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来当这个先进典型啊！”我有些激动，声音不由大了起来。

“哼！”老魏冷笑着，把手里大半截香烟扔在水上，“你们在北京工作的人，怎么会想到基层工作的种种复杂和麻烦！我没

有办法，张书记交代的，‘上纲要’是政治任务。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能怎么样？”

“你可以说明情况。”

“什么都说了！结果张书记答应给条件，作为上级来说，也够关怀了，还要怎么样？事实上我在大会上下了保证，响话喊出口，确实起了带头作用。各农场看‘东风’条件这么差，决心还这么大，谁好意思再往后蹓？”

这些情况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这时老魏慷慨激昂起来：

“我刚来‘东风’是个什么情况,老辛最清楚！一个烂摊子，亩产只有四、五十斤，要什么没什么，农管局甚至不把我们打在数里。现在是什么局面？”老魏愤愤地对启明说，“是在我手里，农场大大改观的，对不对？是我叫农场站住脚，把局面打开的，是不是？我也没少脱皮掉肉，汗流如水，这些你怎么都不看呢？这都是撒谎吗？”

“是的。这一点不假，而且我还承认你很有组织才干，用一个‘代’职称，把懒散的工作人员，调皮的干部全拢到一处，卖命流汗，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老魏嘴角上一个得意的笑容隐约可见，转向我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我对记者和上面来的同志总说，我们有缺点。但要看我们的大方向，我们的主流。”

“我始终不懂代职称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对你说过，去年我们抓了一下班子整顿，把一些得力干部拿到负责岗位上来，来不及等上级批准，先‘代’着干起来。”

“而‘代’字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启明讥讽地笑着“:代职一方面有实权，能大胆放手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人们为了摘掉职称前那个‘代’字,都兢兢业业,不敢玩忽职守。说穿了,老魏把‘帽子’拿在手里,农场指挥系统就变得灵敏了。四百万斤的重担,通过一个‘代’字,就不知不觉地分散到了全场职工的身上。多高明！”

老魏变了脸色“:老辛,我不明白,你这么想方设法剥我的‘画皮’,究竟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农场！老魏，你知道得很清楚，问题不仅是在单产上谎报成绩，在造林上虚报数字；问题在于你这样干下去，不让土地休整，用不了几年，就会毁灭我们千辛万苦开辟出来的这片绿洲！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启明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冷峻、严肃。

听着这沉郁愤慨的指控,我的心沉下去了“:老魏,你没想到这一点吗？”

“我想到了。”老魏胸有成竹地说“:我毕竟不是一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笨蛋。你们今天好象要审判我，声讨我，都来吧，都可以！可是再说一遍，我当时没有办法！张书记刚刚上任分管农业，他身上压力很大，我明白他要把压力转嫁一部分到我身上，我能拒绝吗？再说，不接受任务对我们农场又会怎么样呢？一个打死也放不出响屁来的农场，要什么没什么！怎么办？上吊吗？我需要投资，需要照顾，需要种种优惠条件，需要一路畅通的绿灯。我办到了这一切！你们没有理由谴责我，农场恰恰是在我手里兴旺起来的。”

启明愤愤地说：“不，农场是在全国形势变化的条件下好

转起来的，革命工作有连续性。你任上出现的成绩，能和前几任领导打下的基础和积累分得开吗？功劳哪能算在你一个人身上。而将来，用不了多久，它一定会毁在你的手里。”

“我们走着瞧吧。好了，临时军事法庭可以撤销了吧？”老魏显然不想再辩论下去，便故意做出一副息事宁人、嘻嘻哈哈的模样。“要再争论下去，中午客人就得挨饿了。启明，你歇一会儿，我把船头打过来。”

小船在水面上划出道弧线，朝小军去的方向慢慢划去。

“老魏，”我语气和缓地说，“刚才并没有在审判哪一个人，是老同学间的促膝谈心。只有把事情弄清楚，大家才能从中吸取教训，对不？”

老魏抬起头来，眼里闪射出讥诮的光芒：

“好，那么你说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换了你会怎么办？”

“我相信党。只要如实反映情况，党不会强迫我去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我会跟张书记摊牌：要末就按实际情况下达生产指标，要末就把我的场长职务撤了！”

老魏把船桨停在水面上，仰天哈哈大笑：

“真是天真得可爱，我的老同学！我场长当得好好的，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平白无故让人家给撤了？就算把我魏大雄撤了又怎么样？还会有别人来，张大雄、李大雄，也许总产不是四百万，变成五百万！因为什么？需要！”

我沉默了。看着我茫然若失和启明一派沉闷的样子，老魏开心地笑起来：“书呆子们，你们怎么生活过来的？我二十年前就明白了的东西，你们至今还不明白吗？”

“怎么不明白？”启明闷闷不乐地看着老魏，“因为需要。谁

的需要？地委张书记？还是你？或是别的什么人？……可党和人民需要的是什么，你考虑过吗？需要的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每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为这个需要，而不是为什么别的需要服务！”

听着这番话，望着同是一条船上的这两个老同学，我忽然觉得他们虽然都生长在我们这个社会，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共产党员，但却象两株属性完全不同的植物：一个好比优质绿肥作物，既可用来饲养牲畜，又能用来改良土壤，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连那生长着豆粒一般的根瘤菌的根须，都献给了这块生它养它的母亲大地；而那一棵呢，却好比是黑刺蒿，牲口一见它浑身是刺，远远地绕着它走开了。更不能作肥料。它生长特别旺盛，蓬蓬勃勃，恨不得把土壤里的养分一下子吸干，对养育它的土壤从不作一点有益的事。地里只要长出这类野草来，说明这块土地的衰落和荒芜，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默了默神，便问启明：

“这些情况你汇报过吗？”

他看着我，苦笑：“多次谈过，牵涉到张书记，谁肯认真过问？再加上政治上我这个人的情况。”

我的心抽紧了，费了很大劲才忍住那一阵酸疼。我又转向老魏：

“你打算怎么办呢，老魏？”

“你呢，你又打算怎么办？”他难于捉摸地朝我笑了笑。

“我希望你自己主动把情况向上级讲清楚。

“如果我不讲？”

“那只好由我如实汇报。”

“商品粮基地问题？”

“只好重新考虑。”

“我劝你别那样做。”老魏十分认真地平静地说“：黎珍，为了友谊。”

“你是指小军的调转问题？”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是指为了农场。”

“那你想怎么办？就算我们能够一起隐瞒，‘东风’得到了一切需要的便利，今年你能向国家提供多少粮食？”

“跟去年一样。”

“种多少地？”

“跟去年一样。”

“多少？”启明盯着他。

“两万！”老魏也盯着他。

“地力不足，产量保证不了怎么解决？”

“投放化肥，把地力催发起来。”

“这是自杀！”启明猛地站起来，差点把船弄翻。

老魏不说话。启明极力控制住自己，用冷静的口吻问他：“好，就算今年还这么种，可明年粮食怎么拿？种多少地？”老魏还是不作声，启明自己替他说了，“依旧两万，办法老一套，对吗？那后年呢？大后年呢？”

启明越激动，老魏反倒越显得无所谓。他拿过桨，只顾低头划船。时起时落的桨声，同他的心思一样毫无规律，不好捉摸，只是加深了谈话过程中出现的这种难堪的沉默。

太阳转到西边奥伦布勒格山的上空了。黄昏的湖面上，升起一层湿漉漉的瓦蓝色的雾霭，透过它，可以瞭见一缕孤

烟,笔直地矗立在暮霭笼罩的湖心岛上，宛如国画里一棵高入云天的白杨。

“老魏，”启明异常恳切地说，“照你这样搞法,要不了十年，我们这个农场，早已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商品粮基地。所有耕地全要回到沙漠的原始状态中去。你我都知道，过度垦殖曾使两千年前的这片沃野毁为可怖的赤地。这太远了，暂且不说。那么，就在北边鹿山脚下，有个生产大队，过去是出名的产粮队，拥有几千亩良田，水土条件之好，引起周围人们的羡慕。但是由于不搞休耕轮作，不给土地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最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土地肥力抽干了，盐碱成分越来越高，生产年年下降，现在成了一大片盐碱荒滩，整个村子都迁走了，前后恰好十年时间。这就是咱们鼻子底下发生的事，难道还不能引为教训？”

老魏听了这话，象被逗乐了似的：

“能想那么远吗,启明,我的浪漫主义者!十年以后,你在哪儿？我在哪儿？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科学会有哪些发展？都难以预料。我们还是现实点好，顾顾眼前吧。就眼下来说，黎珍，我劝你息事宁人。”

我说：“这不是我的私事。”

“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能通融？”

“不行。老魏，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话。”

“我请你慎重考虑。”

我摇摇头，不说话。

“真的不改变主意？”

我被他的厚颜激怒了：“不能改变!”

老魏脸上是一副叫人吃惊的洋洋得意的神态："那么好，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目前还是保密的消息，我的任命已经下来了，不久我就要调离农场，由老辛来接我的摊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住话头，观察我们两人的反应。见我还没品出味来，又进一步说明："需要基地优厚条件的不再是我，而是他！为了他，你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我和启明面面相觑。我没料到，形势竟是这样急转直下，出人意料。而魏大雄呢，笑容可掬，神态悠闲自得，象完成了一幅杰作的画家，以局外人的眼光欣赏着我们的困窘和苦恼，又象一个摔出一把好牌的赌徒静待着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对他的"将军"，我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我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和愚弄，猛地站起身来，弄得船身不停地来回摇晃。

"别激动，黎珍，"没容我说话，老魏又说："你还是冷静想想。我知道，对我你可以毫不顾惜，推出示众；可对老辛……他需要支持，需要照顾。至于你，启明，除了关心我，你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把个人生活处理好，别还没上任就弄得满城风雨……"

刚一听到他的暗示，启明便立刻抬起头来望着我，他坦诚地、带着悲伤和歉意地望着我，好象要看进我的灵魂里去。半晌，他才在我们残酷的欣赏者面前干巴巴地说：

"不劳费心。今天早上我已向玉玲正式提出了，……我们很快就结婚。"

"真的？什么时候办喜事？"

启明不看他，冷冰冰地说："等她回音。"

在我面前是那双眼睛，诚实、深沉、目光炯炯，低垂的眼睑

再也藏不住热情的光辉。我立刻明白，他看见字条了！我们眼睛对着眼睛，刹那间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他似乎在回答我：

“原谅我,原谅我,为了这场斗争,为了一句真话,我又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你。……”

人迹罕至的、荒凉寂寥的湖岸，寂寞的、紧紧围困着湖岸的沙原；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云层里去了，金灿灿的湖水变得一片晦暗，在早春漠风的吹拂下，掀起寒冷的波浪……

我们三人象一个突然停住的电影镜头似的僵在那里，我和启明相视无言，而老魏则仍然象欣赏自己的杰作，一会儿看看启明，一会儿看看我。

十八（辛启明）

沙漠的春天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它不象在内地，春天总是含羞带笑,迤逦而来 冷天积雪化了,明天草儿青了。……在我们伊赫,春天也是粗犷的、豪爽的,它带着风的喧嚣,沙的飞扬,漫天铺地的几场黄风，凄厉的寒冬和迟到的阳春剧烈交锋,发出几声且战且退的哀号后,冬日才彻底垮台,草场返青，林梢吐绿，春天突然来临了。

对我来说，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也是这样猝然来临。

我得到通知，晚上全场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宣布彻底恢复我的名誉，恢复我的党籍。虽然我盼望这一时刻已经很久了，但真的接到通知，我还是热泪盈眶，兴奋得不能自持。这么说，我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了！

参加大会的人很多，许多同志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另外一些人则是好奇。人们已风闻农场负责人将有一些变动和调整。加之会后还要放映电影，因此不少家属和孩子都来了。

年轻人呼朋唤友地在前排占座，和我相熟的年长的农工则坐在后排。他们收工后，照例洗了脸，换了干净衣服，但强劲的风沙和沙漠地区格外强烈的红外线辐射，在这些改造沙漠的尖兵们脸上涂了一层永远洗不净的泥沙色，总让人觉得他们是径直从风沙线上回来似的。妇女和孩了们搬着小板凳，坐在礼堂固定座位的四周，给人群镶上一圈五色斑驳、跳

荡喧闹的花边。

使我得以自慰的是，连日来试验站对亚茨海里湖的勘测化验结果非常理想。里湖水深平均在一米二十左右，底部平坦，土质已由于多年来引入黄河水，形成了肥沃的淤土层，这一点和我先前的设想完全吻合。把里湖的水从西北面排出去，还可以借水力推平那边的一片沙丘，为开出新的耕地打下基础。只要把里湖利用起来，我们便又有了一千多亩新的可耕地，不仅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口粮可以解决，还能完成部分上缴任务。我一定要说服农场党委和管委会，让去年的小麦地全部休耕,压上一茬绿肥,这样,经过一年休整,地力得到一些恢复，明年情况便会有大的改观。远景是让人兴奋的。

要尽快排干湖里的水，和现有大坝平行，再修一条大坝，构成真正的黄河灌渠，这样河水不必借道亚茨海，既能节省水量，又可加快流速。兴修这个工程需要多少土方、多少机械、多少人力呢？得请专家赶快计算一下。

只是黎珍，她快要走了。我知道，这次一走，我们便永远不会再见面，就象两颗遥远的星辰，各在天之一涯，发着微弱的星光。我们连发出的光芒都彼此不会再看见了。但我们仍然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热情，仍然互相理解和信任，让我们彼此忍住内心的悸痛吧！好在生活还由许多其它部分组成，比起狂热的、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时代，现在毕竟要容易多了。

我刚走进礼堂，就被人们围上了。这是些十分友好的、热情洋溢的脸“老兵”们,农工们,知青们,他们祝贺我,拍打我的肩膀，捏痛了我的手。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朋友。就在

这时，我看见了玉玲。几天不见，她消瘦多了，脸色苍白。现在她在大庭广众间，众目睽睽下朝我走来，神气平静而镇定。

几个相熟的农工立刻拿她开玩笑，大声喊她的名字，问她什么时候请大家吃喜糖。我脸上发烧，想走走不掉。

玉玲走到我面前，坦率地望着大家：

“我们不结婚……”她声音很低,但字字清晰“;辛站长会告诉大伙，我们只是一般同志关系，谁泼脏水也没用。”说着，把一封事先写好的信塞进我手里，转身走了。

我被她弄得目瞪口呆，在一片静谧中打开了信：

老辛：祝贺你！

柳编社已经串连好了，好些大嫂和婶子都要参加，给我们拨间房就能开张了。

关于婚事，我不同意。真的，我不愿意。请别再提这事，一切都过去了。

她当众拒绝了我！

哦,玉玲,你有颗金子般的心啊！

一个工作人员朝我跑来“:场长请你去一下。”

休息室里，老魏一看见我，显得格外热情、亲热，撇下众人,一把拉住我,走到角落里去：

“启明，今晚除了给你落实政策，还要宣布我的调职和农场党委对你的临时任命。你没意见吧？”

这么快！我暗自思忖。但回答却很平静：

“我服从组织决定。”

其实黎珍劝过我，不要接这个摊子，不要替魏大雄承担后果。但是我不能！哪怕它是一块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会

压得我粉身碎骨，我也得挺身上去接住它！

“按大会程序,最后你得有个表态发言,准备一下。”他满有兴趣地问我“:打算讲什么?”

“不知道。到时候看吧。”

“农场各科室环节干部暂时不动，所以作为老同学提醒你一下，要考虑安定团结。不宜在大会上说的话先不要说，免得引起……老辛，不压担子不知沉，我是为你好，哈哈哈……好，让我祝你有个良好的开端。”他把手伸给我,又说“:对了,表态发言别太长,下边的电影是《红楼梦》,讲长了大家受不了。”

会议开得很紧凑，气氛也很热烈，先由农场党委组织部长宣布了《关于恢复辛启明等同志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杨副书记宣布了上级对魏大雄的新任命以及党委指定我为农场临时负责人、主管生产业务的通知。接着，即将离任的老魏讲话 。

他从桌后座位上走出来，发出很大声响，站到讲台上。他容光焕发：

“同志们，今天我参加这个会，心情很激动，可以说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就要离开大家了。我和同志们同甘共苦三、四年，汗往一处流，劲往一处使，真是莜面土豆酸菜汤，怎么拌上怎么香。咱们合作得很好嘛。”

老魏象往常一样声音洪亮，滔滔不绝。这些年，他练就了一套演说家的风度，深信自己每句话，每个手势，甚至头部的转动和眼睛的张合都能被人理解，都能激起听众反响；加上他那特有的表达方式：非常政治化、程式化的套语和通俗浅近的比喻、歇后语相结合。他的讲话确实颇能吸引人。

现在老魏也是那么自信地讲着，说明着农场成绩来之不易，说明着他对农场的感情和今后的希望。接着话锋一转，讲到我头上来了。

“这些年，老辛受了这么大冤屈，在当时无非是讲了几句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对党组织某个具体领导人提了点小小不言的意见，就被当作敌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此我是一直不同意的。……”

从我坐的地方望过去，只能看见他宽大的脊背和有力舞动的手势，可这时我很想看一看这个人的脸。在他这样扯起顺风旗、拐着一百八十度的大拐、粉饰自己、完全委过于别人时，是否会有些许愧色？

“浪费人才,埋没人才呀!”那张宽大的脊背在嚷嚷着“:同志们，这二十年老辛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可以说惨到家了！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被迫害得神经失常。……”

见鬼！我差一点站了起来。这是搞什么名堂，想讨好我吗，还是继续糟蹋我？

“……值得深思的是，象老辛这类骇人听闻的冤案并不是个别的，到处都有，比比皆是。我们一直自称生活在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从这点来说，我们连封建主义都不如！”

我坐不住了。一不小心，把桌上的茶杯弄翻，等收拾干净，老魏讲话也结束了。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不由分说把我拽到前台。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发现自己已经和魏大雄手拉手站在讲台上。礼堂里爆发出一片掌声，为了表示团结，老魏把我们两个人拉着的手举到高空，连续摇了几下，台下掌声越发热烈了。

我很久没当着大庭广众讲话了，心情的激动使我紧张而僵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明亮的灯光从拼成五角星的花玻璃背后照出来，把整个礼堂照成明晃晃的一片。突然，在台下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人群里，我看见了黎珍那双熟悉的眼睛。这几天她去各分场核实情况，今天赶回来了！而她的周围，还有千百只亲切的眼睛，都在鼓励地望着我。我终于找到了要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二十年前,当我来到伊赫沙漠的时候,并非出于自愿，那时，我只想赶快熬到日子，离开这里。后来一个老同志告诉我，公路那边的褐色墓碑下，长眠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块荒漠的土地上，他牺牲的时候，还蒙受着很大冤屈。跟他比起来，我做得很不够，很不够……但我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对待委屈。”

台下静极了，一点声响都没有。

“刚才魏场长讲到落实政策的问题，我想补充几句：误伤好人，冤枉好人的事，古今中外都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难完全避免,但是对错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错必纠’,这却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做到。粉碎‘四人帮’，党正在纠正过去的错误，医治自己的创伤。不错，正是现在，需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护党,维护党!”

台下有一个人大声鼓掌，就在黎珍旁边，看不清那是谁。台上台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转身看老魏，只见他皱了皱眉头，忽然转过脸去跟旁边的人商量什么事情了，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

“至于党委指定我临时负责农场生产，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得向上级说明情况，不能把我们定为商品粮基地，今年，甚至今后两三年内，我们都不能提供国家要求的商品粮。”

台下骚动起来了。有人大声问：

“这是为什么？”

“怎么回事？”……

我说：“还应该停止给我们发奖金。”

这下会场全乱了，台下群众大哗，纷纷站起身来。我觉得老魏也站了起来，好象要阻止我。我对着一群叫喊得特别厉害的人镇定地说下去：

“有些情况同志们不完全清楚，我不在这里解释。我只想说明一点：今年农场无地可种！所有耕地都必须休耕。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解决全场职工口粮，同时再完成部分上缴任务，必须寻找新的耕地，一句话，我们必须退下来！”

我没想到反映会这么激烈。人们议论纷纷，从主席台到最后一排，发出诧异、震惊、恼怒、不解的喧声，有人甚至互相争吵起来。

“那‘东风’不是垮了吗？”

“这是要毁掉咱们这个先进典型！”

“拔红旗，那可不行，不答应！”

混乱中，只听见魏大雄那火炸炸的大嗓门喊道：“那仅仅是你个人的看法，辛启明同志，农场管委会没有讨论过。”

“是我个人的看法，但要我来抓生产，就只有这样干！”我强硬地回答。

人事科代科长这时忽然站起来冲我喊：

“你别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想抹煞大伙的成绩？办不到！”

仿佛一声令下，有几个人立刻哄闹起来，冲我破口大骂。

在混乱中，我忽然看见玉玲严肃、坚定的神色和黎珍那双泪水莹莹的眼睛。

这时，坐在后排的农工忽然一齐大声喊起来：

“别嚷嚷,让老辛说话!”

“让老辛说下去!”

这些中年人浑厚、粗嗄的嗓门有较大威力，跟着他们镇场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把喧嚣声压了下去。

“是的，为了向前跳我们必须往后退一步……只有当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东风’工作 只有当我们把‘亩产上纲要,这个假象认清,老老实实地由‘先进单位’回到它本来的样子,我们这个农场才能扎扎实实地朝前起步。多少年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学会了说大话空话，一旦任务落空，又制造很多假象去掩盖。这不是搞革命！这是摧残革命，摧残社会主义！现在，党在努力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只要我们坚持这个指导思想，面向实际，从实际出发制定我们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具体措施,我相信,几年以后,在我们这里肯定会有一个飞跃的、鼓舞人心的局面！”

会场静静的，那些准备捣乱的也不吵闹了，大家屏声静气地望着我，我忽然觉得眼眶潮湿了。

“……前几天，我和试验站同志一起，勘测设计出解决今年农场耕地问题的一个方案；同时与外贸挂钩，有了一个增加职工收入的安排，现在提交场党委和管委会讨论批准，作为我

恢复组织生活后的第一个思想汇报。……”

全场沸腾了，发出海潮般的赞许声，一些老职工两臂大开大合地给我鼓掌。我忘了回到自己的座位，昏头昏脑地从台上走下来,一路踩着别人的脚,一路道歉。

快出会场时，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臂，扭头一看，一个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的人从礼堂出口处的一排座位上站起来，那双威严的眼睛在朝我和蔼地微笑。这眼睛，这神情，那么亲切、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不认识啦?小伙子!”

多么好听的嗓音啊,洪亮、悦耳,乍一听见,很难相信人有这么动听的嗓音，我心头陡然一热：

“吴场长！”

我一把抓住老场长伸过来的那只大手，把它紧紧地捧握在自己手里。原来会议刚开始不久他就来到这里，一直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

“我都听到了,你说得对,非常对!老场长眼里闪动着热情、鼓励的目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就是要有那样的心胸,那样的气魄,那样的干劲!……”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他那只温暖的大手。……

十九（他们）

黎明前的沙原,静穆、寥廓。平沙似雪,曙色如霜。春夜的繁星早已悄悄隐去，变得疏朗、暗淡。但东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黎珍看见一颗星，闪动着晶莹的光华，明亮的色彩，象含着微笑，摇曳着冉冉升起。

啊,启明星,幸福的星辰！

星光下一个人走过来。黎珍感觉自己在微微发颤。是他，是她盼望的那个人，又早早地往试验田走去了。但这回，黎珍没有猜对，那个人已经在她房前徘徊了整整一夜。他看见她走出来，迟疑了一下，便大步朝她走来。

“黎珍,你在看什么？”

“我在找一颗星。”

辛启明呼吸顿时停住了，轻声地问：

“什么星？”

黎珍的声音颤动起来：

“心爱的星。”

“哪一颗星是你最心爱的？”

“启明星。’黎珍耳语似的回答说。

“什么？”

“启明星，我找到它了……”

“这么说,你不走了？”

“我要留在这里！还记得咱们那篇论文吗？这回说什么也要跟你一起彻底搞完它。……”

“……”

他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正在这时，农场那辆大功率越野吉普沿着大路奔驶过来。车灯映照出他俩的身影。魏大雄坐在车上，风驰电掣般地从他们身边驶过。夜长梦多，他急着去管理局走马上任。车轮扬起的滚滚尘土，把他俩紧紧地围裹起来。

过了好一阵子，晨风才驱散尘雾。曙色中，辛启明轻轻抚摸着黎珍的头发：

“小珍，想不到你鬓边竟也银丝缕缕了……”

“让别人去容光焕发吧，”黎珍抬起乌黑的、深情的眼睛，“我们有我们的青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稿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稿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稿